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112

4

1

人 民 出 版 社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Guoji Gongyunshi Yanjiu Ziliao

第十一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200,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书号11001·662 定价1.20元

(只限国内发行)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十一辑目录

- 论俄共(布)党内的“民主集中派”……………杨彦君(1)
- 马克思论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布朗基……………曹特金(19)
- 租让是特殊形式的战争……………刘彦章(34)
- 葛兰西与“工厂委员会”运动……………毛韵泽(52)
- 葛兰西论领导权问题
- 读《狱中札记》……………张郁兰(71)
- 倍倍尔与妇女问题……………葛 斯(95)
- 卢森堡论及伯恩施坦思想来源
- 的三篇文章……………周懋庸(106)

人 物 传 记

- 乔治·朱利安·哈尼 ……………刘丽明(112)

外 论 选 译

-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 ……〔法〕皮埃尔·弗朗克(135)

张连仲译

文献和资料

- 回到亚当·斯密去![德]罗·卢森堡(153)
方 瑜译
- 烂核桃[德]罗·卢森堡(164)
于智元译
- 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任务 ...[苏]阿·伊·李可夫(171)
彦 山译
- 在全苏工程技术人员第三次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苏]阿·伊·李可夫(180)
彦 山译
- 胜利的组织者[苏]卡尔·拉狄克(186)
谷 松译
- 共产国际史文献资料概述(摘录)
.....[苏]K·C·特罗菲莫夫(194)
谷 松译
- 共产国际文献札记(摘录)[日]村田阳一(211)
王秀美译 殷叙彝校

书 刊 简 介

- 《李可夫文选》及其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周 邦(231)
- 有关共产国际的书目徐汶、田良英、李耀群编译(237)

论俄共(布)党内的 “民主集中派”

杨 彦 君

1918年秋至1921年春，在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了一个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弗·米·斯米尔诺夫、米·索·鲍古斯拉夫斯基、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拉法伊尔等。“民集派”的骨干分子大都是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观点的继续。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们鼓吹直接过渡到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左”的政策。但“民集派”作为反对派，所反对的是战时共产主义下的集中制。萨普龙诺夫等人因为几乎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讲话中都大谈特谈民主集中制，而实际上却曲解民主集中制，所以被人们戏称为“民主集中派”，他们也以此自称。

一

我们先介绍“民集派”的活动过程。

国内战争刚刚爆发以后，1918年秋，“民集派”就在莫斯科开始形成。当时担任莫斯科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萨普龙诺夫等人首先反对肃反委员会的体制和权力。1917年12月，为了镇压

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怠工等活动，在人民委员会之下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1918年，又在军队、交通等部门和各省建立了肃反委员会。省的肃反委员会由全俄肃反委员会和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实行双重领导。同年夏秋，发生了反革命分子杀害乌里茨基等党政领导人以及刺伤列宁的事件之后，肃反委员会开始实行“红色恐怖”，拥有非常大的权力，而且主要是由全俄肃反委员会直接领导。随后，中央的一些人民委员部等主管部门以肃反委员会为样板，按照垂直领导原则在地方上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从1918年10月起，萨普龙诺夫等人控制的莫斯科党政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指责地方的肃反委员会不受地方的任何监督、无法无天，要求把地方的肃反委员会变为完全由地方苏维埃领导的部门，不受中央肃反委员会的领导，并且指责中央政权机关干涉地方苏维埃的事务，认为这是恢复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原则，要求俄共（布）中央修改宣布全国为军营以及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实行集中化的方针。

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等人认为：官僚主义已深入到一切机构，中央任命的一些官吏徇情枉法、胡作非为、篡夺地方权力等现象已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些恶劣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的集中已经超过限度”；“我们不是集体决定问题，而是个人决定问题”，“中央委员会作为委员会并不存在”。他们主张：在中央和地方都不要以党代政，要使人民委员会成为决定政策的机关；要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反对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反对按照“条条”建立苏维埃机构；要划分军事当局与民事当局的权限，反对军事机关干涉地方的事务。^①代表大会批驳了他们的主张，在其决议中强调指出：“党正

^① 参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8、303—314页。

处在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在目前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①

同年12月，在第八次党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萨普龙诺夫等人提出：不能任命个别人而必须任命一个委员会作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者；在企业中也必须实行委员制的管理。

当萨普龙诺夫被调到乌克兰担任哈尔科夫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时，“民集派”在乌克兰占了很大的优势。1920年3月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乌共（布）第四次代表会议通过了萨普龙诺夫等人的纲领。会议选出的新的乌共（布）中央委员全是“民集派”分子。他们要求在乌克兰搞地方主义，要求以委员制代替一长制。3月28日，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联名发表的提交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委员制和一长制的提纲》，标志着“民集派”的正式形成。《提纲》认为：委员制是“苏维埃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体制的必要的基礎”；除了履行简单技术职能的苏维埃机构的下级环节和个别实现了军事化的企业可以实行一长制之外，一切苏维埃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工厂都应实行委员制。^②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已被击溃、国内战争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于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列宁总结了国内战争中的经验，认为苏维埃俄国之所以创造了历史奇迹，战胜了强大的国内外敌人，“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中制、纪律和空前的自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67页。

② 参看《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65—566页。

我牺牲精神”。他说：“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的任务上去。”^①列宁和代表大会强调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要加强集中制、加强一长制、实行经济军事化。

“民集派”是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他们就经济建设问题、组织问题和党的建设作了副报告。他们攻击列宁“无知”和“玩弄手腕”^②，攻击列宁提出的方针“导致党的官僚专政”，“把党员变成百依百顺的留声机”^③，“培植官僚主义”^④。他们说：“请不要以军事化为幌子破坏我们的机关，请不要助长官僚主义，请不要用绳子拴着我们，把我们拖到一长制去。”^⑤他们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关于把苏维埃劳动军变为区域经济机关、由军队去管理地方事务的主张。代表大会对“民集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列宁说：“奥新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和萨普龙诺夫三位同志的提纲，全部都是对理论的彻底歪曲。”^⑥4月5日，大会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解散“民集派”控制的乌共（布）中央，建立由列宁的拥护者组成的临时乌共（布）中央。

1920年底至1921年初，党内发生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民集派”发表了《党的当前任务》和《论工会》两个提纲。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整个机构已经出现总危机，这个总危机表现在：党的生活的一般水平降低了；各级领导机构，包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内，已陷于瘫痪；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流行；大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59、167页。

② 参看《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51、53页。

③ 同上，第51、52页。

④ 同上，第118页。

⑤ 同上。

⑥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5页。

量野心家混进了中央各主管部门；种种特权盛行；党员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危机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不断地加紧实行官僚主义的（垂直的）集中化的方针”。他们要求清洗党政领导机关，并且彻底改组中央委员会。^①他们说：工会危机“是苏维埃机关所经历的总危机的一部分”，为了克服工会危机，“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权力是绝对必要的”。^②他们在工会问题上的观点与“工人反对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相类似。

在1921年3月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民集派”作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副报告。他们的基调是：“我们在党的管理中的军事化方法已部分地破产了”；“现在是由解决几乎纯粹的军事任务过渡到把斗争的中心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期”，所以，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从上到下彻底地、坚决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的，主要是“工人反对派”而不是“民集派”。

鉴于党内派别林立、争论不休带来极大的危害，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一切派别和派别活动。此后，“民集派”作为一个正式的派别就不再存在了。

但是，在1923年底至1924年初关于党内民主和经济政策的争论中，原来的“民集派”骨干分子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支持托洛茨基派，在托洛茨基的《四十六人声明》上签了名。1924年1月，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在《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中指出：由托洛茨基领导的这个“反对派的核心是过去的‘民主集中派’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几年以来一直反对党的路线”，“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

① 参看《党的当前任务》，载《真理报》1921年1月22日。

② 《论工会》，载《真理报》1921年1月16日。

③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49、658页。

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①1925年，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曾在原来“民集派”分子中寻找支持者。1926年，鲍古斯拉夫斯基、拉法伊尔等人参加了托季联盟，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等人认为托季联盟的纲领仍“不够激进”，单独组织了“十五人集团”。1927年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前者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把后者作为“显然是反革命的萨普龙诺夫集团”一并开除出党。^②

下面我们再介绍“民集派”的基本观点。

二

如前所述，“民集派”的多数骨干分子如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都是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年春，他们就鼓吹极左的国内政策：立即实现生产资料的“最坚决的社会化”，“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在农村中实行“共产主义的土地政策”，“组织贫苦农民对富裕农民的进攻，发展公共的大农业”；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等等。^③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俄国采取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国家生产和分配的政策。这正是“民集派”原来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时所主张的东西。因此，他们理直气壮地竭力鼓吹和维护战时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政策，而且对一些“左”的东西火上加油。

例如，在战时共产主义下所实行的本来就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不过在名义上还有某些差别。“民集派”对此还嫌不足。萨普龙诺夫在哈尔科夫推行一种最彻底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让党员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65、367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3分册第419、420页。

③ 参看本刊第2辑《“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国内政策和列宁对它的批判》一文。

把自己领到的全部工资交给一个“统一的小组”，然后由小组平均分配。^①

这种火上加油的情况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农业和农村政策方面。1918年6月成立的贫农委员会在同富农进行斗争、没收和分配土地、农具、收集粮食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发生了进行过火斗争、伤害中农等偏差。列宁看到了这方面的缺点。所以，同年年底贫农委员会被撤销了，而且，在1919年3月，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把中立中农的政策修改为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农，我们也不能象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农。”^② 俄共（布）八大后不久，“民集派”的主要理论家奥新斯基就发表文章，反对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他说：中农的本性就是强烈地倾向富农，因此只能采取中立中农的政策。他还提出，“要把一切富农分子从农村中成批地驱逐出去，送往集中营或后方后备队”。^③

1920年下半年，当党内开始酝酿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时，奥新斯基说：这是“恢复——尽管是部分地——自由贸易”的富农方针；提这一类建议的人是具有社会革命党人倾向的极右分子，这一类建议“带有强烈的富农分子的味道”；“只要你一打开这个门，马上就会没有粮食了；谁打开自由贸易这个门，谁就会使我们的粮食政策遭到破产，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遭到毁灭”。^④ 奥新斯基认为，解决农业危机的办法就是对农民使用暴力和实行国家强制。

① 档案材料，参看《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70年第6期第9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798页。

③ 《真理报》1919年6月15日。

④ 转引自IO·A·波利亚科夫《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和苏维埃农民》196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23页。

他说：“国家强制不是毫无根据的暴力，而仅仅是由事物的经济进程所决定的、必然出现的新制度的产婆”。^① 苏俄在1920年底采取了比余粮收集制走得更远的农业政策，即对农民应完成多少播种面积、播种什么作物、使用什么耕作方法等等，统统实行国家强制。这一政策的最主要的制定者就是奥新斯基。^②

后来，“民集派”从“左”的方面反对新经济政策。例如，1923年4月15日，奥新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把“管理国民经济的钥匙”交给了资产阶级。他的这些观点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1924年1月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明确地指出：以过去的“民集派”分子为核心的反对派“用大量‘左’的词句来反对整个新经济政策，他们发表了一些声明，这些声明说明这些同志只不过要求放弃新经济政策而回到战时共产主义，此外没有丝毫别的意思”。^③ 1926年6月27日，萨普龙诺夫在递交给联共（布）中央的《十五人提纲》中说：新经济政策是“投降政策”、“富农政策”。《提纲》要求“改变价格政策”，用剥削农民的方法从农村中榨取资金来实现“超工业化”。《提纲》认为：搞合作制还不行，因为那些合作社是富农合作社；彻底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蜕化”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大型的国营农场。^④

总之，“民集派”主张直接过渡到在生产和分配方面实行共产主义，所以，他们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坚决鼓吹者，并且加深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后来则是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

① 《真理报》1920年12月4日。

② 参看《真理报》1920年12月4日奥新斯基文章《关于调节农业的问题》以及列·夏皮洛《共产主义专制的起源》1956年伦敦英文版第217页。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65—366页。

④ 档案材料，参看《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70年第6期第93—94页。

三

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等人,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就反对集中制,宣扬地方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他们说:劳动纪律是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国家管理的形式势必发展为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实行各种委员的统治、剥夺地方苏维埃的独立自主性”等等。他们坚决主张在企业管理中实行委员制。他们的这些错误当时就受到了列宁的批判。^①

1918年夏,爆发了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为了赢得战争,需要千方百计地动员和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而当时的情况是:地方的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到1918年底和1919年初才逐步建立起来,而且都还运转不灵,互不通气,互相脱节;地方主义、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有些地方甚至自行宣布成立“共和国”、“劳动公社”、“独立的人民委员会”、“地方防卫委员会”等等。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高度的集中制是完全必要的。“民集派”却反对这种集中制,而天天高喊“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苏维埃俄国的党政机关的组织原则和企业管理原则。“民主集中制”一词最早出现在1905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中,在1906年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正式被写进了《组织章程》。^②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的统一,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其侧重面各有不同。

“民集派”高谈“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

① 参看本刊第2辑《“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国内政策和列宁对它的批判》一文。

②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19、165页。

样：“‘民主集中派’的同志们无论对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集中制，都是一无所知”。^① 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在恰恰需要强调集中的时期和条件下，他们却片面地强调民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他们要求取消对民主的限制，甚至要求给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民主权利。例如奥新斯基1919年1月15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新任务》中主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决定一切问题时都应广泛公开。他认为，“我们必须明确地说，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上，根本不必把不号召直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党派排斥于苏维埃和自由讨论之外。”

第二，他们歪曲党内民主。后来，“民集派”承认：“在苏维埃建设的领域内，对民主的限制应当多一些……对于各反革命的政党（包括反动的孟什维克党），则不可能实行批评自由和公开性。只有各个真正苏维埃的党派和非党的工农群众，才能享有这种自由”。但是，他们说：“在党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假使重新爆发战争，我们必须保持着党内民主而不是不要民主去进行战斗”。他们所谓的党内“最广泛的民主”意味着“党内各个派别和集团合法化”。他们说：在苏维埃的条件下，党外无党，因此，党内必须有派；“没有各种意见的交锋，没有各个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个人的批评同自我批评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一种很不好的批评。只有集团或派别的集体的批评，少数派对多数派的批评，才能保证共同的监督，揭露当前的缺点，指出未来的道路”。^② “民集派”反对委派制，要求实行选举制，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5页。

^② 恩·奥新斯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需要什么》，载《真理报》1920年12月26日。

而且主张：“在选举中要让党内各主要派别的代表人物进入党的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而不必一定要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额。”^①

第三，在处理党政的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的关系方面，“民集派”片面地强调后者的民主权利而忽视或否认前者的集中权利，只讲一头的主动性。例如，他们在给民主集中制下定义时说：“我们认为，民主集中制……在于：通过地方组织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发挥地方组织的主动性，地方组织对局部的工作范围负责。如果把党的工作分成各自拥有一些特殊部门的若干领域，如果这些部门受地方组织的总的领导，如苏维埃的各部門受省执行委员会的管辖和领导一样，那么这就是民主集中制”。^②为了反对各人民委员部的条条领导，他们主张：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門只属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导和监督，相应的人民委员部不得过问，特别是其负责工作人员只能由地方挑选。^③他们一味指责“中央企图对地方管得很死，企图干涉纯属地方性的工作”^④。他们再三要求，应“责成各级党委：不要对下级党委管得太死”^⑤。一度被“民集派”控制的乌克兰的党组织向中央闹独立性的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所以，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曾特别指出：“必须有统一的集中的共产党……俄共及其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党的各个部分（不分其民族成分）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享有党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利，完全隶属俄共中央。”^⑥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 659 页。

②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 122 页。

③ 参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 196 页。

④ 同①第 319 页。

⑤ 同上，第 659 页。

⑥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567 页。

第四，在处理党同政府和工会机关的关系方面，“民集派”主张削弱党的领导。他们埋怨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软弱无力……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实际上也不是把主要的讨论、决定特别是执行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机关……具体的政治领导中心是俄共中央，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政治局。各种法案、外交照会、军事计划等等的草案都在这里进行研究、获得通过或者被否定。所有这一切都在形式上通过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去实行，或者甚至不通过它们。”^①“民集派”主张：党中央只向苏维埃和工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党组“作出关于各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指示，中央委员会不预先仔细研究它们的种种草案，不研究它们的日常事务”，并且应“责成各级地方党委同苏维埃和工会的党组建立同样的相互关系”。^②尽管他们的指责不是没有事实根据，尽管他们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正如列宁后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避免这种现象（指党政不分。——引者）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是唯一的执政党在管理国家”，^③何况是在非常的条件下。如果实行“民集派”的主张，那就必然削弱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赢得战争。

第五，“民集派”反对一长制，片面地主张实行委员制。列宁反复阐明：“我们既需要委员会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个人负责制和个人领导制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共同讨论，专人负责”。^④俄共（布）九大的决议说：“在讨论或决定问题的过程中采用委员制，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委员制就应当无条件地让

① 奥新斯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需要什么》，载于《真理报》1920年12月26日。

②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658、65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1页。

④ 同上书第30卷第213页，第33卷第51页。

位给一长制。衡量每个组织是否适宜,应当以该组织中各种义务、职权和责任的划分是否明确为标准。”^①因此,执行中的个人负责制即一长制并不与民主集中制原则相矛盾。相反地,它与决定大政方针时的集体领导制即委员制都包括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内。“民集派”把实行民主集中制时讨论、决定和执行混为一谈。他们认为,除了个别情况之外,一切机关、工厂都应实行委员制,即不能设置一个行政首长,而只能设一个委员会来进行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如果“用省长代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此之后,再谈什么工人的主动性、什么选举权等等,那全是白搭”;“如果你们取消我们各级机关的委员制,那么请注意,这就意味着整个民主集中制体制的崩溃”。^②他们只讲集体领导,否认执行中的专人负责,实际上是鼓吹无人负责。这样一来,他们就歪曲了民主集中制。所以列宁说:他们的这一主张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后充满混乱和热情的时期中,曾经通盘实行过委员制,经验证明委员制行不通。^③

“民集派”在民主与集中问题上犯错误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他们不顾客观现实,搞教条主义。1917年,列宁在《四月提纲》等著作中说过,苏维埃国家应当是“巴黎公社型的国家”。但是,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列宁并不拘泥于自己的论断,去搞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等等。1871年4—5月间,马克思就曾指出:巴黎人的一个致命性的错误,就是他们过分老实,面对虎视眈眈的反动派,他们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去大搞公社选举,失去了大好的时机;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1919年,“民集派”搬出列宁在《四月提纲》中的论断,一再要求“逐步采取充分的工农民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0页。

②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52、123页。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4、420页。

主形式，走向公社型的国家”等等。^① 如果实现“民集派”的主张，在战争条件下不要严格的集中制，而去搞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走向公社型的国家”，则苏维埃政权就会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正象列宁所讲的那样，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

其次，“民集派”的多数成员是地方的党政负责工作人员，他们从地方的角度、而不是从全局看问题，所以总是为地方争权力、争民主。奥新斯基在俄共（布）九大说，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是“几种文化的冲突”：托洛茨基代表“军事的苏维埃文化”，“工人反对派”代表“工会运动文化”，“民集派”则代表“民事的苏维埃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看法”。^② 这里，奥新斯基正确地指出了别人的片面性，同时也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只从地方的角度看问题的片面性。

再次，“民集派”部分地接受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马哈伊斯基主义——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潮。他们虽然并不一概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专家参加工作，但是反对让专家“发号施令”，即有权地担任领导工作。“民集派”之所以坚决主张实行委员制、反对一长制，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专家的知识和能力，片面地强调工人“善于辨别革命之风往何处吹”，“是最聪明的当家作主的实践者”，所以，一方面，他们强调：“委员会是最高级的管理学校；如果我们想从工人中培养行政人员的话，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不可缺少的学校”；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人们力求实行一长制的管理，其目的是要重用专家”。^③ 列宁明确地指出：“民集派”的这些议论“贯穿着一种愚蠢的精神，即反对专家的精神”。^④

① 《真理报》1919年1月15日。

② 参看《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115页。

③ 参看同上，第53、117、120页。

④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19页。

四

至三十年代初期为止苏联的一些著作，例如1931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21卷中的条目只是说：“‘民主集中派’是1920—21年间在俄共（布）党内形成的一个反对派集团。”到三十年代后期，存在于1920年前后的“民主集中派”集团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在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等人相继被捕并且死于狱中的同时，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一些著作，开始给“民集派”定性为“反党集团”。在近年苏联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如《历史百科全书》、《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和一些文章中，仍然保持着“反党集团”的提法。“民集派”的一些正确的意见，或者说，一些意见的正确方面，被一笔勾销了。列宁对“民集派”某些意见加以肯定的言论，从来无人提及。

列宁对“民集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主要是从理论上。列宁只是说，“民集派”“可以说是‘叫喊得响亮者’的派别组织”，^①并没有给它加上在政治上定性的帽子。列宁在批判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的错误时还说过：这些人“在我看来是宝贵的工作人员”。^②“民集派”作为反对派，所反对的是战时共产主义下的极端的集中制、军事化、“条条”领导、束缚地方的积极性、以党代政等等。如前所述，他们搞教条主义，无视客观实际情况，片面地强调民主，这是错误的。他们在揭露缺点方面无疑有许多夸大的地方。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集中制的确超过了限度。例如，他们在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上说：“管理总局或人民委员部甚至从莫斯科来管理例如萨马拉省的一个小小的疗养院，而地方的省执行委员会（更不

①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页。

用说乡和县的执行委员会了)不仅无权进行监督,甚至无权进入这个疗养院的领土。”^①在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报告的季诺维也夫曾承认有这些缺点。后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极端集中化的体制下,“造成了臃肿的官僚主义机构,并使这种机构产生特殊化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了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借”等等。^②当时狂热地鼓吹极端的集中制的托洛茨基,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承认了战时共产主义下的极端的集中制的弊病。^③1925年,布哈林在他的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中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极端的集中制和“按军事方法进行领导”的弊病作过详细的描述。^④

“民集派”在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下提出的一些主张,的确有许多错误的、片面的东西,但其中也有不少合理成分。1920年11月,当“民集派”势力很大的莫斯科省召开党代表会议时,列宁在代表会议上说:“由于党内的危机,不仅在莫斯科的而且在全俄国的反对派中,都出现了许多完全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党自然发展的时期和从全力注意政治军事任务转入建设和组织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把最快的过渡、尽量吸收年轻的新生力量、吸收地方工人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作为自己口号的反对派,有一些非常合理的意图、倾向和要求”;“表现了过渡时期特点的反对派,毫无疑问,它本身也有某种健康的东西”。^⑤

实际上,“民集派”提出的主张中一些健康的东西先后被采纳了。例如,他们反对以党代政,主张党政分工。俄共(布)八大的决

①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197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56—157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2页。

③ 参看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2卷1953年纽约英文版第230页。

④ 参看《布哈林文选》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上册第452—453页。

⑤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3、385页。

议中就写上了：“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俄共（布）九大的决议重申了这一点。^①后来列宁又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经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搬到政治局来了。这里我的过错也很大”。^②

又如，“民集派”主张扩大地方党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权力。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章作了规定：“一切党组织对于地方性的问题有自主决定的权利。”^③列宁也一再强调要扩大地方的权力，充分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④

国内战争结束，非常时期过去以后，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把“民集派”的一些合理意见都写进去了。决议摒弃了军事化的方法，提出要采用工人民主制的方法，要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决议特别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决定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让各种意见发表出来。^⑤

“民集派”一些具体的正确意见也被列宁采纳了。例如，他们说，肃反委员会权力太大；后来列宁承认，肃反委员会的确有缺点，必须加以改革，要“规定它的职能和权限”。^⑥又如，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说：“如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的会期较长，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71页，第2分册第28—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1、271页。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91页。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0页，第33卷第272页。

⑤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1—54等页。

⑥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7—148页。

分设各种小组和专门委员会，就能更严格地检查工作”。^①这与奥新斯基 1920 年讲过的意见^②几乎完全一样。

总之，正如俄共（布）十大的决定中所说的那样：“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在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强调了集中制和战斗命令的工作方法，“党才战胜了敌人的反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③当时“民集派”却强调民主，要求“采取充分的工农民主形式，走向公社型的国家”，因而犯了错误。他们的某些主张，例如要求“党内各个派别和集团合法化”，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是错误的。但是，“民集派”揭露了当时集中超过了应有限度的缺点。他们提出的某些主张，例如关于处理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方面的主张，在战争时期无法实行，而且带有片面性，但是其中有合理的成分，受到了列宁的重视。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对“民集派”提出的许多问题，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研究，更没有认真地加以解决，在苏联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破坏民主和法制的严重弊病。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272 页。

② 参看《真理报》1920 年 12 月 26 日。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49—51 页。

马克思论一八四八年 革命中的布朗基

曹 特 金

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本文主要通过马克思对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布朗基的论述，来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1861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给布朗基的密友瓦托博士的信中谈到布朗基时说：“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①

马克思的这封信概括了他对布朗基真诚关切的态度和高度的评价。的确，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一向把布朗基视作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马克思在他写的文章和书信中提及布朗基不下数十处之多，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对这位法国革命家的评价。马克思不仅对布朗基那漫长的革命生涯的各个

① 马克思致路易·瓦托(1861年1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2页。

阶段几乎都有所评述,而且还同恩格斯一道,直接采取行动,支持和帮助布朗基。他和恩格斯为布朗基1851年寄自监狱的“二月革命三周年献词”亲自撰写前言,并把献词译成英文和德文。为了抗议第二帝国政府于1861年无理逮捕布朗基,马克思写信给德国和其它国家的工人活动家,设法筹集款项,出版揭露路易·波拿巴政府迫害布朗基的小册子。马克思还曾设想组织一批关于布朗基案件的文章。在马克思的倡议下,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有法国和德国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反对逮捕布朗基的抗议书。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之后,马克思通过拉法格争取布朗基和他的信从者,希望这个当时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派别能加入国际。^①1869年,当第二帝国陷入深重的全面危机之时,马克思也曾同意在有布朗基主义者参加出版的政治周报《文艺复兴》上撰写稿件。^②

众所周知,布朗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理论上比较弱,总的来说没有超越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界限。他的密谋策略也是错误的。对布朗基的弱点和局限性,马克思看得很清楚。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斗争的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活动家,他们当中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甚至错误,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们毕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对这样的活动家,马克思首先看到的是他们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因为他们不是孤立的,马克思对他们的支持,实际上也是对革命运动的支持。

马克思就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布朗基的。马克思在看到布朗基

① 保·拉法格于1866年4月22日致奥·布朗基的信(复制件藏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编号为:ф.10,ен.хр.6/1),参看巴赫等《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卷第260页。

② 后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7—318页。

所存在的弱点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他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历时数十年，马克思的这种态度从未改变。1879年6月，当七十四岁高龄的布朗基在最后一次监禁之后终于获释时，收到了拉法格邀请他到伦敦去休息一个时期的信。信中提到：“始终以极大的关切注视着您的全部政治经历的马克思希望有幸同您结识。”^① 应该看到，拉法格传递的这个信息不是偶然的。它很好地表达了马克思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诚挚之情。

在马克思关于布朗基的论述中，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占有重要地位。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部总结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巨著中，马克思多次谈到布朗基的革命活动。我们有必要对布朗基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作些分析，以加深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理解。

二

席卷欧洲的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对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马克思在总结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时，给予了布朗基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无产阶级的领袖。总是把他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论述五月十五日事变时写道：“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②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不止

① 拉法格1879年6月12日写给布朗基的信。转引自莫里斯·多芒热《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1957年法国马赛尔·里维尔书店版第3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0页。

一次地把布朗基和他的同道者称作“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里，又出现“布朗基所领导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②的提法。

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无疑是布朗基一生中政治活动的顶峰。革命给了他不可多得的大规模接触群众的机会。布朗基未能参加这次革命的全过程，还在六月工人起义之前的一个月，他就被执行委员会逮捕了。但仅从2月24日他到达巴黎，到因五月十五日事件被捕，在这段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布朗基便已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政治敏锐，出色的组织才能，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限忠诚。在这些沸腾的日子里，布朗基天天在俱乐部里主持会议，起草宣言文告，并多次作为俱乐部的代表前往市政厅同临时政府成员交涉。他所创立和领导的“中央共和社”俱乐部，在二月革命后巴黎出现的三百个^③各种政治色彩的俱乐部中影响最大，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左翼。这段时间里，布朗基对形势的估计、对二月共和国的性质、对临时政府的斗争策略表明，他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革命者。他的不少观点在当时的法国众多的派别中最接近马克思对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分析。

关于二月革命后法国的形势，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写道：“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不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9、4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6页。

③ 参看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波将金·莫洛克教授主编《1848—1849年革命》1952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07页。

的活动却处处都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在它整个存在的时期都在不断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①在二月革命后的法国，“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②然而这个要求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就在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二月革命的胜利的时候，“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③并且获得了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支持。他们急于收回在二月革命中被迫作出的让步，所采用的办法就是尽快举行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选举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一个比临时政府更加符合他们利益的政权的建立。马克思写道：“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④

布朗基对二月共和国的看法很接近马克思的分析。布朗基是在外省获悉七月王朝被推翻的讯息后，于2月24日当天从布卢瓦^⑤赶回巴黎的。第二天，临时政府在巴黎工人的压力下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却拒绝用红旗作为共和国的旗帜。临时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②③ 同上，第609页。

④ 同上，第399页。

⑤ 1847年6月以后，布朗基居住在布卢瓦，过着受警方严密监视的生活（参看塞·伯恩施泰因《奥·布朗基和他的暴动艺术》1971年英文版第114页）。

府虽然释放了七月王朝时期囚禁的政治犯，解散了元老院和众议院，废除政治犯死刑，废除贵族封号；但仍然保留了七月王朝的警察官僚机构，也没有触动禁止工人罢工的列沙白里哀立法。对这样的临时政府是否要立即推翻，这是巴黎无产阶级面临的第一个问题。2月25日晚，聚集在普腊杜大厅里的五百名群众（其中有许多人是布朗基的信从者）怀着对临时政府强烈不满的心情，商议再次起义。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布朗基的到来，指望他会支持推翻临时政府。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布朗基不同意这样做。他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法国不是一个共和国，刚刚完成的革命仅仅是一次可喜的袭击而已。”他分析了巴黎城内国民自卫军的状况，指出“这支军队由胆怯的店主们组成”，他们对二月革命来说“只是不自觉的同谋者”，“这些人明天很可能取消他们昨天在高呼‘共和国万岁’时所允许作的一切事情！……”^①至于说到外省，布朗基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受反动势力控制的。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布朗基认为过早地推翻临时政府是不相宜的。他说：“我们要善于再等待一些日子”。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民在二月革命中用鲜血换来的民主权利，去“掌握人民和俱乐部，在那里我们要象昔日的雅各宾党人那样用革命的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②布朗基在到达巴黎的第二天就能如此有针对性地分析形势，说明他不愧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就是在这次集会上，布朗基组织了“中央共和社”俱乐部。该俱乐部的人数迅速从最初的五百人增至三千人。布朗基被选为主席。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共和社”每晚8点集会直至深夜，出席集会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五百人。^③布朗基把革命俱乐部看成是教育人民和组织人民的好场所，看成是同临

①② 布朗基《1848年2月25日的演说》，《布朗基文选》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39页。

③ 参看塞·伯恩施泰因《奥·布朗基和他的暴动艺术》第146页。

时政府斗争的革命组织。“中央共和社”成立以后，向临时政府提出过一系列革命的要求，递交过六份致政府书。^① 在所提出的要求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推迟制宪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关于将军队撤出巴黎、武装巴黎工人的两项。

三月初，临时政府发出通知，规定3月18日和4月9日分别举行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为此政府在巴黎和外省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右翼共和党人和王朝反对派为促使选举早日举行，政治上十分活跃。布朗基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反动势力策划的一个政治骗局。必须组织人民起来阻止其实现。3月6日，布朗基为“中央共和社”起草了第一份要求延期举行选举的请愿书。上面写着：“公民们，立即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对共和国将是一个危险。六十年来，在法国唯有反革命势力有发言权。”“报纸只能进入社会的表层，〔唯一的〕群众教育〔只〕是通过口头进行”，而后者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掌握在共和国的敌人手里。而“那些忠于民主事业的人，人民几乎都不知道”。布朗基毫不留情地揭露道：“选举自由只将是表面的，因为一切敌对阴谋的影响必然会歪曲人民的意愿。”“大声疾呼要求立即举行选举的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公认的共和国的敌人，这些人〔一直〕疯狂地攻击共和国，他们象忍受〔侮辱〕那样忍受共和国，他们打算利用共和国的过分幼稚来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我们的敌人被解除武装之后，改用了阴谋诡计。”^② 布朗基并没有把这场斗争局限在一个俱乐部的范围之内，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3月13日，“中央共和社”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所有的共和主义俱乐部和团体联合起来。3月14日，由十五个俱乐部组成的中央选举委员

① 参看《布朗基全集》1977年巴黎版第1卷第382—383页。

② 《布朗基文选》第42—43页。

会成立，几天后又又有三百个工人团体加入了这个委员会。^①联合起来的各俱乐部和团体共同商讨致政府书的内容，准备派出代表到市政厅去进行谈判。在联合起来的十五个俱乐部中，“中央共和社”又是行动最坚决的。在选举日期问题上，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领导的俱乐部要求分别延期到5月31日（制宪国民议会）和4月5日（国民自卫军总部），而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坚持无限期推迟。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在十五个俱乐部于3月17日递交的“致政府书”上，只得同时写上两个方案。布朗基在几份文告上都阐明了无限期推迟选举的必要性。他写道：“在巴黎，只有为数极少的工人的名字写在选民单上。投票箱将只会收到资产阶级的选票。”“在农村，一切势力都掌握在僧侣和贵族手里。”^②布朗基进一步提出：“我们要求无限期地推迟选举，并且派人到各郡去，责成他们把民主的知识带到那里。”^③“必须使最小的村庄也得到民主的知识，必须使劳动人民把被奴役压低的头重新抬起来，必须使他们从被统治阶级踩在脚下的疲劳和恐惧状态中站起来。”^④布朗基所发动的这一场推迟选举的运动，揭露了右翼共和党人和王朝反对派的阴谋，教育了巴黎的工人群众，帮助他们提高了对临时政府的认识。

布朗基还要求临时政府把军队撤出巴黎，同时武装巴黎的工人群众。这也是一项带根本性的要求，是从保卫二月革命果实，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角度出发提出来的。布朗基一向重视革命的武装。第二共和国建立以后，他便清楚地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动势力必然会重新集结，对革命进行反扑。而军队便是统治

① 参看塞·伯恩施泰因《奥·布朗基和他的暴动艺术》第149页。

② 《布朗基文选》第43、44页。

③ 同上，第43页。

④ 同上，第44页。

阶级手中的工具。布朗基几乎是从返回巴黎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还在“中央公社”建立初期，在为该俱乐部起草第一份致政府书时，他就毫不含糊地提出：“〔立即〕把全部未安排工作〔并〕领取工资的工人武装起来，组成国民自卫军，每人在役一天〔毫〕无例外地津贴两个法郎。”^①对待临时政府阴险地建立起来对付工人的别动队，布朗基是不放心的。他把这支主要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由临时政府供给特别制服和薪饷的军队，也归入雇佣军之列。这是布朗基过人的政治敏锐的又一表现。当“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②的时候，布朗基在为巴黎十五个俱乐部的联合委员会起草的致政府书上，已经提出了“把雇佣军撤出首都巴黎”的要求，并且重申了武装人民的思想：“巴黎，法国的大脑和心脏，只应该由人民自己来保卫，由全体人民来保卫”。^③

4月中旬，临时政府内外的资产阶级加紧制造事端，以攻击布朗基等无产阶级领袖；同时公开从外地调集军队到首都。并定于4月20日在巴黎以庆祝博爱节为名，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布朗基预见到临时政府这一行动将带来严重的后果。4月20日，他在又一份抗议书上历数了临时政府的劣迹后，转向群众大声呼吁：“公民们！制止反动势力吧！保持军队远离首都，消除武装报复对人民胜利的威胁。”在这份抗议书上，他强调军队正向巴黎调动这一事实，指出：“军队还没有改编。被惶惶不可终日的暴政豢养起来从事杀人勾当的官佐今天和他们在街垒战以前一样，并没有改变。”他愤怒地质问道：“再说为什么在我们城内要有雇佣军呢？”

① 《布朗基文选》第41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9页。

③ 《布朗基文选》第45页。

如果人们真正要军队的话，八天之内就可以召集三十万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来维持首都的秩序和保卫首都的安全。”^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布朗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主张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并不是由于对它抱有幻想，而是出自保卫二月革命果实的考虑。布朗基的主张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群众的利益的。他无愧于马克思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对他的称赞——“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②

三

马克思对布朗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政治活动给予充分肯定，还因为他在布朗基身上看到了一种把共产主义理想（尽管还是空想的）同具体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实践精神。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③ 欧洲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明朗化了。斗争的现实迫使一切空论的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原先隐藏在动听的词句背后的真实意图无法再加以掩饰。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同《共产党宣言》相比较，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加深了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批判的重点是对工人群众具有欺骗作用的、宣扬阶级合

① 《布朗基文选》第 47、4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45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85 页。

作的空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体系。

马克思指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必然表现……”^①到了革命风暴时期,这种逃避现实的空论的社会主义者所能做的只是“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②。马克思结合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实践深刻批判了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由路易·勃朗担任主席的卢森堡委员会只能是临时政府手中的玩物,是修建在资产阶级握有全部权力的政府机构旁边的一个“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的“社会主义的礼拜堂”。^③至于临时政府打着路易·勃朗旗号组织的国家工厂,则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它只会使“社会主义受辱于众人之前”。^④

在揭露“空论的社会主义”的同时,马克思热情地歌颂了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他写道:“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⑤对这一段话,我们都很熟悉。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科学的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叙述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

②③ 同上,第401页。

④ 同上,第410页。

⑤ 同上,第479—480页。

到了布朗基。自然,这并不等于说,布朗基已经达到能够科学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高度。马克思在这里是说,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资产阶级所以选中布朗基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来命名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布朗基的革命性和实践精神使他和其它一切社会主义空谈家区别了开来。

同路易·勃朗相反,布朗基在1848年革命中的政治活动不是助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幻想,而是时刻提醒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同资产阶级的对立。他从来不相信社会主义是可以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工人“组织劳动”实现的。他认为只有依靠组织和武器,才能使社会主义实现。他写道:“武器和组织,这是进步的决定因素,消灭贫困的重要手段!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法国有了武装的劳动人民,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① 布朗基善于把当前的运动同为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二月革命以后,他通过报刊和俱乐部的讲坛公开地宣传社会主义。和加入临时政府的路易·勃朗不同,布朗基清楚地看到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他要求革命继续下去,以建立一个消灭剥削、解放无产阶级的新社会。他在3月22日致巴黎各民主俱乐部的一份宣言上写道:“如果共和国只是以一种政府形式代替另一种政府形式,那共和国将是一个谎言。政府的形式改换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它的内容。”他认为,“共和国就是解放工人,消灭剥削统治,建立把劳动从资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新秩序。”他这样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当人们缺少面包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当豪富并列在贫困旁边制造丑事的时候,就没有平等。当女工领着自己的饥饿孩子沿着豪华的宅第乞怜的时候,就没有博爱。”^② 3月30

① 《布朗基文选》第54页。

② 同上,第46页。

日，布朗基在《法兰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资本的暴政比军事和宗教的暴政更加残酷。二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资本暴政。这个目的也就是中央共和社的目的，每个社员誓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奋斗到底”。^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说，而首先是一种运动。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同时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不尚空谈的实践精神，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学说充斥欧洲的十九世纪中叶，布朗基的革命性是十分突出的。在这一点上，布朗基的社会主义比起其它流派来，最接近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妨引用布朗基的一封信来加以说明。这封信是他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捕后在贝尔岛监狱里写给巴尔贝斯俱乐部成员梅拉的。布朗基在这封长信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和革命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就是相信从这些理论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秩序。……社会主义是带电的火花，它照耀并激励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只有在这些学说的鼓舞下才会行动起来……你们不要弄错了，社会主义就是革命。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取消社会主义，人民的火焰就熄灭了，沉寂和黑暗就会笼罩整个欧洲。”^② 布朗基在他所撰写的时评中多次批判那些企图不通过革命就着手建设新社会的空想主义者和互助主义者。他在1869—1870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就是民主主义最勇敢的先锋队，而追求空想者却在所有反动政府面前竞相献媚，用侮辱共和国来乞求政府的恩赐，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足够说明二者的区别了。”^③ 在空论的社会主义到处泛滥、而以社会主义

① 《布朗基文选》第47页。

② 同上，第59—60页。

③ 同上，第93页。

者自诩的路易·勃朗在革命中贩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时候，布朗基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坚贞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正是布朗基的这种精神，赢得了马克思的尊敬。马克思称他为“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

马克思对布朗基的支持和肯定是有原则的，也是从法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的。在马克思主义尚未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在法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尚未建立的时候，布朗基的主张比较起来最能反映工人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更是如此。布朗基的弱点和局限性是当时法国工人运动不够成熟的一种反映。马克思正是从这种具体情况出发，对布朗基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初期，马克思曾经通过拉法格影响布朗基，争取他和他的信从者加入国际；六十年代末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又通过拉法格促进布朗基主义者同左翼蒲鲁东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日益传播，法国工人党的建立，布朗基因年迈和长年被囚，影响和作用已大不如前。马克思在著述和书信中也很少提到他了。

马克思对布朗基的肯定，只限于他的积极的一面。对他的弱点和错误，马克思是进行严肃批评的。他不容许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混为一谈。布朗基的历史观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他认为“正义是社会机体的酵母”^①，“共产主义是普及教育的必然产物”^②。布朗基的经济观点是混乱的。他虽然真诚地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但却缺乏对无产阶级的科学概念。他不信任群众性的政党，以为依靠为数不多的具有高度纪律的职业革

① 《布朗基文选》第126页。

② 同上，第85页。

命家的密谋，便可导致革命的成功。对于密谋策略，马克思从来是深恶痛绝的。可见，马克思对布朗基的支持和肯定，是从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水平出发的。支持运动中积极的因素，并通过这种支持教育工人群众，以提高运动的水平。在这方面，马克思对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布朗基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所采取的既从实际出发又不丧失原则的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租让是特殊形式的战争

刘彦章

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由于反革命势力的敌对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怠工，苏维埃政权的处境极其困难：缺少机器、原料和燃料，大批工厂停产，许多工人失业；农业也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尽快恢复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电气化计划，并争取在最短的期限内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除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外，还要利用外国资本和国外的生产资料，得到它们的产品，学习它们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各种知识。这样，苏维埃俄国就有必要向外国资本家实行租让政策。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租让制是苏维埃国家和外国资本家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协议。他说：“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们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们愿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普通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①

但同时列宁还认为租让不是和平，他说：“如果认为租让就是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7页。

和平，那当然是十分错误的。”^①租让是战争的继续，是一场特殊形式的战争。这场和平建设时期的战争，同真刀真枪的战争一样，也是你死我活的，“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②

总的说来，这场特殊形式的战争，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有好处的。如果这场战争进行得成功，政权就可以得到巩固，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既然是战争，就必然存在着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危险性。

为了成功地实行租让制，必须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既要给承租者一定的好处，争取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承认与投资，又要保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受损害。列宁对此非常重视，他亲自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租让政策，亲自领导了苏维埃俄国的租让实践。在这里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同资本主义进行一场特殊形式的战争。

据当时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格·瓦·契切林的回忆，列宁在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第一个提出苏维埃国家要实行租让制。列宁指出，我们在柏林外交活动的主要手段，是使德国资本家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合作。^③1918年8月31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面，成立了有列宁、洛莫夫、米柳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5页。

② 同上，第416页。

③ 参看《苏联历史》1959年第4期第34页。

亨、勃朗斯基参加的对外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委员会在列宁的参加下，制定了租让提纲。1918年5月，制定了发展美苏之间经济关系的计划。1920年3月25日，列宁签署了《关于租让制的提纲》。1920年10月16日，人民委员会听取弗·巴·米柳亭关于租让制的报告，并决定委托由列宁、米柳亭、库尔斯基、列扎瓦、谢列达组成的委员会修改和校订租让法令草案。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库尔斯基的报告，批准了租让法令。1921年3月22—28日，列宁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负责制定的《租让合同基本原则草案》“非常气愤”，认为是“一堆毫无意义而又可笑的琐事（禁止篝火之类），要紧的事却没有强调出来”，“淹没在官僚主义的废话里了”。^①所以，列宁亲自起草了《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列宁的这一文献成了人民委员会3月29日通过的《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的基础。

列宁在领导制定租让政策的同时，还领导了贸易和租让的实践活动。布列斯特和约规定恢复俄德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了制定发展经济关系的条件，建立了俄德贸易委员会。俄德贸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18年5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副工商业人民委员勃朗斯基代表苏维埃俄国方面作关于恢复俄德经济关系的条件的报告。在他作报告的前夕，即1918年5月14日，列宁给他写了一张便条，就苏维埃俄国代表在5月15日会上的发言问题作了指示。^②在5月15日开会的当天，列宁又亲自与勃朗斯基谈话，表示赞成他的基本论点。^③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与其它国家扩

① 《列宁文稿》第8卷第496页。

② 同上书第7卷第97页。

③ 参看《列宁年谱》俄文版第5卷第457页。

大经济联系的计划未能实现。1918年，苏维埃俄国与瑞典的各个公司签订了二十多项贸易合同。按照这些合同，瑞典向俄国输入犁、镰、分离机、锅驼机、缝纫机、电话机、纸张等产品。俄国向瑞典输出亚麻、大麻纤维、有色金属、矿物油、锡等产品。俄国与丹麦也签订了各种贸易合同。1919年初，瑞典政府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参加了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原先建立的贸易关系实际上都中断了。列宁就这个问题听取了俄罗斯联邦驻斯塔的纳维亚国家的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报告：瑞典工商界人士非常愿意与苏维埃俄国保持贸易关系，但协约国的大使馆，尤其是法国的大使馆，采取了包括威胁在内的一切措施，迫使瑞典与苏维埃俄国断绝了关系。由于同样的原因，俄国与丹麦的关系也断绝了。

在这一时期，尽管人民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谈租让问题，但大部分租让谈判都已中断，只审查了关于“北方大铁路”的租让草案。“北方大铁路”即鄂毕河—科特拉斯—摩尔曼斯克铁路线。关于建设这一铁路线的租让的倡议者是阿·波里索夫和挪威籍人爱德华·甘涅维格。早在1914—1916年就为建设这一铁路进行了勘探，并制定了修建计划。1919年2月4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修建“北方大铁路”问题，列宁为此写了决议草案^①。但是，在谈判过程中，由于承租者提出了苏维埃国家不能接受的条件，所以修建这一铁路的租让未能实行。^②

列宁领导制定的租让政策的出发点和具体租让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是：在俄国实行租让制不允许建立外国资本的势力范围，而是要在保证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里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金、设备和技术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

① 《列宁文稿》第3卷第109页。

② 《苏联历史》1959年第3期第35页。

生活状况。具体地说，苏维埃国家提供租让要符合以下条件：(1)不会带来重大损失，不会与那些已收归国有、能够正常进行生产和充分满足国家需要的工业部门竞争；(2)能够发展那些无法用自己的力量迅速发展的生产部门；(3)能够最小限度地消耗自然资源和居民的劳动力；(4)能够在最短期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总的生产能力；(5)已经正常生产的企业不实行租让。

列宁的租让政策对承租者的规定是：(1)承租者不得干涉俄国内部的经济政策；(2)必须遵守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法律，其中包括劳动法典、各种安全规程、卫生规定和保护矿藏、森林、鱼类及其它资源的特别法律；(3)必须遵守符合俄国和外国法律的科学技术规程；(4)不能在全国或整个工业部门实行垄断；(5)有责任改善租让企业中工人的生活状况，使其达到外国的中等水平；(6)不得限制俄国工人、工长和技术员以及政府的全权代表了解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等情况；(7)要受苏维埃国家的监督；(8)不享受外交豁免权；(9)租让企业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10)在租让合同的整个有效期间，必须保证所有建筑物和设备不受损坏，等租让期满后，将所有企业在充分开工的状态下移交。

对苏维埃政权的规定是：(1)在大面积租让时，不要提供整块的大片土地，而应采用棋盘式，以便承租者在提供给他们的黑色方块中所进行的勘探、勘测等，能为苏维埃政府在国家保留的白色方块中所利用，如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等；(2)苏维埃国家有权优先购买租让企业生产的产品；(3)苏维埃国家对租让企业提供的产品的支付办法，是允许承租者将他们生产的一部分有经济价值的产品运往国外，取得高额利润；(4)承认承租者的财产不受侵犯；(5)承认承租者有建设仓库、使用水路和铁线的权利。^①

① 参看《列宁文集》第20卷第148—149页；《列宁文稿》第3卷第325—327页；《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1—304页。

列宁领导租让实践非常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发展生产力，对巩固苏维埃政权有利，即使过去已经明文规定不租让的企业也要租让。例如，1918年规定只有新的建设工程才租让，老企业不租让，象巴库和库兹巴斯这样的大油田更是不能租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过去的这一规定，那些需要大批资金才能恢复、扩大和运用新技术的老企业要租让，乌拉尔、库兹巴斯矿区以及巴库、格罗兹尼油田也都要租让。国内战争结束后，几个大油田的形势都很严重。在格罗兹尼，设备遭到严重破坏，要恢复生产需要两至三千万以上的金卢布。在巴库，要正常地使用油井需要两亿五至三亿金卢布。当时巴库和格罗兹尼能够使用的油井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大多数油井由于有被水淹没的危险而不能生产。毫无疑问，在当时条件下，把这些企业租让出去，利用外国资本、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对恢复和发展苏维埃国家的石油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都是有好处的。列宁亲自研究了石油工业的形势。1921年2月1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亲自起草了石油租让的决议草稿，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草稿通过了决议，同意在巴库地区和格罗兹尼地区实行租让政策。^①

二

帝国主义战争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巨大灾难。要恢复世界经济，俄国作为一个世界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是经济学家凯恩斯，还是财政寡头万德利普都承认，恢复世界经济如果把俄国排斥在外，那是很不利的。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一有机会就把提高

^① 参看《列宁文稿》第10卷第445—446页。

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的设想相一致的。因此，各国资本有到苏维埃俄国承租的客观需要和他们从自己切身利益上考虑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外国资本的目的不是帮助苏维埃俄国，而是为了利用承租这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符合他们战略需要的，他们就兴趣很大，反之，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或甚至进行阻挠。例如，万德利普在给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的信中说：日本妨碍我们扩张势力，我们要同它打仗，而要打仗就得有煤和石油。堪察加是产煤和石油的。“假如你们把堪察加卖给我们，那我敢向你们保证，美国人民的热情就会大大高涨，使我们承认你们。”如果只是租给我们，那就不会产生这种热情。^①由于双方的目的、需要不同，在进行租让谈判时，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在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期间，帝国主义对待苏维埃国家的办法是武装进攻，而对发展具体的经济关系不予重视，并且拒绝向苏维埃俄国出口商品，在外交上不承认它的合法权利。所以，要赚钱的资本家当时即使愿意与苏维埃俄国进行租让和贸易谈判，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反对，也不能顺利地进行，已经签订的贸易协定也不能生效。在1919年的十个月里，苏维埃俄国在美国的代表机构与美国的三十二个州的九百四十一家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这些公司表示准备向苏维埃俄国出口自己的商品和从俄国进口各种原料。美国各公司答应向苏维埃俄国供应布鞋、机器、印刷机、食品，总额达一千五百万美元。此外，苏美还进行了在美国购买机车和铁路设备、农业机器和工具、汽车、矿山工业设备、纺织品和其它商品的谈判，总额几乎达三亿美元。1920年9月，美国大公司“万德利普辛迪加”的代表万德利普来到莫斯科，谈判关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5页。

于堪察加和东西伯利亚一百六十度以东地区经营渔场、勘探开采石油和煤的租让问题。他在1920年12月18日给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的信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建议。列宁在给他的回信中说，苏维埃俄国非常重视今后同美国的事务关系，“我们对任何合理的建议都给以极大的重视。我们主要致力于生产和贸易，所以您的帮助对我们来说极有价值。”^①为了同万德利普进行谈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并拟定了租让合同草案。以上这些贸易和租让谈判，都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而被迫中断。

在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召开的讨论经济和财政问题的热那亚国际会议上，围绕着租让问题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经济合作，而要奴役它。早在会议之前，即在1922年3月20日在伦敦召开的协约国专家代表会议上，法国专家就提出了以下建议：苏联必须在顿涅茨、库班、顿河、高加索和乌拉尔等地给外国人必要的特权；苏联必须承认俄国过去的全部债务，归还外国人的财产和土地。对于帝国主义者的这些无理要求，苏联当然不能接受。

在热那亚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格·瓦·契切林根据自己国家的需要提出，苏联准备向外国资本家提供森林、矿山和农业租让。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提出承租的先决条件：对属于外国资本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不垄断对外贸易、承认沙皇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停止向世界各国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等等。他们扬言，如果苏联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会承租。

苏联不可能同意外国资本家的这些要求，这些要求的实质是要剥削和奴役苏联人民。例如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务，如果

① 《列宁文稿》第8卷第473页。

苏联同意，每年就要拿出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来还债。所以，苏联代表严厉驳斥了这种妄图变苏联为他们的殖民地的企图，同时向他们提出了反要求，要求他们赔偿由于外国武装干涉给苏联造成的重大损失。

另外，外国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他们具有掠夺财富、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所以，他们在承租的时候，往往要价太高，提出许多苏维埃俄国难以接受的条件。这样，苏维埃俄国在与他们谈判过程中，展开了讨价还价的斗争。

英国的莱斯利·厄克特是工业家兼金融家，十月革命以前，是“俄亚联合公司”的董事长和四个大型矿山企业（克什特姆、里迭尔、塔纳雷克、埃基巴斯图兹）的老板。他与苏维埃俄国谈判的目的是承租他过去经营的这四个企业。苏维埃俄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同他于1921年6月中旬在伦敦开始谈判。列宁在1921年6、7月份给谈判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同意租让这四个企业，租让专用铁路线，保证承租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对期限、支付、提成等问题要讲讲价钱。1921年8月，谈判转到莫斯科进行，在这里起草了租让合同草案。1921年10月，厄克特中断谈判，参加反苏运动，企图以此来迫使苏维埃俄国作出更大的让步。1922年又重新恢复谈判，于9月9日在伦敦签订了初步合同。初步合同对苏维埃俄国的规定是：（1）凡属因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命令而使原属承租者的企业遭受的亏损，苏维埃方面应按查明的受损程度给予承租者物质资助（厄克特认为，这种资助就是对由于实行国有化而造成的损失赔偿）；（2）苏维埃俄国方面在合同最终批准后的两个月内，向承租者交付十五万英镑资助款，其余资助款向承租者支付债券，十五年内还清；（3）合同签订满三年后，开始向承租者加付三厘的年息；……①

① 参看《列宁文稿》第4卷第520—521页。

列宁认为，这一租让合同对苏维埃国家明显不利，他写道：“厄克特一面答应我们两三年后有收入，一面立即从我们这里拿钱。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建议否决这项租让。这是奴役和掠夺。”^①实行租让政策，就要给外国资本家一定好处，无产阶级国家相应要受到一些损失，这是肯定的，因为外国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是掠夺者，他们承租“不是单纯地为我们效劳，而是为了大大地捞一把”。^②但他们究竟想捞多少，列宁开始时也估计不足，认为“给资本家一定百分比的利润，譬如百分之八十”就行了。但是，外国资本家贪婪无厌，他们要攫取的利润不是百分之八十，而是百分之一千甚至百分之几千。^③仅仅高额利润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得到治外法权，要控制苏维埃俄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苏维埃国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善人民生活，希望尽快地、更多地与外国资本家发展经济关系，达成租让协议。因此，1920年11月23日关于租让的法令明文规定在签订租让协议时要给外国资本家一定的好处；给承租人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他们有权运出国外自行销售；如果大规模地采用了特殊的技术革新，承租人将获得商业优先权；根据租让企业的性质和条件，将提供长期租让，以保证充分补偿承租人可能受到的损失和投入租让企业的技术设备；等等。^④此外，为了顺利达成租让协议，苏维埃国家还准备向承租人付出高额利润，“只要能够恢复经济，不惜多给资本家一些利润。”^⑤苏维埃国家为了自己的巩固和发展，可以说是作出了最大的让步和妥协，但直至1921年3月还没有签订一个合同，甚至到列宁逝世之前达成协议而生效的租让也是极

① 参看《列宁文稿》第4卷第3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1页。

③ 参看《列宁文稿》第4卷第7页。

④ 同上书第3卷第325—326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380页。

其个别的。

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个别上层人物对苏维埃俄国抱着友好的态度，例如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雷蒙德·罗宾斯。罗宾斯是美国在1917—1918年驻俄国的正式代表中唯一支持与苏维埃俄国建立各种关系的人，苏维埃国家高度评价罗宾斯的活动，列宁不止一次地接见他，与他交谈红十字会代表团的活动和发展美苏之间关系问题。但美国政府却不支持他，于1918年4月底指示他离开苏维埃俄国。

当时苏维埃俄国与美国药品和化学制剂联合公司的代表阿·哈默和勃·米歇尔的谈判比较成功，签订了第一个对苏维埃俄国有利的合同，这种情况是极其个别的。1921年11月初，人民委员会批准了与他们签订的两个合同：苏维埃俄国租让乌拉尔的石棉矿和美国提供一百万普特粮食换取乌拉尔的工业品。列宁强调，与美国人签订的这两个合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我们要支持他们的事业，通向美国实业界的道路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①列宁严格执行同哈默签订的合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按照同哈默签订的合同发往美国的货物质量低劣，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列宁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是“出丑”。列宁指出：“一定要进行监督，做到绝对严格，一丝不苟地履行这个合同中规定的我方义务，而且对整个事情都要更仔细地监督。”^②

三

达成租让协议以后，在执行租让协议的过程中，苏维埃国家面

① 参看《列宁文稿》第9卷第527、567页，第10卷第234页。

② 同上，第660页，第10卷第169页。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性，还要在各个方面同承租者继续进行斗争。

在群众中，有不少人对租让制想不通，认为租让就是出卖俄国，提出宁愿再受三年饥寒，承担三年义务，也不愿意“把我们的亲娘俄国用租让的办法卖掉”。还有的人对租让制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不能满足工人的需要，外国资本家会不会以此来煽动工人反对苏维埃政权？俄国的里亚布申斯基^①之流会不会同英美资本家一起出现？租让企业中的俄国工人会不会要受到外国资本家的控制？会不会打倒了国内资本家，封闭了一个“苏哈列夫卡”^②，但又把外国资本家请进来，开设许多新的“苏哈列夫卡”？租让会不会带来从内部瓦解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危险？

列宁针对认为租让是出卖俄国的思想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签订的每一个租让合同都是临时性的，都受到一定期限、一定协议的限制，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利用外国资本家的资金、生产资料和各种技术知识，根本谈不上出卖俄国的领土。但是，列宁认为，群众提的这些问题是可能产生的，危险性是存在的，他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所以列宁赞扬群众的这种革命热情和革命责任感，他说：“我非常欢迎这种传播很广的情绪。”^③这种情绪说明，经过革命锻炼的群众获得了足够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使他们把摆脱资本的压迫看得重于一切，所以时刻提高警惕，非常警觉地对待每一个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步骤。实行租让以后，虽然苏维埃俄

①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里亚布申斯基(1871—1924)是莫斯科大银行家和企业主，反革命头子之一，曾参予鼓动和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逃亡法国，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反革命活动。

②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现名集体农庄广场)上的市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和粮贩进行黑市活动的中心。从那时起，苏哈列夫卡成了投机倒把的同义语。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苏哈列夫卡市场根据1920年12月13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被封闭。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9页。

国得到了外国资本、生产资料和产品，学习了科学技术，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了政权，这是主要的方面，但的确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后果。首先，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控制苏维埃俄国国民经济、干涉内政、恢复资本主义关系的危险。^①其次，随着租让事业的开展，仇视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派遣特务来刺探情报，搞破坏活动。^②第三，实行租让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使人民受到腐蚀。^③因此，列宁认为，租让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的继续，是一场新形式的战争。既然是战争，就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列宁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危险，重视它，但并不害怕它，也不是“从伤感的观点”^④看待它，而是想办法与它进行斗争，并争取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列宁的斗争办法是：第一，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识破里亚布申斯基之流，抓住形形色色的“洛卡尔特”，^⑤打击国内外敌人颠覆苏维埃国家的破坏活动。列宁对与他们的斗争充满信心，他说，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之初还不很严密的时候就能对付他们，在成立几年以后，对敌斗争有了更多的经验，就更能取得胜利了。第二，加强共产主义宣传，加强共产主义教育，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列宁说：对于资本主义习气，“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来抵制。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战争竞赛”。^⑥在这种战争中，同在国内战争中一样，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战胜国内外的一切阶级敌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80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5页。

③ 同上，第416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380页。

⑤ 洛卡尔特是英国间谍、外交官，他曾主持1918年上半年英美法外交使团代表在莫斯科策划的白匪的反革命阴谋。

⑥ 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

四

列宁领导租让这场特殊形式的战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部分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把租让制接过去，作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的手段；另一部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则把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租让政策作为一条罪状加以攻击，以达到他们取代布尔什维克的目的。

国际资产阶级在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遭到失败以后，对于苏维埃政权主动提出实行租让制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认为在战场上没能获得的东西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获得了。例如，美国的沙文主义者斯帕戈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欢迎苏维埃俄国实行租让制，一谈到租让制，他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①。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列强签订租让合同，证明共产主义遭到了完全的破产。他写道：“我想象不出关于共产主义完全破产及其纲领完全失败的更好的证明了。”^②列宁认为，恰恰相反，这不是共产主义破产和失败的证明，而是苏维埃共和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战胜全世界资本家的最好的证明，因为资本家虽然明明知道同苏维埃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会增强苏维埃国家的力量，但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而与它开展贸易，进行租让谈判。^③

流亡国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路标转换派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租让政策是放弃自己过去的世界革命的纲领，是重新回到“文明世界”，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反对者都要尽力促进这一演变过程的发展。

① 《列宁文稿》第4卷第10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5页。

③ 参看同上，第375页。

在苏维埃国家内部，立宪民主党反对租让制。他们为了达到破坏租让制的目的，一方面挑拨外国资本家不来承租，胡说什么苏维埃俄国的租让制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承租者都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他们煽动国内人民反对租让制，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为了使自己免于崩溃，要把俄国分成几部分分别拍卖给外国资本家。一些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巴黎集会通过决议说，实行租让制就是允许外国人对俄罗斯国家的财富进行掠夺，是损害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是污辱国家和民族的感情。曾担任过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也认为实行租让就是走殖民地道路。他说，革命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但我们摆脱革命的办法不应该是实行租让制这一成为西欧殖民地的道路，而应该通过建设自由文明国家的道路。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坚持把企业从俄国所有者手中夺走，转而租让给外国资本家，这是反对自己本民族的行为。^①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反对租让制。例如，1918年4月25日孟什维克的《前进报》上刊载了有名的孟什维克伊苏夫的提纲，他在提纲中说：“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自始就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制和泰罗制，实行黑名单和品行恶劣证明书制度。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而变成资产阶级任意剥削的牺牲品”。^②1921年1月，孟什维克为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租让法令，提出了自己的租让提

① 参看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苏维埃俄国经济纲要》1923年柏林俄文版第158、161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7卷第322页。

纲。他们在提纲中断言,吸收外国资本的租让形式,会为资本主义国家干涉俄国内政提供有利的条件。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要把俄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此外,他们还到处进行反对租让制的破坏活动:散发反革命传单、煽动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枪杀共产党员,等等。^①

列宁与立宪民主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破坏租让制的言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列宁指出,这些指责苏维埃政权“污辱国家和民族的感情”、“与资产阶级妥协”、“培植托拉斯”、“采用泰罗制”的人,就是“同克伦斯基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的朋友们”,就是“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装的策列铁里的同僚们”,就是“用响亮的词句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李伯尔、唐恩之流”。列宁把他们已往的言行同他们对待苏维埃政权实行租让制的态度联系在一起,认为真是“妙不可言”!这些典型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居然打起反对资产阶级的旗帜,真是绝大的讽刺!列宁一方面揭露他们的造谣诽谤和戳穿他们的假面具,一方面号召人民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更有成效的、更加周密的工作”来战胜他们。^②

在俄国共产党(布)内部,列宁的租让制遭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指责说:“由于恢复了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倒会降低无产阶级的阶级自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它会束缚工人阶级,它会激起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以及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阶级中间仇恨‘资本家怠工者’的心理极盛的情势之下,为了实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反对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149—150页。

② 同上,第150页。

个无产阶级政党毁灭掉。”^① 他们还说，如果对国际资本的进攻实行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无产阶级就不能保全自己。列宁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些言论，证明他们中了孟什维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奸细们的挑拨诡计；这些言论既是反对在国内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也是反对向外国资本家实行租让政策的。^②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深刻批判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些错误观点。由于列宁坚持当时对苏维埃国家有利的租让制，批判反对租让制的错误思想，党内大多数同志逐渐认识到了租让制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赞同实行租让制。所以，1921年3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实行租让制的决议。^③

但是，党内在实行租让制问题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在1921年4月11日举行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工人反对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以及达·波·梁赞诺夫又挑起了关于租让制问题的争论。施略普尼柯夫反对向外国资本家实行租让，他认为应该把企业租让给俄国工人。列宁驳斥说，这种看法太可笑了。如果租让给俄国工人，我们就要保证供应燃料等物质，但我们连自己最重点的企业都不能保证供应，所以这种作法是不严肃的。如果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就可以把一切必需品都从国外运来，这种作法对于我们发展国民经济是有利的。租让给俄国工人与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的区别就在这里。^④

列宁和俄共（布）既揭穿和反击了苏维埃政权反对者的造谣、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7卷第322—323页。

② 参看《列宁文稿》第4卷第9—10页。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109—110页。

④ 参看《列宁文稿》第4卷第10—11页。

诽谤和中伤，又驳斥了党内反对派的指责。经过多方面的斗争和论战，苏维埃俄国在实行租让制方面不断取得成就，1921年以后比以前有了较大的进展。

葛兰西与“工厂委员会”运动

毛 韵 泽

1918年11月，经过四年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意大利付出的代价也是可观的，士兵牺牲了六十万，因伤残而失去工作能力的有七十万。其中农民和农业工人就占百分之四十六。但是，这场灾难结束，另一场经济危机的灾难接踵而来。意大利从1914年到1920年里拉贬值百分之八十；生活指数扶摇直上，拿米兰的粮价为例，1912年为100，1919年6月份则是344.9，资产阶级政府弄得民不聊生。

1920年4月，都灵的工人发动了一次大罢工。他们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占领了工厂，成立了“工厂委员会”，都灵成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彼得堡”。而这个运动的发动者和理论家却是几个年青的共产党人，其中最出色的领导人要算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本文就该运动的始末、失败的原因以及葛兰西的“工厂委员会”的主要思想作一个概要的述评。

一、“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号角 ——《新秩序》的出版

陶里亚蒂说过，《新秩序》这份报纸是“在都灵大学诞生的”^①。

① 约翰·卡麦特《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196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英文版第17页。

《新秩序》的创始人除了葛兰西以外，还有陶里亚蒂、特拉契尼和塔斯卡，他们当时是都灵大学的学生，又都是青年社会党人。《新秩序》派的核心是在1912—1914年形成的，那时他们在一起办了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杂志，起先取名《未来城》，后来更名为《新秩序》。大战一开始，杂志没有办下去，特拉契尼和塔斯卡被征入伍；陶里亚蒂尽管体格检查没有通过，但通过考试还是进了陆军医疗队；只有葛兰西因健康情况不佳，又是驼背，没有入伍。他从1915年起进了社会党办的《人民呼声》周刊当了一名职业记者。1916年起，他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写专栏文章。

1916—1917年，葛兰西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等著作。但是直到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他才知道列宁的名字并阅读列宁的著作。

意大利的新闻封锁极严，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迟迟才到来。3月18日，沙皇被推翻；4月29日，葛兰西在《人民呼声》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俄国二月革命的札记，其中写道：“我们相信，俄国革命就它的行动来看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因此，其结果必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①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葛兰西于12月24日在米兰版《前进报》上发表了《反〈资本论〉的革命》。在这篇论文中，他高度赞扬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成就，他把这一切成就比作革命意志战胜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证明。他写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化）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对经济

① 阿尔斯坦·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传记》1977年伦敦英文版第83页。

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以便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①。

葛兰西批评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由于死搬马克思的教条，因而陷入了经济宿命论，这是对的，但是，他把俄国革命同马克思对立起来，这是很大的错误，例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②

1918年11月，世界大战一结束，葛兰西的同学和朋友陆续回到都灵，以前的年青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立刻重新组成了。当然，他们当中的首要人物是二十八岁的葛兰西，他在《人民呼声》周刊和《前进报》的工作中已积累了一些新闻工作的经验，在工人读者的心目中有很好的印象；其他人是二十六岁的陶里亚蒂，他曾经是都灵大学的高材生，也是职业记者；二十四岁的特拉契尼，他是都灵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机智善辩；还有是二十七岁的安吉洛·塔斯卡，他在战前的工会活动中就很活跃，同工会领袖有广泛的联系。1919年4月底，他们四人在《前进报》葛兰西的办公室商量的办一份《新秩序》周刊作为《前进报》的辅助刊物。最后由塔斯卡设法从工会领袖和知名人士那里筹措了一笔六千里拉的资金。1919年5月1日，《新秩序》周刊第一期出版。由塔斯卡任主编，该刊第一期编者的话中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机关报”。葛兰西在一年以后写道：“1919年4月，当我们决定，我们四五个人开始出版这份刊物《新秩序》……我们是谁？我们代表什么？我们带来什么信息？啊！在

① 《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1978年伦敦英文版第1卷第34—35页。

② 同上，第34页。

会议^①中能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只是一件东西，这就是对含糊的无产阶级文化有一种含糊的激情”。^②也可以那么说，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行动的激情，在工人中进行工作，进行文化革命。从第一期到第六期都是文化教育的文章，从第七期开始由葛兰西取代塔斯卡担任主编后，才吹响了组织“工厂委员会”的号角。

二、“工厂委员会”运动始末

1919年2月，意大利金属加工工人联合会同资方的汽车托拉斯缔结的一份合同中，“内部委员会”得到了资方正式承认。葛兰西在同都灵一些有高度觉悟的工人不断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这些内部委员会应当改造成为“工厂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准备人员和组织，以便随时接收工厂中的管理权”，同时，“用新的秩序组织整个社会生活”。葛兰西从俄国的革命中受到了启迪，那就是没有苏维埃就不能搞革命，但是在意大利有什么组织可以同苏维埃相比的呢？他回答说：

“是的，在意大利的都灵有工人政府的萌芽，苏维埃的胚胎，这就是内部委员会，让我们研究这个机构吧！”^③

1919年5月1日，《新秩序》出版以后，葛兰西在编辑部提出这个问题时，塔斯卡认为，在没有同工会领袖协商以前不能立即开始组织“工厂委员会”的鼓动工作。于是问题就搁浅了。

6月中旬，葛兰西在陶里亚蒂和特拉契尼的赞助下替代塔斯卡出任主编，因为他们都认为要开始进行非正式的鼓动，于是6月

① 指筹备出版《新秩序》周刊的一次会议。

② 葛兰西《〈新秩序〉纲领》，《新秩序》1920年8月14日。

③ 葛兰西《委员会和工会》，《新秩序》1919年10月11日。

21日在《新秩序》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内部委员会的文章，由葛兰西同陶里亚蒂执笔，题目是《工人民主》，其中写道：“今天，‘内部委员会’约束着资本家在企业中的专横，起着仲裁机构和惩戒机构的作用。明天，当它发展起来并履行新的职能时，则将成为无产阶级政权机构，以便在执行企业的技术领导和行政管理的一切有效职能方面代替资本家。”①

在这期间，葛兰西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工厂中的活动。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陶里亚蒂、特拉契尼和我被邀请去参加研究小组和工厂的会议。内部委员会请我们参加了选举车间工人代表和收会费人员的集会。我们先走了一步，把内部委员会的发展问题，也就是《新秩序》的思想提出来作为讨论的中心问题，而无产阶级的‘自由’作为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的重点。对我们和我们的拥护者来讲，《新秩序》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刊’。工人热爱《新秩序》……因为在报刊中，他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斗争：我们怎样才能争得自由？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②

《新秩序》提出来的设想在各工人团体的讨论中受到工会官员的顽固抵制，因此，在7月12—26日的文章中，葛兰西加强了对工会的回击。他在《夺取国家》一文中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运动无非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从属现象。工团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具有目前这种形式和执行目前这种职能的工会看作是劳动者联合的一种永久不变的形式。但是历史是个继续不断的过程，机构的产生和衰落是由于客观条件改变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成立新的机构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体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施。无产阶级国家的胚胎是工厂委员会。

① 《新秩序》1919年6月21日。

② 《新秩序》1920年8月14日。

两星期以后,在另一篇文章《拥护共产国际》中,葛兰西号召群众支持受围攻的俄罗斯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他提到国际性的罢工被法国劳工总同盟领导人和意大利铁路工会领导人出卖了,并主张:“必须扩大战争期间出现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职权范围,并将它们纳入国内的和国际的一定的体系,必须建立一个反国家的体系。”^①建立这一组织是意大利社会党共产主义派的工作。

1919年8月31日,葛兰西在布里维蒂·菲亚特工厂的一次报告非常成功,此后该厂的每个车间选出了车间代表。9月和10月,金属加工工厂一个接一个地采取了这个制度。10月底,都灵几乎所有的工厂选出了车间代表和内部委员会。

但是,就在这时,在车间代表同地方劳动协会(工会领导的地方组织)的改良主义领袖之间出现了敌对行动。第一次冲突是在劳动协会接受地方行政当局禁止群众对邓南遮^②占领阜姆举行群众抗议引起的。10月17日,新选出的内部委员会(即各工厂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一致通过决议认为,劳动协会的命令是一种“倒退”的表现,并号召工会组织承认这个工人直接代表的新制度。三天以后,10月20日,内部委员会进一步召开了会议,由各内部委员会选出一个代表组成“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帮助协调各工厂委员会的活动,还起草了一份政策纲领,此外,讨论了工厂委员会同工会的关系。这是10月后半月新组织碰到的新问题。

10月31日,车间代表的全体会议讨论了10月20日任命的

① 《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41—42页。

② 加布里埃勒·邓南遮(1863—1938)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家。1920年1月,凡尔赛条约被批准,只是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领土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南斯拉夫不承认意大利对阜姆的主权。1919年9月,邓南遮曾率领一群狂热之徒占领阜姆,建立了一个不巩固的政权,这个政权为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开了先例。

“研究委员会”起草的《车间代表纲领》，《纲领》中提到“委员会中的工会会员毫无疑问地承认，必须遵守工会在经济运动中决定的纪律和命令（不管是部分的，还是集体的），可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工会的目标是由工人群众的代表——工厂代表提出来的。”还规定：“某一个区的一些代表，如果是同一个手工业或产业工会的会员，那么他们就将参加手工业大会和工业大会。大会将从他们自己成员中选出工会地方分会的执行委员会。”“关系到某一工种的经济协定，由该工种的大会批准。”这个《纲领》由车间代表一致通过。会议重申：工会组织应当直接表达会员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只有在以车间为基础的机构才能有机地表现出来。

葛兰西对于工会的看法要比《纲领》激进。他认为，工会确实有效地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工人的利益，限制了厂主的权力，强使他们承认工人在工资和劳动时间等问题上的权力，使工会这个庞大组织在社会上得到合法的承认。由于工会的任务是在一个竞争的劳动市场上捍卫雇佣工人的利益，^①因此工会是资本统治的历史时期中典型的工人阶级组织，“它所履行的职能是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制度不可分割的”。^②工会完全同资本主义社会浑成一体，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是一个基本要素，可是它的成功与否要依靠两个条件：一、在任何特定工业中，它有能力组织大部分工人，以便统治劳动市场；二、它有能力对工会会员执行有效的纪律，以便使厂主信任工会有能力缔结有效的协议。当然，这样就需要有永久性的专业机构和一批专职官员来经办这些事情。可是这些官员很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他们表面上代表工人的利益，但是同工人却老死不相往来，^③工会官僚可能在起草备忘录

① 葛兰西《工厂委员会》，《新秩序》1920年6月5日。

② 葛兰西《工会和委员会》，《新秩序》1919年10月11日。

③ 葛兰西《工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新秩序》1919年10月25日。

和发表讲演是“行家”，而在工业和管理问题上确实不是“行家”，这些问题也从来不在工会全体会议上讨论。^① 工会不能成为将来“生产者”的社会基层组织，它也不能体现出“工业自治”。总之，这些官僚限于日常的行政工作和谈判事宜，是不会赞成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实际上也是这样，改良主义者控制了意大利所有的主要工会。

可是尽管工会不能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葛兰西认为工会对革命的成功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它有纪律的力量和有中央集权”，能“协调生产力量，并在工业方面打上了共产主义结构的烙印”，^② 到将来，工会将“协调”和“贯彻”任何地方的其他工人所采取的决议，这些官员将来要成为“行政上的文职人员”，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废止由“达官贵人”作最后裁决者。^③

不久，“工厂委员会”运动不再局限于金属加工工人，都灵汽车车身制造厂工人在11月29日通过决议拥护《车间代表纲领》的思想。12月11日，社会党都灵支部投票赞成这个《纲领》；化学和轮胎工会都灵分会的工人在听了葛兰西的讲演之后，举行了会议一致通过成立“工厂委员会”；甚至金属加工工厂的技术人员早在12月6日投票支持成立“工厂委员会”，并催促劳动协会系统研究这个问题。总之，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在都灵的地位面临着严重威胁。他们企图把内部委员会吸收到工会结构中去，显然没有得逞。

在新的一年里，“工厂委员会”在都灵工业界继续得到发展。1920年，十四个城市的化工厂成立了“工厂委员会”。1920年2月17日，金属加工工厂在塞斯特里一波南特、科尔尼利亚诺等地的造船厂由于工资谈判破裂，工人占领了他们的工厂达三、四天，到工

① 葛兰西《群众和领袖》，《新秩序》1921年10月30日。

② 葛兰西《党和革命》，《新秩序》1919年12月27日。

③ 葛兰西《达官贵人》，《新秩序》1921年6月23日。

资达成协议后才归还厂方。

3月7日，厂主组织工业总同盟新任总书记齐诺·奥列维蒂扬言，两个不同的权力在工厂中不能同时并存。3月20日，他同德贝奈德蒂（工业同盟主席）和乔万尼·阿格纳里（菲亚特工厂厂主）通知都灵行政长官说，他们建议进行一次总停产来粉碎“工厂委员会”运动。当时他们已经做好了镇压的准备，几天以后，他们借口“工厂委员会”擅自改拨时钟（工人反对政府规定的夏天标准时间，而主张仍沿用以前的标准时间），由菲亚特工厂首先实行总停产。几天内，都灵其他工厂工人开始支援受停产影响的工人；4月3日，受停产波及的工人达九万人；4月13日，都灵和全省五十万工人宣布总罢工。据马里奥·蒙塔尼亚纳（“研究委员会”委员，《新秩序》的撰稿人）的报道，这次总罢工一共十一天，使都灵和全省的生活完全瘫痪了。电车、火车、公用事业和许多商业停止了工作，整个工业系统也这样。^①在皮蒙特省部分地区的农民为了维护他们的劳动的等价交换也起来罢工。都灵委员会立即起来联合他们，把他们的组织作为并行的组织。这次罢工达到高峰时有五十万工人参加，牵涉到四百万人。

葛兰西在这期间同都灵一些领导人要求社会党、劳工总同盟扩大罢工，但是它们拒绝支持运动的扩大，于是运动在十一天以后（即4月24日），工人根据厂主提出的条件回工厂复工。

厂主提出的条件是苛刻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工厂委员会”，恢复到以前“内部委员会”的那种职能。4月23日，厂方的都灵工业同盟同工会的劳动协会最后签署的协议中有如下的规定：

- (1) 内部委员会同工人的相互联系必须在工作以外时间进行，一周内概无例外；

^① 约翰·卡麦特《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英文版第245页，注22。

(2)内部委员会同工厂管理部门的相互联系可以在工作时间内进行;

(3)如有紧急情况,工人得首先向工头(或领班)申诉,在得不到满意答复时,才可要求管理部门允许内部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进行调停,或者必要时由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调停;

(4)内部委员会在工作时间要同管理部门进行磋商,须由他们自己提出请求,然后由管理部门召集;在计件工资制的情况下,以他们过去计时工资制时期的平均工资支付;否则他们的工资按计时工资加一定的补差结算。^①

这些新的规定说明,工厂内不但不能再成立“工厂委员会”,就是连“内部委员会”也丧失了它以往在工厂内的许多权力。

三、“工厂委员会”的理论基础

葛兰西从1918年起对苏维埃这个组织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工人代表制,如英国的工长运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经验以及丹尼尔·德·里昂的思想,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俄国的革命和列宁的著作。

另一方面,葛兰西也研究了意大利工人的传统组织,认为当时的社会党和工会不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社会党是“先锋队”的组织,不可能把整个工人阶级吸收进去;工会只是作为某种特殊行业的会员代言人,它只提出有限的目标,例如提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等,至于工人阶级的前途问题,它就不加过问。而且,这两个组

① 马丁·克拉克《安东尼奥·葛兰西与失败的革命》1977年英文版第104、108—109页。

织是属于资本主义体制范畴的。因此需要组织一个新的机构去补充这两个组织的不足之处。

意大利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工厂中就成立了“内部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由车间的工会会员中选出的，都灵的很多工厂都在1918年前后成立了这种委员会，特别是在金属加工工厂中，实业家和厂主为了取得技术工人的合作，以保证利润的不断提高，就向工会作工资和工时上的让步，采取计件制，并承认“内部委员会”的权限。但是“内部委员会”的权力有限，只是处理工资协议、劳保等问题的纠纷。委员会有委员五人，由金属加工工会联合会提名、讨论并通过，谈不上是充分的民主选举产生的。而且，委员们代表工会领导人的观点，而不代表全体工人的意志。

葛兰西认为，要把这种委员会改造成更能体现出新统治阶级（生产者）的价值的“工厂委员会”，那才合乎革命的需要。“工厂委员会”的代表由各工厂车间的代表中选出，凡是工厂中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无产者和“挣工资者”都享有选举权。“工厂委员会”要把“内部委员会”从厂主施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使它在一切管理和领导的职能中代替资本主义，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机构。口号是“车间的一切权力属于车间委员会”；车间代表的职务是：监督劳动协议的执行，制止工头滥用职权，防止资本家转移固定资本，研究产量、成本、亏损等问题，处理和决定各方面提出的技术革新。“工厂委员会”还管职业教育和艺徒教育，解决工人同工头或厂方的纠纷。“工厂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同厂方有同样的权力在工厂中张贴告示，执行委员部还出版工厂双周简报，使工人了解整个工厂情况，设立合作社性质的工厂小卖部，便利工人生活。“工厂委员会”的任期是六个月，选民有罢免权，对不称职的委员可以随时撤换。1919年10月31日，都灵工厂的代表举行了一次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上述内容的《车间代表纲领》。

因此,根据葛兰西的看法,“工厂委员会”应有如下特征:

(1)它能统一和动员工厂工人的全部力量。葛兰西在工人运动中注意到自发力量的作用。如何把这些自发的力量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去,也就是把革命的主人公——群众组织起来,这是他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他在《新秩序》周刊第一篇社论中写道:“必须给这些无秩序的混乱力量提供一个永久性的形式和纪律。必须吸收、组织和加强这些力量。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必须转变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这个社会进行自我教育、取得经验和促使有义务建立国家政权的各个阶级树立责任心。”^①“工厂委员会”不是建立在作为资本奴隶的雇佣工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者真正积极性的基础上,它是根据每个行业、劳动部门的班组由工会会员和非工会工人选出的基层组织,这种组织能把全部工人吸引到自己的活动中来;由于选举人直接选出自己的代表,他们信任自己的权力机构,他们的自发力量也就受到了控制和运用,不会成为无秩序的冲动。“工厂委员会”的存在,能促使工人对生产直接承担责任,激励他们去改善工作,树立自觉自愿的纪律。在工厂中,由于每个工人都关心自己的“工厂委员会”,他们愈来愈意识到自己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体系中作为“必要环节的作用”,这样,再落后的工人也能从消极雇佣工人的态度转变为积极主人翁的态度,因此“工厂委员会”能把积极的力量和消极的力量,有意识的力量和自发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使他们各得其所,各司其职。

(2)它是工人国家的初步形式。“工厂委员会”在工厂中领导生产,但首先是在工厂中摧毁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在政治领域中夺取国家。“工厂委员会”能使工人了解各种问题,包括建立一个新国

^① 《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英文版第1卷第66页。

家。葛兰西写道：“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型。无产阶级国家中固有的一切问题在委员会中都有……委员会是互相教育和发展新社会精神的最有效的机构，这种新的社会精神是无产阶级从劳动团体的丰富生动的经验中形成的。”^①

“工厂委员会”尽管是萌芽时期的国家，但它是逐步增长荣誉感、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容器。在葛兰西看来，夺取国家是个革命发展的进程，这个进程扎根于工人进行的斗争中，要到全国的“无产阶级机构网”（即“工厂委员会”）形成以后，这个进程才算结束。无产阶级存在的总体（它的经济和政治、它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它的总的思想意识）通过“工厂委员会”就会在这个进程中日趋改观和逐步完善。葛兰西写道：“工厂委员会……是今天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的一个历史性组织……工人作为生产者成了工厂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正象一个公民成为民主议会国家的一名成员一样。”^②葛兰西认为，革命的领域就是在生产领域，“工厂委员会”是在生产地点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凡是国家面临的一切斗争，这里都有；所有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问题都同“工厂委员会”有关系，因此“工厂委员会”就是将来的国家。

（3）它能避免官僚主义和个别人的独断专行。工厂范围小，所有工人，不管是技术工人，还是粗工，不管是工会会员还是非会员都参加民主管理。“工厂委员会”可以作为集体和团结的最初代表机构，人的关系中原来是“公民”的概念逐步被“同志”的概念所代替。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必须是一个民主而不受工会或社会党领导人所限制的组织，任何组织形式必须符合于历史进程的具体现实并扎根于真正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工厂委员会”也就

① 《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英文版第1卷第100页。

② 葛兰西《〈新秩序〉纲领》，《新秩序》1920年8月14日。

能完成团结和教育群众的任务。“工厂委员会”在全厂是全体工人的民主机构，这是由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单是志愿出卖劳动力或特殊技术的行为，他们是阶级的一部分，是生产的一部分。“他们是劳动机器分工中的齿轮，在工人阶级中是生产的工具。”^①工人在工厂中有选举权，也有罢免权，这就保证代表享有群众的绝对信任，否则他们就不能执行工人托付给他们的权力。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排除社会主义纪律的存在，葛兰西说，执行纪律的命令起源于民主，不是某种外来的“意志”，那么纪律是民主秩序和自由的必要因素。由于委员会对工厂的一切有关生产和革命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作出决议，因此“工厂委员会”能避免官僚主义地对待问题，也不可能产生个人的独断专行或过火行为。

(4)它能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的能。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后，取消了资本家压制工人掌握先进技术的一切规章制度，技术人员的监督任务由工人自己担负起来了，这样他们就有更大的独立性。当自觉的纪律代替原来工厂的军事纪律时，他们就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工厂委员会举办的技术学校中学到先进的技术知识，从而应用到工厂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去，使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得到不断的提高。

四、“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的原因

关于“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的原因，葛兰西在两个场合谈到过：一是1920年7月，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工厂委员会”失败的原因是都灵无产阶级同其他地方的联系被社会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蓄意割断了，中央机构对他们没有帮助。二

① 《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英文版第1卷第262页。

是1924年1月在分析《新秩序》集团失败的原因时他说：“现在，我们主要是在受到1919—1920年我们犯的严重错误的惩罚。当时，我们害怕被人家看作是拚命想揽权的野心家，因此，没有争取建立一个旗帜鲜明的派别。由于我们害怕总工会分裂和过早地被开除出社会党，所以，我们没有给都灵工厂委员会提供一个可以大大影响全国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机构。”^①这些话葛兰西在1924年1月27日也同陶里亚蒂讲过：“我们在1919年和1920年犯的严重错误，就是对社会党领导人攻击得不坚决，不敢冒被开除的风险。”^②

但是，在我们看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起直接作用的至少还有两个方面：

第一，反动势力强大而又集中；革命力量薄弱而又分散。同都灵工人打交道的不是一般的资本家，他们是既搞政治又搞工业的资本家。早在1906年就由不同企业的七十五个厂主成立了一个较公开的政治组织——“工业同盟”；1919年，由于军事工业的不断集中，这些厂主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名叫“工业总同盟”，总书记是律师齐诺·奥列维蒂，他的指导思想是：在工会力量统一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也必须联合起来。

1919年秋，那些厂主眼看选举车间代表，形势对己不利，都表示反对；1920年初，他们知道工会领导已无法对工人行使纪律，于是就开始采取行动。2月中，工业同盟着重讨论了“工厂委员会”的问题，通过一项团结一致对工厂委员会进行斗争的决议。要求每个会员对“建立工厂委员会或车间代表制的任何活动立即通知同盟本部”，并禁止同盟会员“表现出可能同这个问题进行妥协的

① 陶里亚蒂《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意文版第183页。

② 同上，第180页。

行为”。^①

3月7日，齐诺·奥列维蒂在一次讲演中杀气腾腾地说，如果政府不予支持，厂主们必须准备采取坚决行动。3月24日，都灵地方长官向那些资本家表示内政部已有命令支持他们的行动；即日，地方长官发布命令禁止公共集会，并派遣大批军警驱散了金属加工工厂中的工人。为了镇压“工厂委员会”运动，反动政府投入了五万装备坦克和机枪的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反动势力是拧在一起的，由资本家出钱，反动政府出军队，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了。

至于革命力量方面，其中主要力量《新秩序》派内部在1920年初已开始分裂。塔斯卡于1920年2月正式同葛兰西唱对台戏。他站在工会的一边认为，工厂委员会同工会尽管职能不同，但不能拆成两伙、成立两种组织，因为工厂的问题同全国的问题无法分开。工会应当作为总的团体，把工厂委员会团结起来，协调它们的活动，并使它们服从纪律。管理工厂的生产应当由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分担，管理工业部门应委托工会担任。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把手工业工会改造成产业工会。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工厂委员会是工会的地方支部。塔斯卡还提议要有效地重新建立工会在地方的领导地位。车间代表继续存在，还继续选举内部委员会，但将来毫无疑问要接受工会的政策和决议。塔斯卡不同意工厂委员会控制生产，他认为这是国家的事，这样可以保证合理地调整经济计划和投资的规模。他指责葛兰西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葛兰西则斥责塔斯卡帮助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因为那些人企图借助于官僚主义的纪律来歪曲工厂委员会。

《新秩序》派的其他两个主要人物陶里亚蒂和特拉契尼虽然是

① 《工业报道》1920年2月19日。

在1920年8月同葛兰西突然分手的，^①但实际上早在整个夏天当葛兰西同“抵制派”维持关系，并在5月去佛罗伦萨参加博尔迪加“抵制派”的全国代表会议时，就开始意见分歧了。陶里亚蒂和特拉契尼反对同“抵制派”进行合作，而主张同“选举派”搞好关系。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塔斯卡，并同“塔斯卡缔结了某种协议”。^②

社会党内唯一在“工厂委员会”运动初期支持葛兰西的是以博尔迪加为首的“抵制派”，但是他们的观点不同。两人的辩论开始于1919年9月。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的权力必须来自劳动场所的群众，而博尔迪加则认为，“工厂委员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应当规定权力不来自工会中的工人，而来自被剥夺权力的对于立即实现共产主义有兴趣的人。他在1920年1月11日写道：“这个运动是改良主义运动，它可能至多对工会结构稍作修修补补，或者实现资产阶级法律下的工人管理。”^③对于博尔迪加来说，“工厂委员会”永远克服不了个别工人团体特有的“社团”的利益，它们也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总利益（不论是失业者还是就业者的利益），因此，金属加工工会联合会的都灵分会指导委员会是否由车间代表选举都不重要，因为这将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总利益”仍然是冲突的。除非工厂委员会由党来领导。^④

1920年1月开始，博尔迪加大力主张共产主义左派占领工会阵地，而不需要建立“工厂委员会”作为反对改良主义的手段。尽管博尔迪加允许他的当地追随者参加“工厂委员会”运动，并明显地不反对“抵制派”同都灵的《新秩序》派进行合作，但他的力量有限，支持也是不得力的。

① 陶里亚蒂《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意文版第151—152页。

② 同上。

③ 博尔迪加《论建立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杂志1920年1月11日。

④ 同上。

都灵工人群众在《新秩序》的发动下已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运动中去,本来社会党的领导集团可以利用党的影响,把这一运动推广到全国范围。可是他们从1919年秋季开始已把全部精力放在维护社会党的选票方面,1919年11月16日,社会党在大选中赢得了众议员五百零八席位中的一百五十六席位以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革命活动。因此,在革命运动的紧要关头,他们终于成了革命的阻力。4月19—21日,社会党在这些领导人的把持下在米兰召开的会议上,以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二票对二万六千三百五十一票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党的一切组织“同中央保持密切联系、遵守纪律,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任何地方主义的行动,或者反党活动的任何倾向”。^①这就把“工厂委员会”运动的熊熊烈火当作地方主义行动泼了一桶凉水,使它不得不熄灭下来。

第二,葛兰西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葛兰西设想的“工厂委员会”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把经济、政治和文化集于一体,以代替党的作用。他写道:“共产主义的革命为生产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得到自治权。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目的是建立专政、工人国家)只有在发展新经济条件的一种职能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价值。如果政治行动是为了取得成果,那么它就必须同经济行动一致起来。”^②政治行动要同经济斗争配合起来,这说明工人阶级的不同斗争是相互联系的,但葛兰西在这里指的是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中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的一致,根据他的理论似乎只有这个组织才能做到这两种斗争的配合,这就同列宁的理论背道而驰。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们对于厂主和政府进行的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并且因此),革命的社

① 马丁·克拉克《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失败的革命》英文版第107—108页。

② 《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英文版第1卷第162页。

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与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同……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相反地，革命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为职业的人……”^①“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②情况就是这样，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出现的是“手工业”的方式，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是混在一起的，谁来总的领导这些组织呢？显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或协调机构，正如陶里亚蒂所说的：《新秩序》派在都灵发展了一个巨大的群众运动，他们局限于通过私人，而不是通过组织同其他地方进行联系。^③当时《新秩序》派没有形成一个革命政党，葛兰西错误地认为“工厂委员会”能取代党的作用。直到“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以后，他才从中悟出一个教训：没有共产党，没有一个能把“无产阶级全部革命行动在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进行协调和集中的共产党”，工厂委员会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从葛兰西的指导思想来看，当时还带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色彩。

但是尽管这样，“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意义是很大的，葛兰西曾说：“无产阶级不是由于饥饿和失业迫使他们进行控制生产的斗争，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而且，参加的不是少数人，不仅是从事这一斗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是整个都灵的工人群众，他们不考虑到会招来牺牲或贫困而投入战斗，并把斗争进行到底。”^④我们认为，还应当指出，都灵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运动意识到自己是“领导阶级”，是“生产的主人”这一点对日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323页。

② 同上，第336页。

③ 约翰·卡麦特《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英文版第107页。

④ 葛兰西《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新秩序》1921年3月14日。

葛兰西论领导权问题

——读《狱中札记》

张 郁 兰

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和创始人之一，陶里亚蒂称他为“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出生于撒丁岛一个小职员家庭，由于生活困难，从十一岁时起就开始干活。长期的超体力的重活，严重伤害了他的发育和健康。1911年二十岁时，他以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入都灵大学，攻读语言学、历史学和哲学，在大学期间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同都灵的工人阶级建立了联系，积极投入实际活动，于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为社会主义报刊《前进报》等撰稿。1919年创办《新秩序》周刊，领导工厂委员会运动；1921年与陶里亚蒂等创建意共。1922—1923年为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1926年领导对党内的博尔迪加机会主义的斗争胜利后，当选为意共总书记，制订了意共在法西斯专政下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对法西斯斗争的路线策略。1926年11月被捕，被法西斯当局判刑二十年，1937年病逝于罗马，年仅四十六岁。

他在狱中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顾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以惊人的钢铁意志和忘我精神，继续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下了长达四千页、共三十二册、一百数十万字的札记、笔记手稿，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国家学说、文化艺

术、教会等非常广泛的理论问题，成为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财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最初发表于1947年，1971年重新出版，他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意共党内外及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重视和探讨的问题之一，具有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意义。

现就读他的《狱中札记》的学习体会，谈谈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看法，供进一步研究并欢迎批评指正。

—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论述“领导权”、“统治权”、“支配权”、“领导”、“指导”、“统治”等意思时，并不单只使用“egemonia”一词，他在不同场合使用各种不同的词来表示这类意思：“dirigere”，“direzione”，“diretto”，“direttivo”，^①等等。他关于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含有这样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论述、总结历史上各统治阶级如何维持其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经验、方法，认为如果只靠强制力量而缺乏使用文化教育、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力量，任何阶级都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其政治经济统治权力。第二层含义是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领导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用新的领导权即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去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提供全面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领导，等等。

葛兰西早在1917年11月就提出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及其对

① “dirigere”，意为“指导、领导、统治”。

“direzione”和“egemonia”同为“领导权”之意，葛兰西经常交互使用。

“diretto”，作为形容词用时意为“指导的、支配的、统治的”，用作过去分词时意为“引导的、领导的”。

“direttivo”，是“指导的、领导的”之意。

参看《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73年伦敦英文版第55—57页。

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看法。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他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社会党领导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展开的辩论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即计划在意大利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及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问题，当时改良主义者、律师玛里奥·特罗齐反对葛兰西的这个建议。1918年7月，葛兰西在《人民呼声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在俄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方向，并正在建立自己的秩序”。“专政是保证自由的基本制度”。但是，他虽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对专政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专政的对外职能等却认识不足，所以他说：“专政将是一种过渡现象，一俟革命有了不被宗派活动的少数人发动的政变搞垮的保证，专政就将取消。”^①

葛兰西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取得对社会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才能得到解决。他认为这种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陶里亚蒂在为《葛兰西狱中书信》所写的序言中说：“党的问题，建立一个能够组织并领导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来解放自己的工人阶级革命组织这一问题，始终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一生全部思想的中心。”^②1920年意共尚未建立时葛兰西就为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才能担负起解决意大利问题的革命重任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在文章中写道：“意大利确实是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妖魔鬼怪吞噬的对象；秩序只能来自工人阶级、来自无产阶级要使意大利具体地积极地载入世界史册的意义。而秩序的本源只有在一个组织严密、为自己提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目标的共产党里才能在政治上体现出来。”^③

① 乌尔班主编《欧洲共产主义——它在意大利的渊源及前途》1980年中文版第69页。（书名以下简称《欧共·渊源》）

② 转引自伦巴多·拉迪切等《葛兰西的生平》中文版第6页。

③ 转引自《欧共·渊源》第83页。

二

葛兰西在《札记》中关于领导权的论述很多，据不十分精确统计，全书约有二百多处述及这方面问题。他由于要提防监狱当局的严厉检查和威胁，不得不使用一些特定的名词术语，有时甚至是“密码式”的文字来代替一般通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例如称马克思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称阶级为“社会集团”，称无产阶级专政为“国家一力量”；把共产党叫做“现代君主”；把无产阶级革命叫作“周围现实的大转变”，等等。

现将他的《札记》中有关领导权问题的论点择要分述如下。^①

一、哲学思想方面的领导问题 这一节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即无产阶级世界观方面的领导作用，主要分为实践哲学、领导权的理论实践原则、领导权的发展、领导权的关系、主客观世界的改造、信仰具有物质力量、在“公民社会”中争取领导权以及关于未来这八个小题加以阐述。

1. 实践哲学 葛兰西在论述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认为实践哲学的立场同天主教的立场相反，它力图把“普通人”导向更高的知识生活水平，必须使知识界同“普通人”接触是为了“建立一个智力—道德集团，这一集团要能使群众，而不只限于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从政治上达到智力的进步”。（第21页）他认为群众在实践中有两种互相矛盾的理论认识：一种是包含在他的活动中，并且能使之同在实践上变革现实世界的所有同志联合一致；另一种是无批判地从过去承受下来的口头上的表面文章，并且足以导致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消极状态。所以，葛兰西说：“批判地理解自

^① 引文后圆括弧内所注均为《札记》1959年俄文版页码，参考过葆照的中译文并参照1973年英文版作了若干改动。

己,为了使自己的现实观达到更高的水平,是通过政治的‘领导权’的斗争和通过对立倾向的斗争来实现的,开始在伦理领域,随后在政治本身方面。当你认识到你是特定的领导力量的一部分时,这就是导向更进一步的自觉的第一阶段”,“在这种自觉中理论和实践将最后达到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作为历史形成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第23页)他认为实践哲学“是最高的‘历史主义’,它完全摆脱了任何一种抽象的‘观念论’,它是历史的世界之实在的成果,它是新的文明的开始”。(第90页)葛兰西的这种论述是合乎实际的,因为它根据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阐明了实践哲学必须不断提高群众的知识、道德、政治理论水平,在革命实践中,通过政治的领导权的斗争和对立倾向的斗争,使政治理论逐步提高和不断臻于完善,最后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2.领导权的理论—实践原则 葛兰西认为理论与实践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因此正应从这方面来寻求伊里奇对实践哲学所做出的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因为列宁推进了政治理论与实践,就在事实上推进了哲学本身。他认为“领导机构的建设”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式”,这种建设又决定了意识形态和认识方法的改革,因而它也是“一种认识行为,一种哲学行为”;他引用柯罗齐的话说:在成功地采用一个符合新世界观的新道德时,也就是完全采用了这种新世界观了,就是说,“新道德的采用会引起整个哲学的改革”。(第59页)“实践哲学的集中点也就在这里,它现实地并开始历史地生活着,也即社会地生活着,已经不只是在单独个人的头脑里生活着,不再是‘随意的’,而成为必然—合理—实在的”。(第62页)葛兰西在这里以列宁领导十月革命为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领导作用,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实践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施原则来体现的。

3.“领导权”的发展 葛兰西十分强调“领导权”这一政治概念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认为这表明“哲学上的巨大的进步,而不仅仅是实际政治行动中的进步,因为这种发展必然引起和暗示智力的统一以及符合那种被克服了常识并成为一种批判的现实观的伦理”,尽管还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第23页)他进一步论及历史和哲学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一定时代的哲学,不外是这一时代本身的‘历史’,不外是领导集团善于从过去接受下来的现实中进行改变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它们形成‘联盟’”。他把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在这三个阶段上哲学成分本身可作如下区分:作为哲学家的哲学、作为领导集团的构思(哲学的修养)以及作为广大群众的信仰。他说,“在每一个这样的阶段上,势必碰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思想体系的‘组合物’”。(第36页)

4.领导权的关系 他在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时,认为这些相互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适用于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说,每一种领导权的关系必然也是“教育”的关系,它不只是在一个民族内部,在组成这个民族的一些力量之间表现出来,而且也在国际的和世界的范围内,即在“民族的和大陆的文明的组合体之间表现出来”。(第42页)

5.主客观世界的改造 葛兰西在论述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时说,每个人都在改造和改变自己,其程度正象他改变、改造那“整个一套的相互关系”一样,在这套关系中本人是“一切线索汇集的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实在的哲学家正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积极改造周围世界也即改变每一个人都参加的一切相互关系的总和的人”。如果每个人的个性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①,那么创造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认识这些关系,而改变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改变这些关系的总和。(第44页)他

说：“一切事物，甚至哲学或各种哲学，都是政治的，而唯一的‘哲学’——这是行动中的历史，这是生活本身。”他认为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关于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继承者的论点，而且可以肯定，列宁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和实现也是一桩伟大的“哲学”事件。（参看第49页）

6. 信仰具有物质力量 葛兰西认为，可以比喻和联想国家从“经济组合”阶段过渡到“领导”（自动同意的）阶段的发展。他说：“每一种文化都是经过自己的思辨和宗教〔即信仰〕的时期同表现这种文化的社会集团的完全领导时期相吻合，并且甚至正好与实际的领导权彻底瓦解的时机相吻合，但思想体系却正因此应运而完成为教条，成为超凡的‘信念’。”（第64页）“应当记起马克思的屡次的断言：‘民间迷信的牢固性是特定形势下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他所说的大约是：‘这种想象事物的方式具有民间迷信的力量’，或诸如此类”。“对这些论断加以分析可加强‘历史联盟’这个概念，在这种结合中，物质力量正好构成内容，而意识形态则构成形式”；“没有形式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个人幻想的产物”。（第71—72页）总之，葛兰西认为，“‘人民的信仰’或这种类型的思想具有物质力量的意义”，这是实践哲学的原理之一。他以“形式”与“内容”来表述“信仰具有物质力量”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明了物质力量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伟大作用，葛兰西说：马克思是“世界观的创造者”；而列宁的作用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科学与行动里面”。“从空想到科学和由科学到行动，建立领导阶级（即一

① 参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个国家的)与创造世界观有同样价值。”“马克思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创始人,这个时代很可能要延长几个世纪,也就是要一直到政治社会消亡和真正社会建立为止。只有到那时候,他的世界观才会被超越,必然观念被自由观念超越。”他反复强调列宁所制定的和实现的领导权这一概念和事实本身的伟大哲学意义;“实现了的领导权表明对哲学的实在的批评,它的实在的辩证法”。马克思和列宁“表示两个状态:科学与行动,它们在同一个时间内既是同样的又是不同的”。(第73—74页)

7.在“公民社会”中争取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争取领导权的活动必须相应于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特定的智力活动是相应于每一个发展阶段:经济组合阶段,在公民社会里争取领导权的阶段,以及国家政权的阶段,而这种智力活动都是不能随意造成的或者在时机未到之前产生的。在争取领导权的阶段中发展着政治学;而在国家的阶段中则应发展上层建筑的所有部分,否则国家有解体的危险”。(第94页)“只有建成了新国家以后,文化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被提出来,并要求得到连贯一致的解决。”(第88页)

8.关于未来 葛兰西说,即使实践哲学是“历史诸矛盾”的表现,而且真的它们是最完全的、因为是最自觉的表现;这意味着它仍然是与“必然”连结着的,而不是与实际上并不存在并且历史上还不可能存在的“自由”连结着。“如果已经证明诸矛盾一定要消失,从而同样意在言外地证明实践哲学也要消失,或者要被克服。在自由‘王国’中,思想和观念不能再在诸矛盾和斗争的必要性中产生”。实践哲学家也只能对此提出一般的推断,而不能更多;事实上他不能避开目前存在着矛盾的领域,断言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除了一般地谈谈以外,没有不立即陷于空想的。(参看第99页)葛兰西的这些论述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

二、革命和政党的领导权问题 这一节是讲革命和政党的领导权，重点在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分为《君主论》和马基雅弗利、“现代君主”、培养领导者的基本前提、党的精神与国家精神、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党的职能及其领导、领导权的前提、领导权危机的解决、两种集中制、议会民主和议会党派斗争、民族问题和领导权这十一个小题加以阐述。

1.《君主论》和马基雅弗利 葛兰西认为，马基雅弗利在其《君主论》中所探讨的是“君主应当怎样领导人民建立新的国家”；到书的结尾时作者“自己成了人民，同人民结合在一起”了。但这“人民”是作者在前面叙述中加以说明了的；“这种人民的意识在马基雅弗利身上得到表现，他理解到自己的这项作用，感觉到自己与人民的同一性”。葛兰西说：“必须把马基雅弗利看成主要是他那个时代的必然表现。这种表现是和他那个时代的条件及需要密切联系着的。”确定这些条件和需要的：第一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内部的斗争和未能摆脱市政公社残余；其次则是意大利内部各个国家之间为了在意大利建立平衡与欧洲国家争夺领导权的需要之间的矛盾。“马基雅弗利从头到脚是一个自己时代的人。而且他的政治学说体现了时代的哲学，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倾向于建立民族的君主专制政体——那种会给资产阶级生产力造成可能性和易于继续发展的政治形式。”在他身上能找到萌芽状态的分权和议会制度的思想。“他的‘愤慨’的对象是封建世界的残余，而不是反对进步阶级”。（参看第125—126页）

葛兰西进而分析马基雅弗利与让·菩丹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条件不同，所以成就也不相同。他说，“菩丹在法兰西内战时期以称为‘政治家’的党的代表身份出现。这个党从民族的利益出发，因为在这种平衡状态中领导权属于第三等级，而第三等级是通过国王实现这种领导权的。”“菩丹是在马基雅弗利在世时期所存在

的关系远为发展和复杂的基础上在法国创建政治学的”。(第 127 页)而马基雅弗利限于所处的意大利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他的雅各宾主义在意大利没能实现,不象法国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实现了那样。可见,走在时代前面的马基雅弗利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他的民族革命观的源泉。从 1815 年起,全部历史都证明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在预防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在以保持消极平衡为特点的国际体系中维护着经济组合的均势”。葛兰西认为,“马基雅弗利活动的局限性仅仅在于他是‘个人’,是‘作家’,而不是国家或军队的首脑,因为后者虽也是个人,却掌握着国家或军队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大批文字的力量。但也不能以此就肯定马基雅弗利是一位‘赤手空拳的预言家’:这无异于轻视他的精神意义。……他是努力具体地表明历史的力量应如何行动才能变为有成效的”。(第 161 页)葛兰西在这里既分析了马基雅弗利由于是“赤手空拳”的个人,不是某个集团的“领导者”,因而未能直接变革现实;同时又肯定他这个政治理论宣传家是“建设者”,是积极引导、唤起、鼓励人们革命行动的人,亦即肯定政治理论宣传教育的重要意义。

2.“现代君主” 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并不是真正的个人,“只能是被承认了的并在行动中部分确定下来的有机体,复杂的要素。这个有机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就是政党”。(第 117 页)“现代君主”应该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的改革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改革意味着为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的向前发展开辟道路,直至达到现代文明最高和最全面的形式”。(同上)他强调指出,这项文化改革和与这有关的社会被压迫阶层人民文化的提高,如果不先从经济上改革和不先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那是不可能的。“精神和道德的改革不可能不同经济改革的纲领相联系,不仅如此,正是这种经济改革的纲领才是实行任何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具体形式”。(第 118 页)

他特别强调现代世界中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向导作用，“党在培养新的、完整的、无所不通的智力”，“党象一口坩锅，把理论同作为实在历史过程来理解的实践熔于一炉”。（第24—25页）有一部分群众甚至处于从属地位时，也经常是领导者和负责者，而这一部分群众的“哲学经常是全体群众哲学的前驱，不仅是理论方面的前驱，而且也是现实的必然性”。（第27页）他还指出，到目前为止，“党”是培养领导者和锻炼领导艺术的“最便利的手段”。（第132页）

3. 培养领导者的基本前提 在论及政治要素问题时，葛兰西反复强调领导权或领导问题：“第一个要素在于确实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政治的全部艺术和整个政治学都建立在这个根本事实上，这是谁也规避不了的。”从这一事实出发，在目的一定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最有效的领导；与此相联系的是，如何最好地培养领导者，确切地说，作为科学和艺术的政治，其首要任务正在这里。另一方面，“怎样寻求抵抗力最小的道路，也就是寻求保证被领导者或被统治者服从的最合理的道路”。（第130页）

葛兰西认为培养领导者的基本前提是：“人们是否愿意始终存在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还是努力创造一些使得存在这种划分的必要性消失的条件？换言之，是不是从那种认为人类将永远被划分分开的前提出发，还是认为这种划分只是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的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同时还必须搞清，“即使这种划分归根到底上升为社会集团的划分，甚至在同一个集团范围内也是经常存在着的，尽管这个集团在社会关系上是清一色的”。他认为这种划分只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一种技术现象。（第131页）

4. 党的精神与国家精神 葛兰西认为“党”可以在各种各样名称下出现“甚至在反党的和‘否认党’的招牌下出现。但甚至所谓

的‘独立者’（‘个人主义者’）在实际上也是党的人物，不过他们想
要借神的恩惠或者他们的追随者的愚蠢而成为‘领袖’。（第132
页）他非常鄙夷“个人主义”，说它是“一种兽性的非政治倾向的表
现。在宗派主义中也表现出‘非政治倾向’——而且确实如此”；“这
种表现的确是一种个人‘庇护’的形式，因为在这种表现中缺乏作
为‘国家精神’基本要素的党的精神。证明党的精神是国家精神的
基本要素，这就是应予解决的迫切而又特别重要的任务之一。相
反，‘个人主义’是一种非人性的、兽性的特点，它是‘招外国人欢笑
的’，正如动物园里的动物怪里怪气招人欢笑一样”。（第134页）葛
兰西在这里阐明了：既然体现集体意志、代表集体利益的有机的党
的精神是国家精神的基本要素，那么任何假借党的名义谋取个人
主义私利的企图和行为都是同党的精神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必须
解决使党的精神真正成为‘国家精神’的基本要素这一迫切的、特
别重要的任务。

5. 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 葛兰西认为要使党存在必须达到三
个基本要素的结合：（1）群众的要素即一般的平常人，他们的贡献
主要“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2）主要的凝结要素，它在国家
范围内实现集中并使那些“听其自然的”力量成为有效的和强大的
力量的总和。这一要素“具有强大的凝结、集中和纪律的力量并具
有创新的力量”。葛兰西把这一要素比作军队的将领，认为一个军
队“如果没有将领，就会垮台”；要是有一个善于彼此合作、互相深
入了解并致力于共同目的的军事将领，那么即使在一个没有军队的
地方也能立即把军队建立起来。（3）中间要素，它会把第一个要
素同第二个要素挂接起来，“会使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在‘人身上’，
而且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保持接触”。每个党都存在这三个要素之
间的“一定比例”。“当这种‘一定比例’实现的时候，就达到最大
效果。”（参看第139—140页）

6.党的职能及其领导 在谈到政党的职能时，他认为难以否定所有政党都要执行一种警察的职能，以保卫某种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秩序。同时强调要用进步的方法，而不是用反动的、镇压的方法来执行这种职能，认为这也是区别一个政党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他认为：“当旨在把脱离政权的反动力量控制在合法范围内，并把落后群众提高到新的合法性的水平上时，它是进步的；当尽力压制历史的活动并维护已经过时的与群众背道而驰、反历史的合法性时，它就是倒退的。”他说，一个党如果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执行这个职能”；如果是倒退的，它就会“官僚主义地”执行这个职能。（参看第143页）

他强调党的领导必须经常密切同群众的联系，要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在建党时，应以团结一致、而不应以次要问题为基础；因而必须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领袖与群众之间保持不断的密切联系。“假如在紧要关头领袖们转入他们的‘真正的党’内，那么群众就要陷于没有首脑、毫无生气、软弱无力的境地”。（第146页）他还十分强调党的领导应当坚决鄙弃政治上的“自满”情绪，他认为，一个严肃认真的“政治家”的行动必须从具体事实出发，而不应当从党的“自满”情绪出发；党应当极力避免使自己的行动，哪怕甚至“证明是正当的”行动，被看作是在受别人的玩弄，尤其假如这个“别人”是外国的话。（参看第142页）他就是这样强调党应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谦虚谨慎、力戒自满自足的原则，特别厌恶被人诬为受所谓外国的“别人”摆布。

他认为在现代许多国家中，有机的主要的政党由于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或其他原因都分为派别。其中每个派别都把自己称为“党”，甚至是独立的党。因此，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有机的精神总部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派别，好象是一个立于各党之上独立存在的领导力量而活动着”。（第135页）每个党既然是阶级的产物，

一个努力消灭阶级划分的党只有到它停止生存时，它才达到发展的最高的和最完善的形式，因为阶级不存在了，从而其利益的体现者当然也就不存在了。（参看第 139 页）

7. 领导权的前提 他在批判经济主义时说：“把领导权问题的具体提出这样地理解成为一种引起领导集团陷入从属地位的事实”是完全不合适的。“领导权的前提是要考虑那些行将被领导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要产生一定的妥协的均势，也即领导集团要做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而这种牺牲和妥协不能触及基础，因为如果领导权是伦理—政治的，那它就不能不是经济的，因而作为它的基础的不能不是领导集团有决定性的经济活动方面所执行的那种有决定性的职能。（第 149 页）

他强调同经济主义斗争必须不仅立足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上，而且尤其要立足于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上。他指出，这方面的斗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对领导权的研究来进行”；事实上，著名的政党在其发展党的理论及开展自己的活动中，就在进行着这种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斗争。（参看第 154 页）

8. 领导权危机的解决 他在分析一个国家统治阶级“领导权危机”产生的原因后说，这种危机一般称为“权威的危机”，也即领导权危机或整个国家的危机。统治阶级能以撤换人员、改变纲领、许下一些蛊惑性诺言等手段，并在处于他们权势下的阶级尚未重新组织好之前，重新“保住了政权”，加强它并利用它来“摧毁敌手”，驱散敌手的“领导干部”。在此情况下，许多党的党员则转到能成功地代表和表现整个阶级需要的唯一的党的旗帜下“是一种有机的而且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表明整个社会集团结合起来处于统一的领导之下，“只有这种领导才有能力解决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从而消除致命的危险”。（参看第 175—176 页）

9. 两种集中制 葛兰西在论述官僚主义问题时，认为有两种

不同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和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他说：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具有“有机性”，它“规定经常使组织符合实在的运动，就是把下面的推动和上面的命令结合起来，经常吸收来自人民中间的分子到管理机关的稳固的骨架中来，以保证不断和经常地积累经验”。它之所以是“有机的”，是由于它所注意的是运动，而运动是历史现实表现的有机形式，它不会僵化而机械地变为官僚主义；同时也由于它所注意的是相对经常和稳定的事物，或至少是“在易于预测的方向中运动的事物等”。“这个稳定的因素在国家中体现在领导集团的核心有机发展中”。“如果在国家中占优势的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制，那么这就表明领导集团达到饱和状态后成了狭隘的小集团，他们力图永久保持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特权”。（第210—211页）

10. 议会民主和议会党派斗争 葛兰西从论述法国的议会民主和议会党派斗争谈到争取国家领导权的困难等问题时认为，共和制下的保皇党、君主制下的共和党也同民族的党一样“不能不是特种的党”，“如果它们要获得迅速成功，首先应力求在党的同盟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不应仔细地制订其将来取得政权后所要实行的纲领。这类政党的目的应是一般地建立某种政治体系，而不是去争取成立这样那样的政府”。他说：“雅各宾主义的发展和在法国积极阶段实行的不断革命公式的发展，在议会制度下从宪法—司法上得到了‘完成’，而议会制度在社会特别富于‘私人创议’表现的时期内，在得到坚定的支持的黑格尔形式的政府中，实现着城市阶级对全国居民的经常统治”。（以上第216—217页）

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家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明显地压倒同意。舞弊与欺骗处于同意与强力的中间地带，它们是一定情况下的特有现象，这时实行领导已感困难，但使用强力又孕育

着危险”。(第 219—220 页)

葛兰西用概括具体历史事实的方法,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所谓民主和剖析议会党派斗争。资产阶级各党派为了达到争夺领导权的目的,经常使用“强力”即施加压力以取得议会的所谓多数的“同意”;从“强力”到“同意”过程中,如情况需要,还不惜玩弄欺骗拉拢、营私舞弊等卑劣手段,以争取掌握领导。

11. 民族问题和领导权 葛兰西在评述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一文内容时说:“应该发挥包括下面这种说法中的问题:根据实践哲学,根据它的创始人的表述,特别是根据现代伟大理论家[指列宁]加进去的明确说明,国际形势必须从它的民族方面另加考察。‘民族的’这个概念是一种‘独创的’,唯一的结合的结果;假使要掌握和领导这种结合,那就应从其全部独创性和不可重复性来理解它。”他认为,发展的趋势当然是国际主义,但出发点却是“民族的”,而且也应从这个出发点出发。因此必须确切地研究民族力量的配合,因为“国际阶级”必须领导这些民族力量而且应该依照国际的前途和国际发展的要求来发展这些民族力量。他说领导阶级之所以成为领导阶级,只是由于他们善于确切地解释他们本身就是其组成部分的这种配合,正因此他们才能赋予运动以一定的方向和前途。“领导权的概念,这是在其中结合了各民族性质的要求的概念,而且不言而喻的是存在着一定的倾向;对它完全避而不谈,或只稍微涉及到它一点”。国际性质的阶级由于它所领导的是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性质的知识分子和具有更大局限性质的及地域观念的农民,所以这个阶级应在一定意义上“民族主义化”,但远不是狭隘的。他预言:“历史将依照必然的规律发展,直到主动权完全转移到那些努力根据和平的和协调的分工计划从事建设的力量手中为止。”(参看第 235—236 页)

他还批判了米西罗里所说的:在意大利恢复统一以后出现于

意大利历史中的新因素，即社会主义，成了表现反中央集权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反动的最强有力的形式。葛兰西反问说：“难道一种造成民族统一和意大利国家的建成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流为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吗？”“这样的转化是时代错误的，也是反历史主义的（也即是人为的，不能广泛流行的），而且实质上与具有世界主义性质的一切意大利传统相矛盾的。”（参看第 339 页）

三、国家的领导权问题 这一节是论述关于国家领导权方面的问题，主要分为伦理的和文化的国家、“披上强制甲冑的领导权”——国家、人道主义与国家观、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夺取政权前后的领导问题、军事领导从属于政治领导、“皮埃蒙特”的职能以及领导权产生于工厂这八个小题。

1. 伦理的和文化的国家 葛兰西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最合乎理性的和最具体之点可概括如下：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从这个意义说，在国家中起着“特别重要作用的是执行积极的教育职能的学校，以及执行镇压的与消极的教育职能的法庭”，但在现实中为达此目的还要进行“许多具有所谓局部性的其他活动和创举，它们总合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导机关”。（第 241 页）他认为，黑格尔的观点属于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可能以为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没有止境，以致“断言资产阶级具有伦理性或普遍性：全人类都要成为资产阶级”。“但事实上只有那个致力于消灭国家及其自身的社会集团才能够建立伦理的国家，这个国家所努力的是结束那些曾经被统治的人的内部分裂并建立统一的（在技术和道德方面）社会机构。”（第 242 页）

2. “披上强制甲冑的领导权”——国家 葛兰西评述关于国家职能的种种说法时，认为：“国家一守夜者”的说法大概应比“国家

“一卡宾枪手”或“国家—警察”的说法“更具有讽刺意味”。“这种国家的对立物应是‘伦理的国家’或‘国家—干涉者’”。(第246页)“国家的一般概念应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也就是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甲冑的领导权)”。(第247页)

他说,中世纪公社时代仍属于教会特权的文化,正好具有反经济的性质。这种文化的目标不是建立新兴阶级的领导权,相反地是阻止新兴阶级取得领导权。“人道主义与文艺复兴带有反动性质,因它们意味着新兴阶级的失败和对于这个阶级所带来的那种经济制度的否认等等。”(第249页)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家状况,他认为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形:在战争期间掌握领导权的到最后会失掉它,因其在战争中削弱了,它只有看着那个比较“走运的”或者比较擅长“服从的”变成领导者。他认定几次大战中的情况正是如此。(第249页)

他说:“有一种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注定要结束自己而溶化在被调整了的社会中”,不难设想,国家强制的一面由于确立起来的“被调整了的社会”的因素越来越多而逐渐结束自己”。(第247页)

3.人道主义与国家观 葛兰西论述人道主义的产生及其含义时认为,人道主义可能在意大利确实是在研究罗马风而不是在研究整个世界上产生的,因而它的意义也必须有所区别。“人道主义具有‘政治的和道德的’性质,而非艺术的性质,它是在寻求那个应该与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国家的产生而同时并行产生的‘意大利国家’的基础;在此意义上,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最鲜明的代表人物是马基雅弗利。”(第275页)正象托梵尼恩所断言的,人道主义是“西塞罗式的”,也就是它在罗马帝国以前那个时期,帝国的国际都市以前的那个时期寻求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塞罗可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他是反对新的反意大利力量

的出现,反抗世界主义阶级的出现。(第276页)葛兰西就这样从历史上把人道主义与国家观连在一起论述。

4. 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葛兰西在论述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发展中的政治领导时认为:所有关于第一次复兴时期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联系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们与存在于国家领域历史上的不同部分或地区的同它们相类似的或依附于它们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通通归结为政治领导这个基本问题。他说:“温和派是一个较清一色的社会集团,因此他们的领导所经受的动摇就较少(不管怎样,他们是沿着有机的进步发展的路线走的)”。而行动党在任何一个固定的发展阶段中“也没有支柱”,因而它的领导机构所经受的动摇,“归根到底在符合温和派的利益的情况下解决了”。这表明在历史上行动党是温和派领导的,“这不仅因为国王与加里波第有私人关系,而且也因为在事实上加富尔与国王‘间接地’领导了行动党”。(第344—345页)

葛兰西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于两种形式中:“在‘政治的’形式中和‘智力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第345页)他认为重要的“社会集团”,应当从政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代表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努力提高劳动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以便取得带领群众目标一致地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又要领导开展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和精神道德方面的改革工作,使群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5. 夺取政权前后的领导问题 他认为一个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应该在各社会集团中间居领导地位,这是“夺取政权本身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只有那个力图‘消灭’与它敌对的集团或使这些敌对集团服从自己,不惜用武力并同时以同盟的或亲近的集团的领导者的社会集团,才是它的敌对集团的统治者”。因此,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政权之前就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其

后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牢固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同时也应是一个‘领导的’集团”。（第345页）

他再次以温和派和行动党的关系为例来说明他的上述道理。他认为甚至在1870—1876年以后，温和派仍继续领导行动党，“变形”不过是这种精神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领导权的“议会表现”。从1848年起及以后时期，甚至整个意大利的国家生活的特点就是“变形”，也即温和派不断吸收联盟集团中的甚至敌对集团中的积极分子，从而政治领导变成一种统治，因从敌对集团中吸收其领导人物就会使这些集团失去首脑而造成长时间的破坏。他说，温和派的政策十分清楚地表明：“领导权的政策也可以而且应该在取得政权之前这一时期实行，并且不应该仅仅指望政权为了实现有效的领导所提供的物质力量。正因这些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使得第一次复兴时期能够在它被实现的形式中和限度内完成没有‘恐怖’，做为‘没有革命的革命’”。（第345—346页）

葛兰西说：“一旦统治的社会集团完成了自己的职能，则思想上的联盟就有瓦解的倾向，于是‘自生性’就会被‘强制’所代替，这种强制越来越露骨而直截了当，直至采取真正的警察手段和实行真正的国家政变。”（第347页）

他详细分析了行动党把文化的统一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土的和政治的统一混在一起了。文化的统一“只限于很少数的居民阶层并受梵蒂冈世界主义的熏染，广大群众同这种传统毫不相干”；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传统存在。（第349页）如果行动党要想有效地同温和派抗衡，那就必须同农村群众，特别是南方的农村群众联系，必须不仅在“表面形式”上、在气质上，而“主要是在自己的社会经济的实质上成为‘雅各宾主义的’”。要把农村基本群众的基本要求“变成政府纲领的组成部分”；团结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并捍卫那些同他们休戚相关的要求。他指出，“在这两种努力之间存在一种辩

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许多国家的经验，首先是法国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表明，假使农民由于‘天然的’冲动而发动起来，那么知识分子就会开始动摇，同样地，假使知识分子集团开始在具体的亲农民政策的新的基础上行动起来，那么结果这个集团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集团”，而运动的发动者“必须是知识分子集团”。（第359—360页）温和派正好根据“独立和统一”的口号，在1848年以后在自己领导下组成了民族联盟，并在各种不同形式中和程度上影响了行动党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第362页）

葛兰西从分析、总结具体历史事实以论证夺取政权前后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颇具说服力。

6. 军事领导从属于政治领导 葛兰西在总结有关领导权问题的历史经验时说：“军事领导永远应该从属于政治领导，也就是战略计划必须是一般政治的军事表现。”“政治因素的本质就是应该比军事因素占优势。凯撒的《战记》就是说明政治与军事艺术巧妙结合的典范，兵士们认为凯撒不仅是伟大的军事领袖，而首先是自己的政治领袖，民主的领袖。”（第375页）他还以皮埃蒙特的军队之所以产生致命恶果为例，说明由于对军事政治领导没有信心，经常动摇于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间的缘故。他说：“正确的政治领导甚至对职业的雇佣军队来说也是必需的”，即使在雇佣军队里，除了军事—技术领导之外，也应当有政治领导。这种政治领导对于新募集的兵士组成的国家军队就更加必要。（第373、374—375页）

7. “皮埃蒙特”的职能 葛兰西认为“皮埃蒙特”在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一个“统治阶级”的作用。很难说在整个半岛范围内存在过清一色的统治阶级的原始集团，这些集团对完全统一的无法阻挡的努力会决定新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他说：“这些原始集团无疑是存在过的，但他们对统一的努力是非常成问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每一个在自己范围内部都不是‘领

导者’。”他们不想“领导”任何人，即不想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图同其他集团的利益和意图协调起来。他们所想的不是“领导”而是“统治”；并且还想使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人占统治地位。“他们所致力的一种不受任何和解及任何条件约束的新的力量成为国家的仲裁者：这种力量就是皮埃蒙特，并由此产生了君主专制政府的作用。这样皮埃蒙特也就起到了在某些方面能同党的作用相比的作用，也即社会集团领导人物的作用：它事实上是还具有军队、外交等任务的特征的国家”。因此，皮埃蒙特的作用意味着实行“‘统治’的而非‘领导’的职能——没有领导权的专政”。（第392—393页）

8. 领导权产生于工厂。葛兰西在论述“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一节中认为美国由于没有“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束缚，这正是它“积累大量资本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历史阶级所遗留下来的寄生渣滓，就使它能创立工业，发展商业，并能使运输业和商业的经济作用“越来越大地转变到依生产而定的实际必需的范围”。福特由于在其企业中直接管理产品的运输和销售而获得大量节约，从而能降低成本、提高工资和抑低售价。由于有了这些合理化的先决条件，就易于使生产和劳动合理化，巧妙地运用力量，从而使国家的全部生活从属于生产的利益。“领导权产生于工厂，并且为了自己的实现仅仅需要最小数量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职业中间人”。（第422—423页）

三

从以上所引葛兰西关于领导权的论述可以看出，他考虑到了无产阶级在政党、国家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从哲学、政治、经济到教育、科学等；强调无产阶级的任务决不止于夺取政权，取得政权

之前和以后都必须坚持掌握领导权；工人阶级应成为全民族在思想(世界观)、道德、文化领域等各方面的领导者；同时他还在《札记》中指出争取“同化”、团结广大“传统的”知识分子和积极培养自己的“有机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对于意大利革命的重要意义，等等。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在狱中极端缺乏图书资料的恶劣条件下，主要凭他非凡的记忆力引用马恩列斯的著作达数十种，结合意大利的具体实际，分析总结西欧几个主要国家、重点是意大利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其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领导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独到见解的关于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理论。他的这些论点虽是近半个世纪前所表述，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①“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②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以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③

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不同性质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 同上，第2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①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政党既不能做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也不能做落后群众的尾巴，否则就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作用。

关于意大利革命，列宁曾经说：“意大利的革命和俄国的革命不会是一样的。意大利的革命将以另一种方式开始”。^② 他建议意大利党采取共产国际的“聪明和巧妙的决议”，“革命的基本原则应当适合于不同国家的特点”。^③

葛兰西关于领导权的论述是基本上符合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的。当然不能认为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例如，他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问题很少论及，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偶然的疏忽；关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或他所称的“国际主义”等的论述也不够明确，不够完全。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2页。

倍倍尔与妇女问题

葛 斯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1913年8月13日逝世于瑞士，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勤奋读书、顽强斗争的精神永远值得后辈们学习。列宁在他逝世时，专门写了纪念文章，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认为“他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①倍倍尔用自己的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理想，今天在许多国家正在成为现实。在解放了的大地上，回顾革命先驱的业绩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妇女和社会主义》是倍倍尔给我们留下的一部重要的政论和科学著作。

一

“当我确实得知我将被监禁三十一个月以后，我决定，竭尽全力利用这段时间弥补一下我在知识上的不足。”^②1872年7月，倍倍尔被控“图谋叛国”，从7月到1874年4月一直在胡贝尔图斯堡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页。

② 《我的一生》1923年德文第8版第263页。

服刑。这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投身到紧张的学习和艰苦的创作上面。他住在冰冷潮湿、小虫横行的牢房，专心攻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阅读了柏拉图、拉萨尔和齐美尔曼等人的书，翻译了《基督教社会教义的研究》，并且写了《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初稿。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虽然欧洲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达，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步壮大，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妇女问题，更没有人把妇女问题当作社会问题提上日程。当然，也没有一部把妇女解放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书。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填补了这一空白。因此，这本书被公认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的著作。为了写这本书，倍倍尔阅读和查证了大量书籍和资料，列举了古代、近代和现代各种社会制度下妇女的社会地位，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欧洲、亚洲、非洲；研究的领域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和医学等；书中还运用各种统计数字作了必要的对比。

但是，《妇女和社会主义》的问世并非一帆风顺。1872年倍倍尔在狱中虽已完成初稿，可当时根本无法出版。1877年1月，倍倍尔在莱比锡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妇女在现今国家里的地位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演说。这在德国是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了没有选举权的妇女参加政治性竞选活动的要求。就在这一年，他再次坐牢。这期间，他对妇女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作了进一步整理和修改。但1879年，时值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不久，这部书不得不以苏黎世—霍廷根书店名义出版，在莱比锡秘密印刷。当时使用的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83年，在伦敦出第八版，书名同上。一直到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在1891年，才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以《妇女和社会主义》的书名公开出版。这一版是该书的第九版；1895年出第二十五版；1902年出第三十四版；1910年出第五十版。倍倍

尔在世时，曾对它进行多次修改，并为几个重要版本写了序言。到1973年为止，仅在德国就出到第六十二版。它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妇女和社会主义》是从日文转译传播到中国的。1927年开明书店以《妇人与社会》（后以《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书名出版中文第一版，以后多次出版，到1955年共出了六版。这说明它不仅是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发达国家人民所喜爱的一本著作，也是中国人民所熟悉、所欢迎的书。

二

“同反对妇女享有完全平等权的一切偏见作斗争，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①是倍倍尔1902年为他的《妇女和社会主义》第三十四版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它阐明了作者写这本书的动机和目的，同时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倍倍尔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社会的阶级状况，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时代，这一革命每天都在不断进步。在社会一切阶层中，明显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越来越强烈的动荡和不安，它渴望着深刻的变革。人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妇女问题”。^②

倍倍尔本人出身于工人，当过帮工和学徒，并且“彻底了解做小师傅的痛苦”，^③他无论在童年的家庭生活中还是在四处谋生的艰苦流浪生涯中都亲身体验到工人生活的贫困和遭受剥削的痛苦。从自己的母亲身上他看到了妇女倍受压迫的缩影，同时，也深

① 《妇女和社会主义》1973年德文版第19页。

② 《妇女和社会主义》1895年德文版第1页。

③ 参看《我的一生》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卷第149页。

感女性具有勇于牺牲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德。“一个母亲能为她的儿女所牺牲的，我从自己的母亲身上体验到了”。^①“这个可怜的妇人在她婚姻和寡居生活中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但她总是保持乐观和兴致勃勃。她在三年内相继死去两个丈夫，此外她还死了两个孩子……”。^②在倍倍尔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发了对妇女的同情心和对人的爱怜。尽管这在当时还谈不上政治觉悟，也不足以说明这就是他后来行动的基础。不过，倍倍尔对妇女问题的重视确实早在他完成《妇女和社会主义》以前。可以说，从他 1861 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以来，就逐渐注意到妇女是一批不容忽视的力量。这种认识不能脱离当时德国工业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纺织工业是动力工业中重要的和规模最大的工业。织工的人数占的比例也最高。但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动力织机代替了手工操作，大批手工业帮工，特别是女工经历着失业的折磨。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到各项强制法令的约束，在经济上又遭受封建行会残余组织的种种控制，在它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重重障碍，在自己阶级内部觉悟程度也十分悬殊。如何组织无产阶级的队伍，如何使其摆脱剥削和压迫是当时必须立即解决的重要问题。帮工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采用工人教育协会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教育工作。在他的革命活动中尤其注意无产阶级妇女的作用。“妇女和工人的地位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妇女有一件事却先于工人，那就是：她们是最先作奴隶的人类！”^③因此，使她们摆脱奴隶地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就成了不容怀疑的社会问题。

倍倍尔于 1865 年 9 月，出席了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德国工人协

① 参看《我的一生》第 1 卷第 17 页。

② 同上，第 20 页。

③ 《妇人与社会主义》1951 年开明书店版第 1 卷第 2 页。

会联合大会并被选为该会的常务委员。在这次大会的决议中，要求妇女在社会上完全享有平等权，并成立了女工协会和女工进修学校，从而为进一步争取妇女选举权打下了基础。同年10月，倍倍尔作为来宾出席了在莱比锡举行的德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这时倍倍尔“已经越过拉萨尔而走向马克思”。^①“我一生奉行的原则”就是“只要认清了我所拥护的事业的利益是必不可免的事情，我就去做”。^②从1867年起，倍倍尔开始进入国会，成为国会议员。每次国会会期过后，他就去选区旅行，向他的选民们报告议会活动情况。“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从我开始鼓动起，妇女就占到会人数的一大部分，后来她们竟成了我们热心的女鼓动者”。^③1869年，倍倍尔在完成他的第一部纲领性著作《我们的目的》时，就已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妇女同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美好前景。^④当时，他在翻译了伊夫·居奥和西吉兹蒙特·拉克鲁瓦的《基督教真相》以后，写了一篇对这本书的批判文章，题目是《伊夫·居奥和西吉兹蒙特·拉克鲁瓦的〈基督教真相〉批判，附录：妇女现在的和未来的地位》。这是倍倍尔利用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萨克森纺织工业的研究而写成的一篇论述妇女问题的文章。

当然，在理想的社会与严酷的现实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倍倍尔决不是一位空想家，他憧憬美好的未来，争取建立人人平等的、妇女享有一定地位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他又不失时机地、脚踏实地地为之奋斗。1875年，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召开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同拉萨尔派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哈赛尔曼就妇女选举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哈赛尔曼认为：“今

①② 《我的一生》第1卷第105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123页。

④ 参看弗朗茨·克吕斯《倍倍尔传》1923年柏林版第148页。

天总的说来妇女还是远远落后的，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比男人更糟。”所以，他提出：“我们暂时确定年满二十岁的男子有选举权；今后的代表大会可以确定其他的東西。”^①但是倍倍尔坚决主张：“必须努力使妇女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恰恰需要我们给予她们选举权，从而使她们能够练习使用这一权利。”“我们不应把妇女看成同我们相比是反动的。”^②倍倍尔还举例说：“在英国六十六个地方，二万七千名妇女当中就有一万四千人行使了投票权。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首席法官向华盛顿报告说，自从妇女有权参加选举以来，在选举方面的骚扰就完全消失了。”^③在这次大会上，倍倍尔为妇女的权利据理力争，他虽然居少数，但仍然把妇女选举权以及保护妇女等问题列入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纲领之中。以后，倍倍尔利用各种时机，或著书，或演讲不断地为妇女的社会地位呼吁，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进行不懈的斗争。

三

恩格斯对《妇女和社会主义》这本书十分赞赏，他认为其中“有很多好东西”，尤其“谈到德国工业发展的那些地方，写得特别清楚，特别好”。^④

古今中外压迫妇女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方式。我们从倍倍尔的这本书中既看到了世世代代的、东方的、西方的、文明国家的和落后国家的妇女遭受的种种压迫和灾难，听到了她们绝望的呻吟和凄楚的呼唤，也看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曙光，听到了她们在

① 《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参考史料》，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66页。

② 同上，第67页。

③ 同上，第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89页。

凯歌声中发自内心的欢呼。

倍倍尔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高度概括的妇女社会生活的图景及他对妇女问题的科学论述。

第一，倍倍尔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历史分析。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以大量的素材和精确的统计资料，具体地分析和研究了从太古时期的原始生活时代直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妇女在各种社会中的地位。从而科学地解释了导致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过程，论述了妇女遭受双重压迫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

妇女在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里，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更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在法律上妇女不能得到任何合法保护，例如，婚姻法明文规定，当夫妇发生争执时，决定权在男方，妻子应当是丈夫的奴隶。而婚姻的形成则完全出于强迫或买卖。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制度又同财产和继承权密切相关。加上宗教的束缚使妇女在精神上完全到了窒息的地步。在资产阶级学者眼里“女人是不适于大事业的，她的本性不是作为而是苦恼……女子是根本上不可救度的俗物。”^①当然，教育和培养对妇女来说更是不可想象的事。精神文明不过是空洞虚伪的口号。从物质方面看，妇女在经济上没有独立可言，她们的一切都要依附于人，因而始终摆脱不了受支配受虐待的处境。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需求，妇女逐渐走出家门而进入社会。她们甚至在某些行业占的比重很大。1900年倍倍尔就妇女就业的范围作了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妇女的职业主要是侍者、裁缝以及小商贩等。就是说，她们在职业上也处于较为低下和不平等的地位。而要使妇女摆脱这一切首先必须有社会制度的保证，可以说，如何正

① 《妇人与社会主义》1951年开明书店版第1卷第229—230页。

确解决妇女问题，是检验一个社会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标志。这说明妇女问题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是一致的。因为“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上的博爱、法律上的平等、普遍的教育等将是未来社会的最高阶段，经济、理智和科学始终为开创这一未来社会而奋斗”。^①到那时，“奴隶和仆婢将会绝迹，劳动不分贵贱，即使擦皮鞋也不可耻”。^②

第二，倍倍尔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的使命不仅是本阶级的自身解放，还包括解放其他被压迫者，也包括解放妇女。妇女问题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分别开来，他在书中抨击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展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

从第三编《现代的妇女》起，作者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从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明确指出：“当前的社会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即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这种生产方式使资产阶级成为土地、矿山、原料、工具、机器以及交通手段等一切劳动手段的所有者，从而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剥削和压迫，致使被剥削阶级生存毫无保证，而只能遭受压迫与凌辱。”^③在一切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妇女也不能幸免。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④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无非是个人对个人、阶级对阶级、男人对女人、年长者对年幼者的相互敌视”。^⑤妇女要彻底解放，“非将它们的城堡四面包围，用各种口径的枪炮瞄准不可”。^⑥倍倍尔在阐明资本主义社会衰败的同时，指出如果仅仅提

① 《妇女和社会主义》1973年德文版第522页。

② 同上，第513页。

③ 同上，第40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⑤ 《妇女和社会主义》1973年德文版第355页。

⑥ 同上，第343页。

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而不去把它所依赖的国家和国家的各种职能机构联系起来，实行彻底改革，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彻底粉碎旧社会。“不去怀疑统治阶级的特权并最后消灭它，是永远也不能医治病入膏肓的世界的……半途而废和小小的让步完全无济于事。”^①

第三，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在现有的一切政党当中，社会民主党是唯一把妇女的平等，把妇女从一切依赖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写进自己纲领里的政党，这样作的原因并非出于鼓动，而是出于必要，出于原则。没有社会的独立和两性的平等，决不可能有人类的自由。”^② 倍倍尔用很多篇幅阐述了未来的人类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能够解救苦难中的妇女，“只有通过社会民主党，她们才能在社会上得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因此我们看到，妇女越来越向社会民主党靠拢，在当前的伟大的运动中，妇女向哪里靠拢，哪里就会得到胜利！”^③ 社会主义社会从工农业劳动和劳动的组织、私有制的废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区别的消灭、电气化的实现、人民生活的改善一直到普遍实行教育和文学艺术的普及都能使妇女同男人一样平等地得到她们应享受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真正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自由与平等。这也就是作者把妇女的命运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所在。从这一点上看，倍倍尔的这一著作远远超越了他所论述的范围，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① 《妇女和社会主义》1973年德文版第407页。

② 《妇女和社会主义》1895年德文版第7页。

③ 倍倍尔1893年在帝国国会的一篇发言，转引自弗兰茨·克吕斯《倍倍尔传》第148页。

四

《妇女和社会主义》在宣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宝库。所以,从它问世起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之一。当时在德国,哪怕中小城市里较小的图书馆也要藏上十几本《妇女和社会主义》。“仅仅1908年这一年,《妇女和社会主义》就从这个图书馆(指某地区工人协会的一个小图书馆。——引者注)借出七十五次,就是说,这个地区每个月大约有十二名工人和他们的妻子阅读这本书。”^①甚至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对倍倍尔所取得的这一巨大成就加以赞扬。《妇女和社会主义》就这样赢得了全世界的读者,倍倍尔使自己在妇女的心目中树立了丰碑。每当我们谈到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地位时,在谈到妇女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时,总是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确,在他之前,也曾有过一些著名人物对妇女问题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但他们却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而往往耽于空想,他们谁也没有象倍倍尔那样,对这一问题研究得那么系统、那么深入,在自己的实践方面对这一问题又宣传得那么广泛、那么及时。对于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又那么充满信心。因而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敌人和各种各样反对者的攻击。他们否定这一著作的科学价值,贬低它的社会意义。而人民认为它既是一部工人的书、一部对阶级社会的控诉书,又是一部在斗争中赢得胜利的战斗檄文。它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和动员工人阶级,特别是动员妇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方面起了十

^① 霍尔斯特·巴尔特尔《倍倍尔传》1963年柏林版第125页。

分重要的作用。

在书的结尾处，倍倍尔热情洋溢地为广大妇女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光明的未来。号召她们挺身而出，投入火热的斗争洪流之中：“在争取人类进步的斗争中，不论他的力量多么微小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不断的滴水终究会穿通最坚硬的石板。聚滴为溪，聚溪为河，再聚河而为巨流。最后，任何阻力也不能抵挡浩荡的江水。人类的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凡一切感到有能力竭尽全力投身于这一斗争的人，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①

“未来属于社会主义，首先属于工人和妇女。”^②

① 参看《妇女和社会主义》，1973年德文版第556页。

② 同上，第557页。

卢森堡论及伯恩施坦思想 来源的三篇文章

周 懋 庸

研究和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应当追溯他思想的来源并同时批判这些来源。列宁和卢森堡都指出伯恩施坦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是形形色色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综合,但是列宁和卢森堡都没有就这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期《西方的伯恩施坦研究述评》一文提到瑞典学者博·古斯达夫森对伯恩施坦思想来源进行了探索,不过他偏重于分析费边主义对伯恩施坦的影响,忽略了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在他思想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能够注意比如说桑巴特等人对伯恩施坦的影响将会有更大的收获。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伯恩施坦在英国多年,其思想固然和费边主义以及英、法等国的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如果不注意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性质上具有其特殊性的德国环境和伯恩施坦思想形成的关系,忽视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学者的观点对伯恩施坦理论形成的影响,对伯恩施坦思想来源的研究和批判总是不够全面的。最近在研读卢森堡著作时,觉得她写于1899—1900年之间的三篇文章是和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的,尽管这三篇文章重点并非深入探讨伯恩施坦思想来源,但它们恰

恰是分析批判新老历史学派、讲坛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因此可以说是触及了伯恩施坦的思想来源，同时也明确地点出了伯恩施坦同这些学派的关系。这三篇文章是《烂核桃》、《回到亚当·斯密去！》、《“德意志科学”支持工人》。前两篇过去一直未译成中文。本文的目的是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思想来源的角度介绍这三篇文章。

亚当·斯密学说在德国的命运 和新老历史学派

为了反驳当时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口号：“回到亚当·斯密去！”，卢森堡以这个口号为题写的文章首先回溯了斯密学说在德国的命运。她说，曾经有一个时期，斯密学说在欧洲居于统治地位。正如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马尔维茨所说：“亚当·斯密是除拿破仑之外欧洲最强有力的君主”。卢森堡认为这话绝非过甚其辞。她说，在普鲁士，在施泰因—哈登堡改革时期，几乎所有国家活动家都是亚当·斯密的学生，甚至高级军事将领如沙恩霍斯特、格奈舍瑙等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徒。但是斯密学说以及这些人的改革很快招来两方面的反对。一方是维护农奴制的容克，另一方是中等阶级（手工业作坊主、小店主）。为了充分理解卢森堡指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有必要在这里略为具体地谈谈施泰因等人的改革内容。

当拿破仑 1806 年在耶拿大败普鲁士军队之后，普鲁士的一批有识之士立志改革封建普鲁士。施泰因研究过斯密的著作，当他执政期间，按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十月敕令保证农民的人身自由和自由择居的权利、取消了农民及其家属对容克地主的隶属关系。施泰因的继任者哈登堡取消了行会限

制并实行就业自由。沙恩霍斯特将军在军队中取消了以出身任命军官的旧习，改为按知识和教育程度来进行任命。这些改革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改革农奴制侵犯了容克贵族的利益，改革行会制影响了中等阶级的利益，于是招来这两方面的反对。前者在经济学上的代言人是哈勒—弥勒浪漫学派；后者的代言人是朔登—卢登早期历史学派。前一派用中世纪封建主义来反对斯密学说，后一派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时而反对这一边、时而反对那一边。于是施泰因改革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这场改革并非来自一场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运动，而是耶拿大败使改革派暂时夺取了顽固派的权力造成的。

后来的新历史学派又怎样对待斯密学说呢？新历史学派出现在德国垄断资本迅速发展的年代，即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同时这也是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年代，而七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它一切思想体系。于是新历史学派、讲坛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护理被马克思揭开的资本主义的伤口。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卢森堡说，古典经济学发展到马克思才转化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她指出，谁要战胜这一结果——社会主义，谁就要反对出发点——古典经济学。因此新历史学派是代表现代资产阶级本身起来反对它自己阶级统治的后果。马克思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德国经济学的处境“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① 卢森堡在这里则说：“古典学派宏伟的理论大厦的落成和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德国资产阶级的上升在思想上的表现却是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自我解体和没落。”她接着批判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妄想挽救这种没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而提出“回到亚当·斯密去!”的口号，认为斯密的时代已经逝去，社会和科学都不可能倒退。只有二者择一：“在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前进还是宣告自己作为科学的破产。”这样从斯密学说在德国的命运着手分析，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德国的特点；明白了新老历史学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懂得了这些学派没落的必然性。而在资产阶级学派已经穷途末路之际，卢森堡点出社会民主党内居然还有人想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借来思想去修正和“向前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真好比是一个醉鬼向自己的影子去要鼻烟。这里显然讽刺的是伯恩斯坦派别。

“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的蛊惑

在《烂核桃》和《“德意志科学”支持工人》两文中，卢森堡主要是批判“世界政策”（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学者教授，如布伦坦诺、施穆勒、桑巴特等人的思想和作用。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当年曾协助反动政府打击社会民主党的教授们缩进书斋和讲坛，沉默了几近十年。卢森堡说，由于十九世纪末期有了一个经济高涨时期，“一个世界政策的时代开始了”。资产阶级认为准备进行的征服将会带来金雨一般的利润，也就具备了吸引工人阶级的诱饵。另一方面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又使资产阶级欢呼“战胜马克思”的时候已经到来。于是便命令本已缩进书斋的教授们出来对无产阶级进行蛊惑。其中卢森堡着重批判的是桑巴特。这是由于桑巴特具有特点。桑巴特曾是施穆勒的学生，后来竟声明是由于马克思才使他同施穆勒分离的。桑巴特实际上是用马克思的一些用语来歪曲马克思。连施穆勒也称桑巴特是蛊惑家。

桑巴特向工人阶级保证说资本主义的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工

人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中的份额是不断增加的。他声言他的“德意志科学”，他的“历史的”、“正确的”、“现实的”方法可以做到给予所有人而不必取之于任何人。工人的工资可以提高、企业家的利润绝不减少、消费者还能得到满足。桑巴特这一观点来源于他根本否认资本的历史所经历的血腥道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人的心理根源和生物根源，甚至把爱情也当成资本主义发生的因素之一。卢森堡嘲笑桑巴特这种为资本主义掠夺史辩护的唯心主义和庸俗伦理学。她说：“事事如意，皆大欢喜：工会会员得到较高的工资，企业主维持了原有的利润，占有了更大的销路……而教授桑巴特先生则天下闻名。李嘉图、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全部科学废物被抛进大海，‘现实主义’方法的轻舟‘一帆风顺驶进了二十世纪……’”

桑巴特还向工人阶级推荐工会运动，说它可以防止危机，在经济上工会运动是万能的。同时又提出一个条件，即工会运动必须从社会民主党的“监护”下解放出来。桑巴特诬蔑社会民主党“讨厌”工会运动。

卢森堡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态度。同时指出德国工会一开始就是把自己的政策和斗争放在正确的基础之上。党和工会之间不是对立的。只有工会不站在阶级斗争基础上，而是站在桑巴特提倡的阶级调和基础上时，它们才会是对立的。卢森堡说桑巴特的目的是“用愚蠢的煽动让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脱离社会民主党的科学”，而去相信桑巴特的“德意志科学”。卢森堡揭露桑巴特的科学决不会支持工人。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略我国，因此卢森堡说桑巴特的“科学”支持的是德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这支队伍正在中国登陆，去完成“匈奴人的文化使命”。

卢森堡尽管没有直接把桑巴特和伯恩施坦联系起来，但是桑巴特的观点可以使人处处想起伯恩施坦的观点。比如说庸俗伦理

学、阶级调和论、工会的作用以及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所作的辩护等。还有一点，桑巴特企图用他的“科学”煽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脱离社会民主党的科学”，把社会民主党“搞得文明一些”。伯恩施坦是希望社会民主党变为一个改良的党。这是他们之间颇具特点的联系。

这三篇文章总的目的已在《烂核桃》一文中讲明。由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学者以为增加了“战胜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于是出版和发表了多种书刊以及文章侈谈“马克思主义危机”。这些出版物多得象风中掉下来的核桃。卢森堡嘲讽说可惜尽是些烂核桃。卢森堡的文章就是为粉碎这些烂核桃而写的。文章证明讲坛社会主义者等的理论已经腐烂，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却是这些早已死亡腐烂、早已被埋葬和遗忘的理论的复活。卢森堡在这里尽管只是进行嘲讽，而没有深入分析这一复活，但毕竟明白无误地指出讲坛社会主义这些流派是伯恩施坦思想来源之一。在研究和批判伯恩施坦思想时，卢森堡的这三篇文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人物传记

乔治·朱利安·哈尼

刘 丽 明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初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①——宪章运动。它第一次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同时，它还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在这些工人运动活动家当中，有一位在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并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工人中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宪章派左翼领袖，他就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乔治·朱利安·哈尼。

—

哈尼 1817 年 2 月 17 日生于伦敦附近的小城镇德特福特。父亲是海员，母亲是工人。由于父亲过早去世，哈尼靠母亲辛苦积攒的几个钱断断续续地在私立小学读了几年书。十一岁那年，他被当作孤儿送进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受训三年，毕业后被分到船上当服务员。因身体虚弱，他只在船上干了六个月就离职了。哈尼来到伦敦，先在一家酒店里当侍从，后来又又到一家印刷所学习

^① 《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76 页。

排字。

在伦敦，哈尼目睹了资产阶级在改革选举法案通过前后的嘴脸。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促使他勇敢地投入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

1833年初，年仅十六岁的哈尼加入了当时英国最大的一个工人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当时他最崇拜《贫民卫报》编辑詹姆斯·奥勃莱恩，把他当作“导师、哲学家和亲密的朋友”^①。奥勃莱恩所宣传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巴贝夫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对哈尼的影响极深。

哈尼还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争取出版免税报刊权利的斗争。他在加入全国工人联合会的前一年，在著名的不交印花税的杂志《贫民卫报》的创办人赫瑟林顿开的一家书店当了售货员。在那里，他不仅有机会读到许多宣传民主共和的书报，而且可以接触到赫瑟林顿、奥勃莱恩等反对交纳印花税运动的领导人。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哈尼很快就成了反对交纳印花税运动的一名勇敢战士。

1834年至1836年，哈尼因卖送各种不交印花税的报刊曾三度被捕入狱。1836年2月哈尼在得比第三次被捕。当时他是赫瑟林顿在该市的报刊经销人。哈尼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英勇，每次出庭都高声宣布要为争取出版免税报刊权利而斗争到底。当法庭要判他六个月的徒刑或罚款时，他要求接受前者。得比的报纸详尽地报道了整个案子的经过，哈尼的名字因此在得比等地为人所知悉。六个月的监狱生活进一步坚定了哈尼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信念。他发誓要做英国的马拉，为在英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① 《北极星报》1838年5月19日第6页。

1837年初，哈尼同共和主义者戴文波特、尼索姆等人一道创建了由伦敦东头最贫苦的工人组成的“东伦敦民主协会”。由他起草的成立宣言明确宣布：该协会最大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①为了团结更多的工人，哈尼等人又于1838年4月将“东伦敦民主协会”改名为“伦敦民主协会”。他们还全面修改了协会的纲领，宣布：它是首都无产阶级的组织，决心用武力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民主权利。在协会的会员证上也印有“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的口号。协会的革命原则和激进口号吸引了许多码头工人和纺织工人。到1838年底，会员已增加到三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洛维特领导的伦敦工人联合会。^②

二

1838年5月伦敦工人联合会以法案的形式正式公布了它在一年前拟定的关于争取普选权的六点要求。这个被取名《人民宪章》的法案一公布，立即得到全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一场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哈尼在运动刚开始就带领他的组织加入了为争取宪章而斗争的行列。他站在以菲格斯·奥康瑞尔和奥勃莱恩为首的“暴力派”一边，反对以洛维特为首的“道义派”关于只能用和平手段实现宪章的观点，坚决主张实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以武力获得宪章。很快他就成为伦敦“暴力派”的领袖。

在宪章派筹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哈尼是人民宪章和“暴力派”思想的热情宣传者，号召人民武装夺取宪章。在斯密斯

① 参看肖因《宪章主义者的挑战》1958年伦敦英文版第15页。

② 哈尼在“东伦敦民主协会”成立不久曾同协会的其他几位领导一起参加过这个组织。他由于不赞成该联合会领导人所采取的妥协路线很快就被开除。

菲尔德，他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爱国志士，头上戴着一顶象征自由的红帽子发表演说，号召学习雅各宾党人的榜样举行武装暴动。在得比，他要人们宁可把英国变成一片巨大的可怕的虚墟，也不让暴君们在这里实行可恶的统治。

1839年2月，哈尼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宪章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暴力派在伦敦的势力不大，哈尼未能当选伦敦的代表，而是被选为得比、新堡和诺里奇三个城市宪章派代表。

会议期间哈尼一直主张采取激烈行动。3月6日代表大会向议会递交了一份要求实行人民宪章的请愿书，并决定派代表分头去说服议员。哈尼认为资产阶级议会不会听从这种劝说，坚决反对这一决定。他宣布所代表的地区的人民已经作好准备，要夺回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会把宪章派群众组织起来，进攻伦敦。哈尼还同奥康瑙尔等人一起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鼓动伦敦人民做好战斗准备。哈尼领导的伦敦民主协会于同年4月创办了《伦敦民主主义者》报。哈尼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措词激烈的文章，批驳“道义派”的观点，宣传起义的主张。他在4月20日的报纸上呼吁各地“武装起来，把暴君从土地上赶走”。5月4日他又撰文指出，只有暴动，才能获得宪章。

事实证明了哈尼关于劝说无用的意见。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于7月12日否决了有一百二十五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同时开始了疯狂的镇压。哈尼于7月初再一次入狱，一星期后被保释出狱。

这时代表大会正在讨论举行神圣月罢工的问题。奥勃莱恩提议就此事征询各地宪章派的意见，绝大多数代表表示附议。哈尼则表示反对，坚持认为实现宪章的唯一办法，是象法国在1789年那样举行全国性起义。他的激烈言行引起不少代表的反感和非难。有些人甚至以他被捕后很快获释为由，怀疑他是警察当局派来故意破坏运动的特务。

根据大多数地方宪章派组织的意见，大会决定不举行神圣月罢工。而伯明翰、新港、南威尔士等城市的宪章派仍举行了起义，但都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这些起义的失败以及哈尼自己受到的各种非难，使哈尼冷静了一些，开始对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所认识。

鉴于请愿失败和反动政府的疯狂镇压，宪章派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9月6日在奥勃莱恩的提议和哈尼等人的附议下宣布解散。哈尼离开伦敦，先到诺森伯兰和伯明翰这两个宪章派势力比较大的城市参加群众集会，接着去苏格兰进行了几个月的巡回演讲。

苏格兰宪章派由于组织严密而仍能继续活动，使哈尼很受启发。他在1840年3月《北方解放者》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和不久后在《苏格兰爱国者》上发表的一封《致大不列颠民主派》的公开信中，认真提出了宪章派的组织问题。他认为请愿之所以失败，除了代表大会意见不统一，以及有相当一部分人民缺少爱国热情之外，宪章派组织的松散，战斗力不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宪章派当前的任务应当是从上到下建立起一支组织严密的、战斗力强的队伍。他建议成立一个常设的宪章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并以宪章派宣传员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取代每星期日的教会宣传活动。同时他指出，这并不等于可以放弃武力，他“仍相信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作用”，坚信宪章的实现以及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最后还得诉诸武力”，这里只不过有个时间问题。哈尼在谈到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过：“1840年的他比起1839年运动开始时的他聪明了许多。”^①

1840年7月，宪章派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宪

① 肖因《宪章主义者的挑战》英文版第94—97页。

章派全国协会。哈尼参加了协会的创立工作。之后，他又到苏格兰宣传鼓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步行二千多英里，对各地宪章派群众发表了数百次演说，还为奥康瑞尔主办的《北极星报》撰写了很多通讯。这些活动加深了哈尼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和斗争精神的了解，增强了他为争取工人阶级政治权利而斗争到底的决心，也锻炼了他的斗争才干和提高了他在苏格兰及其它地区的宪章派中的威信。

在苏格兰，哈尼同当地一位纺织工人的女儿、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玛丽·凯麦隆结了婚。1841年4月他们一起回到伦敦。

哈尼刚一回到伦敦，许多宪章派组织就邀他前去讲演，西莱丁区还请他做了本区宪章派宣传员。四个月后，奥康瑞尔又正式将他聘为《北极星报》驻谢菲尔德的通讯员。于是哈尼便携带妻子一同前往谢菲尔德。不久，他就成了这个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的宪章派负责人，并领导那里的宪章派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想使宪章运动服从自己的企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842年初，随着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宪章派又掀起了第二次请愿运动。这时运动的领导权已转至以奥康瑞尔为首的“暴力派”手中。为了实现宪章，奥康瑞尔采取了同反谷物法同盟联合的斗争策略，并于4月12日召开了为时三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并向议会递交了第二份请愿书。这份请愿虽有三百五十多万人签名，却仍未逃脱被否决的厄运。

哈尼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他积极领导谢菲尔德的宪章派参加了这次运动。他反对大会关于同反谷物法同盟联合的策略，认为这些资产阶级是想利用宪章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宪章派不能上资产阶级的当。

同年6月，他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长篇演讲，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立即行动：全心全意地为推翻这个可怕的制度而努力奋

斗”，并发誓“要实现我们的宪章”。^①但他这时的主张已经不象1839年那样激烈。他仍坚持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宪章，但又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先组织起来，然后再同政府进行较量。

此后不到两个月，曼彻斯特、兰开夏、约克郡等地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游行，要求提高生活待遇，有的地区还提出要实现宪章。宪章派为此在曼彻斯特召开了紧急会议，并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举行全国总罢工。哈尼出席了会议，但属于少数派，他反对总罢工，认为罢工除非变成起义，否则不会成功；而起义的条件目前尚不具备。事实证明了哈尼的观点。这次罢工很快又被镇压下去。宪章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很低的低潮时期。

三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哈尼得到奥康瑞尔的更大的信任，在宪章派中的威信也进一步提高。1843年他应奥康瑞尔的聘请，当了已是宪章派机关报的《北极星报》编辑，并第一次当选宪章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同年秋，哈尼在里子《北极星报》编辑部第一次见到了前来向他了解宪章运动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恩格斯。他晚年回忆起这次会见时写道：“1843年恩格斯从布莱得弗德来到里子，到《北极星报》的编辑部来看我。这是一个高大漂亮的青年人，有着一张差不多是孩子般的面孔。尽管他原是德国人并且是在德国受的教育，但他所讲的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却使人惊讶不已。他说，他经常读《北极星报》，对宪章运动很感兴趣。这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五十余年的友谊。”^②此后不久，哈尼随《北极星报》编辑部迁往伦

① 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34—235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466页。

敦。四十年代的伦敦是欧洲革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在这里，哈尼同大陆各国的流亡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和募捐等方式给了他们很多帮助。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有赖于各国工人的互相支持。在当时的宪章派左翼领导人中，差不多只有哈尼一人同大陆革命流亡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845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到英国进行了为时六周的旅行。在伦敦，马克思第一次、恩格斯第二次会晤了哈尼。他们向哈尼了解了宪章运动的情况，同他交换了对工人运动的看法。他们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克思恩格斯称哈尼是“真正的无产者”，^①是宪章派的“最革命的领袖”。^②哈尼尽管要争取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真正的、完全的平等”，要建立的是巴贝夫的共和国，但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取得了政权，才能改变自己受奴役的地位。正是这种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思想，促使他在这次会见之后开始向马克思和恩格斯靠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期间，以哈尼为首的伦敦宪章派革命派、正义者同盟盟员以及各国革命流亡者正在酝酿成立一个国际民主派的组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促进下，第一个国际民主派组织——“民主派兄弟协会”于1845年9月22日成立了。哈尼积极参加了它的创建工作，并担任了它的书记。

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中，哈尼是一位非常积极的活动家。他不遗余力地促使各民族民主派彼此接近。由于他的努力，协会不仅加强了各国民主派的联系，而且也扩大了自己在宪章派中的影响。宪章派中的许多人改变了自己在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初期所持的不信任态度，转而参加协会的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8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695页。

虽然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初期所宣传和主张的基本上是正义者同盟的思想，所采用的是该同盟“人人皆兄弟”的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对它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恩格斯曾专门撰文报导过它的成立，说它是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的一次联合。^①为了使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们通过哈尼同这两个组织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主动或应邀在哈尼主编的《北极星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他们关于工人运动的思想，介绍和评论大陆上的民主运动。恩格斯从1845年起到1848年3月德国爆发革命之前一直是《北极星报》的德国通讯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哈尼与奥康瑞尔等人的观点越来越不一致。

1845年底，哈尼出于对巴贝夫平均共产主义的信仰，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正义者同盟改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哈尼参加了这个同盟并出席了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1847年11月，哈尼在伦敦再次见到了前来参加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一次同他们交换了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应哈尼的邀请，在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召开的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哈尼的言论中日益明显。他放弃了一些模糊的“民主词句”，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些观点。1848年1月8日，他在《北极星报》上撰文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现在应当成为革命斗争的伟大目标。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没有给自己提出解放劳动的目标……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2—676页

只有当工人掌握了政权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所有的革命中，工人只是流血，却一无所得……他们只是更换了自己的主人。而现在人民应当结束他们的死敌——资产阶级——的统治了。”^①在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宪章派联合召开的大会上，他提出：“英国的民主运动无疑就是无产阶级运动，其结果必然是社会改革。”^②他放弃了“人人皆兄弟”的口号，而主张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对敌。当英国的资产阶级借口“法国侵略的威胁”，煽动英国人民敌视法国人民时，他立即以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名义发表告英国和爱尔兰人民书，指出资产阶级才是法英两国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大会时，他于1847年12月代表民主派兄弟协会致信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表示支持，并积极筹备。

哈尼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憎恨，而在宪章派和伦敦的革命流亡者当中却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1846年底，资产阶级激进派报纸《每周快讯》攻击哈尼，而宪章派全国执行委员会一致对他表示声援。1847年英国大选，哈尼作为宪章派的竞选人在伦敦梯维尔顿区的竞选讲坛上与大名鼎鼎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对阵，结果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获胜。

哈尼从1845年到1850年底一直担任《北极星报》主编。在这期间《北极星报》一直是最有威信的宪章派报纸。

哈尼领导的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会员在这段时间也不断增加。到1847年夏，协会在二十几个城市建立了分会，参加协会的各国流亡者也越来越多。哈尼在各国民主派的声望和影响也迅速增加。他的言论经常为波法等国的民主派转载和引用。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第477页。

② 同上，第478页。

四

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英国的工人阶级又掀起了第三次宪章运动的高潮。哈尼在听到法国的七月王朝被推翻时，欣喜若狂。他认为这是工人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统治的灭亡已经注定。3月4日他和琼斯、菲利浦、麦克格雷森三人作为宪章派代表前往巴黎向法国的临时政府递交贺信。在巴黎他们会见了马克思，并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马克思在巴黎组织的同盟新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

当 they 从巴黎回到伦敦时，整个英国已经沸腾起来。到处都在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实行宪章，改善生活。格拉斯哥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不顾军警的镇压，在游行时喊出了：“没有面包，就要革命”的口号。有些工业区的工人甚至武装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这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面前，哈尼的斗争情绪异常高昂。3、4两个月，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每天几乎都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每一期的《北极星报》几乎都有他的文章。他热烈地赞颂法国二月革命，激烈地反对向国王请愿的作法，呼吁英国人民采取“法国式的做法”，号召宪章派立即建立地方组织做好起义准备。他甚至还宣称：英国工人阶级也能在“三天的工作”中获得政权。^①

4月4日宪章派再次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哈尼作为诺定昂宪章派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上他宣布，他的选区的群众已决心将这次请愿作为最后一次请愿；并表示坚决支持琼斯关于大会应一直开下去，直到宪章成为法律为止的提议。大会根据琼斯等人的建议决定：4月10日在肯宁顿公地召开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第479页。

群众大会，会后游行，前往议会呈递请愿书。大会主要领导人和多数代表商定，如请愿失败，将采取某些“最后措施”。哈尼对此抱有很大希望，他甚至提议：代表们先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一旦自己被捕或受伤，由继承人接替他们继续战斗。

4月10日统治阶级调集了大批武装军警，准备镇压会后的示威游行。宪章派主要领导人一看军警林立便非常恐慌。在政府的威逼下，他们答应取消示威游行。哈尼本人由于看到“敌人的力量不断增强”，而“人民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也同意了这个决定。

很快，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再次否决了宪章派的请愿书，并于5月13日下令解散宪章派组织。这一切使哈尼进一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学说的正确性。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靠请愿什么也得不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绝不能给工人以政治平等权利。在奥康瑞尔等人转向资产阶级激进派时，他和宪章派革命派的另一位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影响下，决心在更加革命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宪章运动。由于琼斯于同年6月被捕入狱，两年后才获释，哈尼成了这个期间的革命宪章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他的主要活动阵地就是《北极星报》。

在请愿失败后的几个月中，哈尼领导宪章派的革命派同以奥康瑞尔等人想使宪章运动依附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作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不顾奥康瑞尔的反，坚持在《北极星报》上宣传宪章派革命派的观点和主张。哈尼在总结法国2月至5月的革命经验时指出：普选权不能保证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社会改造。他认为工人阶级运动的目标应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宪章运动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纲领才能重新成为一场群众运动”。^①他批判了奥康瑞尔及其追随者“利用宪章来把部分工人安

^① 肖因《宪章主义者的挑战》第193页。

置在小块土地上，最后使地产小块化成为英国的普遍现象”的做法，“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使土地仍旧归国有”的社会改革纲领。^①此外，他在《北极星报》上刊登和转载了更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巴黎工人举行六月起义时，哈尼和宪章派革命派通过《北极星报》对他们表示了热烈的声援和支持。哈尼在报上详细报导了巴黎工人的起义并代表宪章派革命派宣布：他们坚决站在起义工人一边。他还以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名义号召英国工人阶级保卫巴黎的无产者兄弟。对于《北极星报》的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予以高度评价。

由于奥康瑞尔作为《北极星报》的办报人越来越严重地阻挠哈尼的编辑工作，哈尼在1849年3月给恩格斯写信，请他帮忙创办一个“不仅仅是宪章派的”，而且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和帮助下，哈尼的《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月刊于1849年6月正式创刊。这份杂志存在了一年零三个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为它写了大量的文章。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日益接近，以及同奥康瑞尔思想分歧的逐渐加大，终于导致哈尼与奥康瑞尔在一场激烈的笔战之后分道扬镳。1850年5月，哈尼辞去了任职七年的《北极星报》编辑，并于1850年6月22日创办了《红色共和党人》周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帮助和影响下，这个周报采取了更加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用哈尼自己的话讲，“《红色共和党人》的使命是为工人阶级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消灭阶级……作准备。”^③1850年9月14日哈尼写了一篇社论，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贫困在于没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20页。

② 参看《哈尼文集》1969年阿森英文版第249—250页。

③ 柯尔《宪章派的人物》1965年纽约英文版第293页。

有掌握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只有掌握国家政权才能获得解放。11月，周报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并以编辑部的名义高度评价《宣言》是德国革命者最先进的政党的卓越文件。

哈尼的这个没交印花税的革命报纸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为了躲避政府的司法追究，《红色共和党人》于1850年12月更名为《人民之友》继续发行，直至1851年7月最后停刊。

1849年11月，他重新改组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已经相当涣散的民主派兄弟协会，并在协会的新章程中明确提出：“协会的目的是争取建立一个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兄弟联盟。”^①但改组并未能振兴协会的工作。这个协会终于在1853年彻底解散。

1849和1850年，哈尼任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行委员会内他也努力坚持宪章派革命派的主张。

1850年底奥康瑙尔一伙不顾宪章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反对，积极筹备要在曼彻斯特召开宪章派代表会议。1851年初哈尼给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信，请他出席奥康瑙尔派在那里召开的代表会议，并且将会议的“主要决议的基本内容……以及奥康瑙尔所采取的路线”通知给他。^②由于哈尼、琼斯和宪章派革命派的共同努力，奥康瑙尔一伙的曼彻斯特代表会议受到1851年3月31日召开的全国宪章派代表大会的谴责，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代表想控制代表大会的企图也未能得逞。

1851年初，哈尼同琼斯一起为即将召开的全国宪章派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革命性更强的纲领。他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实行土地国有化、鼓励合作团体、废除国债、出版自由等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并写明宪章运动要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新纲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第487页。

② 参看《哈尼文集》第261页。

领受到宪章派革命派的一致拥护。许多青年人为这个新纲领所吸引，加入了宪章派革命派的行列。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及后来的两年是哈尼最靠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也最倾向于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时期。然而，作为宪章派左翼的一位著名领袖，哈尼虽然很有组织和活动能力，并且很会撰写文章，也颇有讲演口才，但他自己从来没有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没有明确的固定的纲领和主张。他的思想观点经常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他起草的一些纲领文件和撰写的文章常常是各种思想的混合体。这种情况即便在他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期表现得也是很明显的。

就在哈尼决心在红旗下实现宪章，号召工人阶级开展独立斗争争取自身解放的同时，他仍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往密切，并不惜牺牲宪章派革命派的原则去联合他们。他不仅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他们的文章，而且还试图同他们建立联合。1850年8月至年底，哈尼召开了有工联、合作社运动和欧文派代表参加的“民主派代表会议”，商议成立一个各派联合的组织。由于宪章派做了很大让步，会议制定出了一个包括同意宪章的六点要求，以及实行土地国有等十条措施的纲领。但由于各派代表不同意宪章派全国协会担任领导，联合组织未能成立，哈尼的希望彻底落空。

对欧洲大陆的流亡者，不管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哈尼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一面积极为这些流亡者募款、寻找工作和谋生手段，一面努力为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提供机会。在他主办的《民主评论》、《红色共和党人》以及《人民之友》等刊物上，不仅刊登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也有不少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马志尼、卡贝等人的文章。

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哈尼不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英

国的传播作了很多工作，而且同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好，1850年4月哈尼甚至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布朗基等人一起在伦敦达成了一项关于成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协会章程第一条写明要“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①

然而就在这同时，哈尼同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科西迪耶尔、马志尼等被马克思称为“渺小的大人物”的来往也很密切。他不但刊登这些人的文章，而且同他们一起组织召开各种集会，成立各种团体。哈尼早在法国二月革命时期就非常赞赏路易·勃朗的卢森堡委员会的活动，并视他为自己尊敬的朋友。他也十分敬慕赖德律-洛兰，1849年12月曾以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名义写信对法国小资产阶级活动家、赖德律-洛兰组织的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大加称颂。他还经常与马志尼通信，以非常谦卑的态度对马志尼的观点表示尊重。

在哈尼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巴贝夫的平均共产主义及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与密谋行动都是争取解放的道路。对于哈尼这种行动上的不偏不倚，理论上的糊涂，以及他崇拜大人物、喜欢热烈的场面和漂亮的革命词藻等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有感觉，并一直想帮助他克服这些毛病，摆脱各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影响，“使他走上正路”。^②可是他们的努力没能奏效。在小资产阶级“大人物”的拉拢下，哈尼终于成了他们手中的一个“普通的阴谋的工具”^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

② 同上书第27卷第207页。

③ 参看同上，第213页。

1851年2月中旬哈尼出席了由沙佩尔主持、有路易·勃朗等人参加的追悼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贝姆将军的大会，并作了长篇发言，把布朗基、巴尔贝斯、路易·勃朗等人吹捧为社会主义的救世主。^①2月24日他又帮助召集并同维利希、沙佩尔、路易·勃朗等人一起参加了纪念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三周年的宴会。

这种公开接近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做法违背了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分裂之初所采取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因此，马克思在2月26日给恩格斯信中指責哈尼背信弃义。恩格斯也表示要停止给已经“陷入民主派的泥坑”^②的哈尼撰稿，同这位曾经是他们同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联系的宪章派领袖划清界限。

2月24日宴会之后，哈尼完全站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边。他甚至公开宣称不愿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尾巴。从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上彻底分手。此后他便“沿着斜坡迅速滑下去”，以致发展到攻击宪章派，^③最后退出英国的政治舞台。

1851年3月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会通过了哈尼和琼斯一起拟定的那个新纲领。然而就在这次大会上哈尼公开宣称宪章运动已是“有首无身”，他不想再为实现新纲领而斗争。琼斯邀请他一起合办《寄语人民》杂志，哈尼断然拒绝。而当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办起《寄语人民》杂志时，他又用自己的《人民之友》报与之竞争，反对琼斯按照新纲领的路线恢复宪章运动。只是几个月后他的报纸由于竞争不过才不得不停刊。他携妻子回苏格兰呆了八个月。那里宪章运动的情况没有增加他对运动的信心。1851年12月他在新堡公开宣布，他认为宪章运动不可能再恢复。在新的—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5页。

② 参看同上，第215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28卷第525页。

年的宪章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他声明自己不当候选人。从此哈尼脱离了宪章运动。

此后，他又试图发起一场新的运动，组织一个既有原宪章派、又有支持宪章六点要求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的全国性组织。为此，哈尼1852年2月从苏格兰回到伦敦后，以《自由之星报》的名称恢复出版了《人民之友》。4月他又抢先买下了麦克戈温打算转让给琼斯的《北极星报》，将该报与《自由之星报》合并，作为新运动的喉舌。《自由之星报》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上，鼓吹老宪章派同合作社运动和工联运动的合作，号召人民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1852年5月8日哈尼在报上刊登了一篇攻击宪章运动的文章，指责琼斯领导的革命宪章运动只是阶级运动，声称他主张的是普遍的民族的运动。

1852年8月至10月期间，哈尼同候里欧克、汉特、库伯、牛顿等合作社运动和工联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一起，在芬斯伯里具体商议成立以实现普选权为目标的英国“统一的民族党”的问题。为了同激进派结盟，他甚至答应放弃人民宪章的其余五条以及宪章派的社会要求。尽管这样，经过两个月的激烈争吵之后，这个联盟仍未结成。

随着建立新组织的计划的落空，哈尼的《自由之星报》也于1852年11月因无销路被迫停刊。在这同时哈尼还创办了《卫报》。这个报纸于1853年初也停刊了。从此，哈尼开始对英国的政治丧失信心。1853年初，他在《卫报》的最后一号上写道：“无情的现实环境迫使我沉默。但是我为美好的事业献身的决心是不会变的。我承认，我现在对这个国家的可悲的政治以及它的更加可悲的政治家们——各个派别的政治家——毫无兴趣，激励我的希望只能在其它的国度中找到。”^①

同年2月，哈尼的妻子病逝了，他失去了经常在政治上帮他出

谋划策的“可尊敬的家神”。^②这对哈尼的政治热情又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1853年7月早已处于奄奄一息状态的民主派兄弟协会正式宣布解散。至此哈尼断绝了同宪章运动组织上的一切联系。

1853年11月28日哈尼出席了波兰流亡者在伦敦为庆祝1830—1831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组织的大会。当他被宣布为主席时，“出席的五六十个英国工人，大闹会场表示反对。一片嘘声，大喊大叫‘叛徒’、‘骷髅’（他曾这样称呼宪章派）、‘变节分子’。大打出手。哈尼不敢就主席位，他被乱揪、乱打、乱骂，虽然多次试图发言，但始终无法开口。”^③这番遭遇哈尼当然不能忍受。他立即决定离开伦敦，不再同宪章派发生任何联系。

1853年12月哈尼来到新堡。当时俄土战争刚刚爆发，英国国内各种势力在英国是否要对俄宣战的问题上意见纷纭。哈尼希望战争会促使欧洲大陆发生革命运动，加入了新堡主战派的行列。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约瑟夫·考恩的邀请下，他担任了新堡主战派报纸《北方论坛》的编辑。1855年初，哈尼又当上了企图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的主战派组织——新堡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于政府对这个委员会所提出的要求和主张丝毫不加理睬，哈尼的政治改革之心又一次死灰复燃。他同考恩一起组织了“共和派兄弟会”，并再次提出了争取普选权的口号。但几乎无人响应，参加者寥寥无几。《北方论坛》在同年三月也因找不到几个读者而停刊。这次努力的失败，使哈尼对英国政治改革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他发誓不再参与英国的任何政治改革活动。

1855年正当英国政府按照法国政府的要求，驱逐在泽稷岛避

① 柯尔《宪章派的人物》英文版第295—2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6页。

③ 同上书第28卷第312页。

难的法国流亡者时，哈尼到了泽稷。一向热心援助流亡者的哈尼，这时仍未失去他对流亡者的同情心。他抗议英国政府的驱逐决定，只身前往格恩济，向维克多·雨果等法国流亡者递交了声援信。

哈尼在泽稷岛定居下来，并于1856年同一个叫玛丽的寡妇结了婚。这位夫人带来前夫的一个儿子和一笔不小的家产。因此哈尼过上了比以前舒适的生活。

1856年夏，哈尼应聘担任了《泽稷独立报》的编辑。他以广泛的题材、活泼的文字和诙谐的笔调很快使这家小报在仅有五万人的泽稷岛上每周发行一万六千份。

哈尼除努力使报纸适合小市民的口味外，还竭力使报纸在政治上与泽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观点相一致。1856年9月他还参与建立一个由地方商人、小船主和银行职员组成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改革同盟，并领导这些人同岛上的封建残余制度和大地主垄断势力进行斗争。

1857年10月恩格斯到泽稷岛养病时见到了哈尼。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哈尼“很高兴离开伟大的政治而退居他那渺小的盲人国”当“反对派之王”^①；说哈尼对于自己在泽稷“扮演市侩角色”十分得意，宪章运动的一切对他已是“理论上的空谈”，“如果打扰一下他在这里进行的拙劣的庸俗的宣传，他就会非常不乐意”。^②

就是在这种“庸俗的宣传”和活动中，哈尼在泽稷度过了近八个年头。1862年底，哈尼在对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共和派的态度上与《泽稷独立报》的所有人发生了冲突。报纸的所有人要求报纸与英国政府和英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报刊一样，采取反对美国的共和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5页。

② 同上，第188页。

的态度，哈尼则坚持采取支持共和派的态度。由于双方互不妥协，哈尼只好辞去编辑职务，并于1863年5月带领全家移居美国。

哈尼一到美国就受到波士顿自由派的热烈欢迎。他们为欢迎他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帮他找到了一个固定的职业——马萨诸塞州土地总局书记。然而，亲眼见到的美国却使哈尼对这个国度的民主事业非常失望。他拒绝参加他们的任何活动，过起了一种近似隐居的生活。

从1863年来到美国在波士顿住下直至1878年退休离开州土地总局，哈尼从未离开过马萨诸塞州。他每天按部就班地去土地总局上班，业余研究文学，后来甚至成了一位公认的研究拜伦的专家。

尽管哈尼努力避开政治活动，但他并未放弃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的观察，更未停止对欧洲大陆及英国的革命运动的注意。他订阅了许多英国报刊，经常给英国的报纸投稿，报道美国的时事政治。对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他感到高兴。1869年他写信给国际总委员会，表示赞成国际的纲领，申请入会，并寄上会费。对巴黎公社失败他表示痛心，致信马克思，申明他完全支持国际的立场。

1871年初，马克思给他写信，索取有关美国公有土地问题的材料，他及时将材料找到，并立即给马克思寄去。此后，哈尼恢复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中断了十几年的通信，在信中他也经常谈到自己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政治问题的看法。哈尼的观点虽然消极悲观，但他内心深处仍希望能出现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能见到有益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政治活动。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消极悲观情绪越明显。

1878年3月，哈尼在给恩格斯的一封长信中说道：“请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的那些成就总是怎样地让我们失望！请看一看争取

‘出版自由’的斗争又取得了什么结果。由于参加那场斗争，我十七岁就进了监狱”，“你可曾梦想过会见到象现在的‘自由派’和‘激进派’这样一帮该死的家伙吗！”他哀叹恩格斯为他编辑的《北极星报》投稿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并伤心地说：“现在我老了，一身都是病，不仅肉体受到痛苦，精神也受到压抑。”^①这不仅是对他当时境况的描述，也是他整个晚年的写照。他不仅痛苦地忍受着风湿病、肺病和眼疾的折磨，而且“用消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和人”。他觉得“所有的阶级”都是“贪婪”和“自私”的，他对什么革命都“一概不相信”。在他看来爱尔兰人的解放运动不值得同情；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让人怀疑；美国工人组织的“幼稚性”令他反感；法国如再发生革命，“其结局只会是再一次的血腥镇压”；而英国的工联领袖及社会主义者以至整个工人阶级都不可信任。他认为自己同胞“既有奴性，又很残暴”。^②他甚至骂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是“地痞流氓”。

1878年7月哈尼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探亲两个多月。他在伦敦看望了恩格斯；去巴黎拜会了路易·勃朗；到新堡访问了曾一起办《北方论坛》的约瑟夫·考恩，并又一次接受他的邀请，做了《新堡每周纪事报》的撰稿人。他还在滑铁卢车站遇上了二十几年未见面的马克思及其全家。与故旧亲朋的会面激起了他的强烈的怀旧之情。而看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祖国和美国一样为商品和金钱所垄断，工人阶级只是在表面上生活有了些改善，又使他对这个社会更加悲观失望。但随着年事日渐增高，哈尼的叶落归根的心情愈益强烈。他后来又回英国四五次，并在1888年7月14日最终离开美国，回到英国。

① 《哈尼文集》第278、280页。

② 同上，第350页。

回国后，哈尼住在里士满，直到去世。他除了担任《新堡纪事报》的文艺专栏作者外，没有再做任何工作。尽管经常有各方面的人士向他了解宪章运动的情况，请教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但他没有参与任何党派的活动。恩格斯等曾建议他写一部宪章运动史。他虽然搜集了一些资料，却始终没有动笔。对此恩格斯深表遗憾。

哈尼这时只靠给《新堡纪事报》撰稿为生，而疾患又愈来愈多，境遇非常艰难，他的夫人不得不继续留在美国任教了好几年。恩格斯对这位宪章派的老战士非常同情和关怀，经常借钱帮他还债，为他寻找生活来源，甚至在他生病时让自己的保姆去照顾他。

哈尼在晚年一直同恩格斯保持着通信，珍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马克思逝世时，他给恩格斯发了唁电和唁信，要为恩格斯“分担痛苦”。他希望恩格斯尽快写出马克思的传记，使世人了解这位“心地最善良、最有天才和最富于吸引力”的伟人。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哪怕是表面上同你观点不一致，我都不愿意。”^①在他逝世前不久，他还给报纸撰写怀念恩格斯的文章。

1897年12月9日，这位著名的早期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的革命老人告别了人世。1863年5月他离英赴美前曾指着自己对为他饯行的朋友们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他一直是个民主主义者，现在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希望至死都是个民主主义者。”^②哈尼的一生正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位曾经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① 《哈尼文集》英文版第359页。

② 肖因《宪章主义者的挑战》英文版第261页。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

〔法〕皮埃尔·弗朗克

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

我们在前面着重谈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现在来谈一谈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急剧恶化,中共党员们的处境越来越糟,党对加入国民党之事讨论了多次,而共产国际则听不进对这一问题的批评意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中国问题第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三驾马车分裂的原因也就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对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托洛茨基也没有出席这次全会。负责中国问题的印度人罗易在全会上拿出了一份未经全体委员讨论的决议。该决议的主要精神是替国民党说话的。决议指出:

“中国工人在上海和香港举行的政治罢工(1925年6月至9月),是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也是强大的民族运动的起点,……在这个运动中,组成阶级工会并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也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人民政府的首要领导者。……”

* 本文是法国皮埃尔·弗朗克的《共产国际史》一书中的一节。——编者注

“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加强了国内所有革命民主组织，特别是革命的人民政治国民党和广州的革命政府。其核心成员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行动的国民党，是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联盟。……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使广东省的整个政治生活大大民主化。因此广州政府就成了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也是中国未来的革命民主结构的典范。……”

“一度依附于国民党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去年脱离了国民党，结果就以国民党右翼为基础组成了一个集团。这个右翼集团公然反对与劳动群众结成紧密联盟，主张排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并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

“……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将在反对两种有害偏向的斗争中建立起来：既要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它不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任务，以致同整个民族运动散漫地合而为一；又要反对极左情绪——它的表现是企图跳过运动的革命民主阶段，而立刻着手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完全不考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和决定性的因素——农民阶级。尽管环境有它的特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还是同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极为相似。……”^①

决议中所讲到的右翼并不是指蒋介石，而是指国民党内那些来头不小的右翼集团分子，国民党在前年就把这个集团开除出党了，因为它妨碍了国民党寻求莫斯科的支持。人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把国民党说成是反帝斗争中的“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联盟。”“城市平民”指的就是与工人有着“共同利益”的城市资产阶级分子。决议对国民党性质的分析以

^①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381—383页。

及所指出的“共同利益”的观点便构成了共产国际一贯坚持的中国政策的基础。1926年7月，反对派“十三人声明”的矛头只是对着苏联领导在其他问题上所持的一贯政策，而并未触及在中国问题上苏联领导所持的一贯政策。该声明指出：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殖民地国家人民正在为取得独立而斗争……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与欧洲和世界革命以及东方反对帝国主义桎梏的斗争直接相关。”^①

反对派干预中国问题是比较晚的。在第七次全会上，反对派既没有被准许参加委员会的讨论也没有被准许参加全体会议的讨论，而反对派的态度是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应从国民党中和从已经建立的农民苏维埃政权中退出来。恰恰是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代表在此次全会上进行激烈的辩论。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干涉了这个问题。他在指责不接受蒋介石军队的正确革命作用的那些人的同时，肯定了蒋介石军队的正确革命作用。他指出：

“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②

这样讲是不符合事实的。斯大林在讲话中还批驳了那种中国共产党应退出国民党和不参加政府工作的观点。他指出：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

^① 参看本刊第9辑第255页。——译者

^②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5页。

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米夫认为必须立即提出成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而且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迫切的问题。……”^①

斯大林所谈的这些意见都被第七次全会所采纳。全会通过的决议没有提到蒋介石一手挑起的“3·20事件”的问题；中国问题的报告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谭平山在全体会议上向代表们暗示了这个问题。谭平山在他的令人感兴趣的发言中指出：

“……按国民党员的社会成份，可以分成反映着复杂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五类。

极右派

这个集团代表买办和大地主（伍朝枢、古应芬）的利益。

右翼

右翼是由大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和富裕侨商组成，后者在右翼中特别多。……

中间派

它代表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渴望独立自主的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确，这一派的拥护者在国民党里为数不多，但它现在独揽军权，因此，我们应该予以特别注意。它的经济基础不是最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因而它必须在军队里经营自己的势力。它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完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看作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武装保卫者。

这一派系的领袖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应该说后者受前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前者的思想体系。戴季陶是三月事件的实际发难者，而蒋介石只是他的工具。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8—329页。

.....

左翼

左翼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多数国民党员属于左翼。它联合城市的中、小商人，中、小农民和佃农以及知识界。左翼的主要领袖是汪精卫。……

共产主义派

属于这一派的是在国民党里工作的全部共产党人、城市无产者和加入国民党的一部分少地的农民。”①

谭平山虽然在报告中分析了国民党内各政治派别的情况，而他在报告中所谈到的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与斯大林——布哈林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应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所有阶级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也应同在目前还没有同帝国主义往来的那部分大资产阶级合作。须严肃指出的是，由于它的本质，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妥协和叛变。”（全会文件记录，第339页）②

与其说同大资产阶级合作，倒不如说站在追随蒋介石在上海中国其他城市屠杀劳动群众的大资产阶级一边。1927年3月，法共《人道报》以及其他欧洲共产党的机关报刊都登出蒋介石的大幅照片并注明他是中国革命军队的统帅。当由苏共三名年轻的党员纳佐诺夫、福金、阿尔布雷希特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俄国代表团的一份长篇报告——《上海来信》的时候，也就是当蒋介石准备搞政变的时候，另一个由英国的托姆·曼、法国的多里奥、美国的白劳德组成的代表团在巡视了蒋介石军队所经地区之后，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80—183页。

② 这是布哈林在1926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参看《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462页编者按部分。

在他们各自领导的委员会中散发了倾向于蒋介石的声明。该项声明被世界性的共产党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转载了。声明指出：

“现在绝不会发生国民党的分裂，也绝不会产生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之间的敌对情绪。……蒋介石自己声明过他服从党的决定。象蒋介石这样的革命家，是决不会象帝国主义所希望的那样，同反革命张作霖实行合作的。……上海工人阶级的唯一危险是帝国主义的挑衅。”（1927年3月23—30日）^①

反对派在什么是中国革命的直接危险的问题上曾向莫斯科敲过警钟。而在4月5日，斯大林向党的三千名干部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国民党是一个集团，是一个包括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内的革命议会。为什么搞政变呢？当我们处于多数时，而且右派又听从我们时，为什么要把右派赶跑呢？……当右派对我们一点作用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赶跑它。但现在我们还得需要它。蒋介石可能不赞成革命，但他还能指挥军队和能反对帝国主义——他也不能做别的。此外，右派分子同张作霖部下的军官们有关系，可以使他们士气低落和劝说他们带着武器和辎重投向革命。右派分子同富商们也有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募集款项；因此，对右派分子一定要利用到底，象榨压一只柠檬那样，先把它榨干，然后再把它扔进垃圾箱。”^②

就在斯大林讲这番话的前一天——4月4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共同签署了一个联合宣言，从这个宣言中可以看到：

① 参看《罗易赴华使命》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60—61页。

② 这是斯大林在1927年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所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参看《罗易赴华使命》第61页。《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494页编者按部分。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
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这类
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
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
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
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
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
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
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
一致。……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
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①

人们很清楚这些辟谣的作用，而《国际新闻通讯》未加评论就
把这个宣言转载了。该宣言指出的“谣言”“蜚语”的出现是大有来
头的。几天以后，蒋介石在上海便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劳动群
众的惨案，而共产国际对这一事件的事实真相还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直到4月20日的《国际新闻通讯》才发表了执行委员会4月15
日的题为“蒋介石叛变”的声明。这项声明以“革命的国民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两个口号为结束语，这未免有点太含糊其辞
了！直到此时，共产国际还没从根本上放弃其一贯坚持的政策，又
同武汉政府搞在了一起。不久以后，布哈林讲到：

“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蒋介石集团是绝对错误的。……退出国
民党的策略现在比以往更为不合时宜。”（《国际新闻通讯》4月30
日）^②

①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
第268页。

② 《罗易赴华使命》中文版第75页。

4月21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斯大林的文章，继续坚持同一方针：

“……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其次，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既然路线已正确了，既然蒋介石由一个革命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反革命，那么再继续坚持同一条路线好象就没有多大关系了。我们在下面谈到的是第八次全会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继续谈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在这次全会上占有重要位置。

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8—30日)

共产国际的会议从未在形势对其领导集团不利的情况下召开过，尽管反对派在事实上遇到了与日俱增的困难。共产国际在中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204页。

国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败导致了在其他问题上，主要是在英国问题上的失败。

第八次全会的到会代表共七十七名，其中只有三十三名代表有表决权。有关全会会议议题的报告从未发表过，这如同历史之谜一样；会议发表的一些口头性的批评也是掺有水份的，不足以相信。《国际新闻通讯》只限于发表一些有关全会的议事日程的安排和一些粗线条的述评；几天以后，随着一篇令人迷惑不解的通告发表了全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通告指出：发表各项决议时作了“若干无关紧要的删节，因为资产阶级恐怖政权在一些国家所造成的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如此”。事实表明，反对派在此时已沉默下来。全会的主要议题是：（1）关于英国共产党任务问题；（2）关于中国革命问题。首先，我们先简单谈一谈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最后结局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在总罢工失败之后强烈攻击了英共和国内少数派运动。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处境越来越糟。3月底，该委员会在柏林举行会议。苏联工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重申“英国工会运动的唯一代表和唯一有发言权的是英国工会委员会和它的总委员会”，并保证“互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还是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工会代表团谴责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并要求英国撤回在中国的军队。托洛茨基在第八次全会上曾提出一项提案。该提案的内容是：要求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中的苏联工会代表团提出一项关于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简明决议，并以此来反对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直接分裂。全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这项提案。全会通过了一项充满矛盾的有关英国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

“英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向工人说明英国工人和苏联无产阶级团结的重要性，面对着英国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这种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党必须向工人说明，由于整个委员会，从希克斯和柏塞尔

到汤姆斯的破坏行动，英俄委员会没有能够完成它的巨大任务。在与俄国工人团结问题上，总委员会玩弄了两面手法，它口头上主张团结，可是实际上阻挠两国工人建立真正的联盟。……英国共产党必须特别向工人说明英俄委员会最近一次柏林会议的真实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总委员会非但没有扩大委员会的作用，反而坚持限制它的作用并且始终贯彻这一政策。”^①

几天以后，布哈林在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问题已经清楚了，在我们极端困难的形势下解散英俄委员会是很正确的。我们认为，是形势迫使我们做出一连串的让步。……”

布哈林的语气太保守了；到底是形势迫使让步还是主动宣布解散英俄委员会，这就矛盾了。正是在解决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几个月后，突然发生了英俄委员会借口苏联人“干涉”英国工会运动内部事务的事件。尽管英国问题和中国问题在性质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尽管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与中国国民党在性质上不一样，但苏联领导对它们所实行的政策却是一样的。不仅在阶级搏斗之前，而且在阶级搏斗之后，苏联领导对那些很值得怀疑的盟友却抱有幻想。这并不都是受沙皇的影响吧？这正是“一国社会主义”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

现在来谈一谈成为全会阻力的中国问题。洪别尔-德罗曾提到，由于多数派中出现的偶然情况，中国问题的讨论提前进行了。意大利代表团（或该代表团中部分成员）以及洪别尔-德罗本人拒绝谴责那些不听话的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对此极为恼火，是斯大林批准不让季诺维也夫出席这次全会。洪别尔-德罗还谈到了全会上出现的沉闷气氛和共产国际在第二年发表了一本约有一百六

^① 《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513—514页。

十页的有关中国问题讨论的小册子之事。这本小册子在各国共产党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小册子中的内容包括：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托洛茨基在全会上两次讲话中的一次讲话以及魏奥维奇在全会上的发言。小册子中还包括：1928年2月25日在第九次全会上通过的，而在第八次全会上未能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联合反对派在第八次全会之前曾在其控制的苏共基层支部中向苏共和共产国际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反对派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散发了一份称之为“八十三人声明”的文件，并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散发了这份文件的副本。在这次全会上曾出现了许多代表前后多次发表论证性发言的场面。许多代表对汪精卫所领导的武汉政府的态度是很鲜明。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指出：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①

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

“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基本倾向表明，它们是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的革命联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使国民党成为包括城乡劳动人民在内的真正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低估武汉政府、同时实际上否认它起着有力的革命作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从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9页。

派的阶级成份来看,它们不仅代表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在国民党左派支配下的武汉政府并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政权,而是走向这样专政的政权。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它将失去它的资产阶级同路人,肃清一些背叛行动,从而必将朝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方向发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工作,……同时,就是对最密切的同盟者的不够坚定的表现提出批评,并应保证政府政策的正确性。……”^①

托洛茨基和魏奥维奇都极力反对苏共中央发布禁止季诺维也夫出席这次全会的命令和颁布限制党员去了解共产国际多数代表立场的规定。托洛茨基在全会的讲话中曾谈到了“上海来信”、斯大林4月初的讲话以及其他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些问题。他就武汉问题谈到:

“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导承担丝毫责任,我们也强烈劝告共产国际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向中国农民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如汪精卫之流确实欺骗了你们。如果你们要服从武汉政府的领导,那你们就要建立起自己的委员会。土地革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汪精卫之流的政客们在困难的形势下背着工农与蒋介石勾搭过十次。……农民没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假如他们要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引导,那就由你们来引导。……你们应建立起与农民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你们自己的委员会。’推迟武汉政府的‘改组’和推迟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是能避开直接的战争危险的,这是一条最保险的路,但也是一条最迅速失败的路。”^②

① 《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531—535页。

② 这是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就中国问题所作的第二次讲话中的一段话。参看《罗易赴华使命》中文版第94页;《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527—528页。

正当全会上的这场讨论继续进行时，武汉政府的军队首先在长沙向劳动群众挥起杀人的屠刀。7月上旬，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两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一次新的政变。7月14日，也就是第八次全会闭幕六个星期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得不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指出：

“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结束；武汉政府已经成为反革命力量了。……尽管共产国际提出劝告，国民党领导人事实上并没有支持土地革命，反而让土地革命的敌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①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是根本不听共产国际劝告的！直到此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7月14日的决议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如下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人不要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的领导正在进行驱逐共产党人的运动，仍然要留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为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做好准备。”^②

既然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步国民党右派的后尘向共产党人挥起了杀人的屠刀，而共产国际还要中国共产党人“做好准备”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虽然路线没有改变，但应找出失败的责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还揭露了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负有主要责任的，他在党的8月7日的会议上被迫辞职。

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干涉使得与苏共领导集团的矛盾激化到极点，一些事件的发生促使苏共领导采用各种方式来结束其内部的斗争。此时，英苏之间发生了新的外交事件。英国保守党政

① 《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541—542页。

② 同上，第543页。

府借口苏联驻伦敦的贸易代表团搞间谍活动而搜查了该代表团的驻地。5月27日(正值全会召开之时),英苏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样就拉大了英共和共产国际之间想再进一步接触的距离,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借这次事件指控反对派在形势危急的时刻颠覆国家政权。事实表明,斯大林的确马上就要对联合反对派采取措施。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结束语中宣布说:

“……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①

八次全会还通过了一项含糊其辞的“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的发言”的决议。决议中指出:

“反对派领袖的方针以及他们进攻的性质都不外乎公然破坏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共产国际认识到自己有义务要毫不留情地和坚决彻底地消灭这种极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并制止这一群破产的领袖的不断的敌对攻击。……”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的原则和行为都不符合他们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身份。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绝对禁止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继续进行宗派斗争。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授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继续进行宗派斗争的情况下,经国际监察委员会同意后,将他们正式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决定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

性步骤保护苏联共产党，以免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的宗派斗争的侵害。”^①

把托洛茨基和魏奥维奇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这次全会为召开下一次全会所采取的一个步骤。为了搞清楚这一章，除了研究联合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外，还应研究一下苏联领导对中国问题政策的那些理由以及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苏联政策的理由

尽管整个中国问题政策被搞得一塌糊涂，那为什么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还继续坚持它呢？为什么抓住国民党不放呢？我们已经说过，苏联的一大批老战士其中包括那些反对派分子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中国那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作所为同英法老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两样。那些老战士虽然参加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但他们没有从十月革命的实践中为俄国找到所要走的道路，也没有为中国找到所要走的道路。对大多数老战士来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苏联领导制定中国政策所依据的理由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给了他们制定中国政策的权利。他们首先缺乏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更确切地说，缺乏年轻的数量甚少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克里姆林宫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及其革命力量不抱任何信心。它所需要的倒是中国资产阶级这个盟友；通过一些事件可以看出，象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再好不过的盟友能反对帝国主义吗？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才能；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

^① 《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518页。

中发挥最大聪明才智的倒是鞠躬尽瘁、勇于献身的中国工人阶级。此外，苏联领导之所以害怕把中国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是因为要是这样发展下去会干扰它难以维持的现状。我们所讲的这些话是有许多材料作依据的，并不是一语惊人，而是为了更具有说服力。

陈独秀被解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是1927年8月，被开除出党是1929年8月。在这个时期中，他重新回忆研究了他所参与过的一些事件，以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苏共反对派对中国革命所持的各种态度。1929年12月10日，他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发出了一封信^①，认为党对他的审查和对他的处理结论是正确的，他在这封信中的语气是极其严肃的。他在信中谈到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党的领导人提出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苏联反对派的观点，他们对反对派的思想观点没有任何概念，正是由于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每到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提出相反的意见并强迫那些党的领导人服从。陈独秀在他的那封信中所披露的事实是：

“……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

^① 即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

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扰乱租界等”。^①

陈独秀紧接着谈到了国民党左派军队一手挑起长沙事件之后的情况。他说：

“……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②

鲍罗廷在接见美国记者路易斯·菲舍尔时所表示的态度还是那样干脆。被视为“同路人”的这位美国记者在苏联生活多年，曾采访过李维诺夫、拉科西、拉狄克等一些大小苏联领导人。他对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很感兴趣，在他的《国际事务中的苏联人》一书中曾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辩解过。在他的另一本《人与政治家》中介绍了他在莫斯科期间曾以私人方式结识了一些苏联领导人，他所说的话不能全信，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不能不信。下面所摘的一段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5—396页。

② 同上，第396—397页。

话是鲍罗廷在1929年与这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讲到的：

“当我提到苏联存在困难的经济形势时，鲍罗廷同意并说：‘当革命还未迅猛到来之前，大概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思索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东方的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将会给莫斯科增加额外的负担。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场英国式或德国式的革命。’……”

1929年，还并不是许许多多时代的战士为革命前途完全彻底地献身的年代，即使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种年代的到来。鲍罗廷所讲的这番话很能代表克里姆林宫的思想，即对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不抱任何信心，而对那些被金钱收买的将军们的胜利却极感兴趣。中国革命的胜利被看作是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沉重负担。在这些问题上，斯大林长期坚持己见，他曾力图促使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并且一直怀疑中国党能否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和夺取全国政权。

译自《共产国际史》(1919—1943)

1979年法国拉布雷什出版社版
第529—544页。

(张连仲译)

回到亚当·斯密去！

〔德〕罗·卢森堡

爱·伯恩斯坦曾在本刊对许列尔博士的一部早些时候的著作《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它的反对者》进行过评论^①，现在我们谈的是许列尔博士这一作品的续篇：《历史学派的经济政策》^②。

毫无疑问，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这个题目本身就非常饶有兴味。首先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历史学派是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理论领域中唯一真正的民族产物。古典自由学派时期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同样都只是英国古典主义的一个分支。哈勒^③—弥勒^④的浪漫学派尽管在实践中颇有影响，但几乎称不上是一个国民经济学学派。它甚至未曾尝试去建立一种积极的经济理论，就我们所知，勉强可以说是它的唯一的学术上的信徒是有名的雅尔克^⑤，而照白尔尼^⑥的说法，此人是由于维护梅特涅的政策而从普鲁士的

- ① 伯恩斯坦的文章发表于《新时代》第13年卷(1894—1895)第2册第211—214页。文章标题和许列尔的著作相同。——编者注
- ② 理查德·许列尔这一著作是1899年在柏林出版的。——编者注
- ③ 卡尔·路德维希·哈勒(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人。——译者注
- ④ 亚当·亨利希·弥勒(1779—1829)——德国经济学家，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代表人物。——译者注
- ⑤ 卡尔·恩斯特·雅尔克(1801—1852)——德国政论家，1832年任维也纳宫廷和首相府顾问。——译者注
- ⑥ 卡尔·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6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译者注

反对派中被提拔出来当奥地利顾问官的。同样，我们也不得不宁可把李斯特^①的政治经济学“民族体系”也看作一项业余爱好者的探讨，而不是什么理论学说。只有历史学派提出了一个经济学说的完整体系并在专家学者和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物们中赢得了极大一批信徒。

还有一点，就是历史学派的内部历史忠实地反映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如果在探讨这个学派的学术观点、方法和发展阶段时把它们同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考察，那么这一探讨同时也将是德国资产阶级近代发展的一幅速写。

决不能说，许列尔博士是象我们这里分析的那样去理解他的任务的。他所提供的不如说是对一群重要的古典自由派、反动浪漫派和历史学派理论家的政治经济观点非常粗略的评述，以及对上述各流派的不同方法所作的一般考察，这同样是很粗浅的。

许列尔博士十分正确地把进行研究工作的演绎法称做是古典自由派国民经济学的最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这一派在实践中起进步作用的基础。他同样正确地指出，历史学派由于放弃了演绎的研究方法，因此缺乏各项确定的原则，并因而在理论上毫无建树，在经济政策上也处于落后状态。这一切在许列尔是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作热烈的辩护，同时也是他在劝告当代国民经济学家回到这一方法去。但是对于历史学派为什么丢掉了古典的研究方法以及怎样来解释历史学派尽管浅薄和落后却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具有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我们在许列尔博士那里得不到回答。而只有把这些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才能弄明白许列尔在全部分析结束时对当代经济学提出的劝告。

①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译者注

本世纪初古典经济学说的独家统治地位就是在德国也是众所周知的。马尔维茨^①在1810年写信给拉尔说,亚当·斯密是除拿破仑之外欧洲最强有力的君主。这话决非过甚其辞。在普鲁士施泰因—哈登堡时期^②的所有国家活动家都是亚当·斯密的学生。那一时期政府的绝大多数文告都带有古典学说的明显印记。甚至高级军事将领格奈舍瑙^③、沙恩霍斯特^④、维茨莱本^⑤全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热烈信徒。斯密的理论是德国整个改革时期的圣经。这是在耶拿大败^⑥之后,有短短一段时期改革派曾经从顽固的反动派手里夺取了权位。

但是这一理论很快招来一个对立面的原因也正在这里。施泰因—哈登堡的进步改革并非来自一次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运动,也不是起源于社会本身。不如说是法国的打击促使统治阶层作出这些改革,而这个统治阶层又简单地把它们强加于社会,它们也很快就造成了来自两个阵营的反对派:一方面是目的在于挽救农奴制的容克,另一方面是中产等级中的那些人,他们认为新近的改革首先威胁了他们的利益,这主要是在当时还很有力量的手工业阶层,取消行会制度和有利于英国货进口的自由贸易政策都严重地伤害了他们。

①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马尔维茨(1777—1837)——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②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施泰因(1757—1831)——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在普鲁士推行资产阶级改革。他的继任者是卡尔·奥古斯特·哈登堡(1750—1822)。他们执政的年代被称为施泰因—哈登堡时期。——译者注

③ 奥古斯特·威廉·安通·格奈舍瑙(1760—1831)——普鲁士将军,曾任北德意志联邦总参谋长。——译者注

④ 格尔哈尔德·约翰·大卫·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普鲁士将军,曾对军队进行改革。——译者注

⑤ 约布·威廉·卡尔·恩斯特·冯·维茨莱本(1783—1837)——普鲁士将军,曾任国防部长。——译者注

⑥ 指拿破仑的军队在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军队。——译者注

第一方面的反对派在哈勒—弥勒反动浪漫学派中反映出来，第二方面的反对派则反映在早期历史学派朔登、卢登、克恩和其他一些人身上。人们只要考察一下在这两种情况下，产生反对古典学派的这两种经济学派的社会基础具有哪一种性质，也就容易说明它们不同的理论特点了。

反叛的容克对资产阶级发展的开端所提出的抗议在哈勒浪漫学派中得到了反映，他们针对被他们批判的改革提出一个非常明确和顽固的“理想”：中世纪封建主义。这种政策的理论表述——浪漫派经济理论完全和梅特涅的反动、和神圣同盟时期一样明确、顽强和有力。这种理论从一些确定不变的“原则”，即从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各项原则出发，并且顺理成章地在有关经济政策的所有问题上运用这些原则。

第二个反对阵营的情况则不同。行会中产等级即——手工业师傅和小店主等人的生存虽然受到革新的威胁，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眷恋封建主义独占统治的时代，因为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留给他们的同样是血泪伤痕。他们本身不是一个紧密的社会整体，他们也就不可能提出一个确定的积极的经济政策纲领。他们在资本主义新近的发展和封建传统之间摇摆不定，两种伤害都叫他们害怕，他们做得到的只是时而站在封建立场向自由主义国民经济学斗争，时而又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向浪漫派理论斗争，永远拒绝从出发点得出彻底的结论，永远半途而废。

稍晚由希尔德布兰德^①—罗雪尔创立的历史学派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行会制的小资产阶级以中世纪生产方式的名义反对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制度，这里却是现代资产阶级本身起来对它自己阶级统治的后果提出抗辩。

^①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政治经济学中历史学派代表人物。——译者注

古典国民经济学按照不可战胜的逻辑处处都最终转化为自我批评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在英国，李嘉图^①直接开创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整个学派(汤普逊^②、格雷^③、布雷^④等)；在法国，紧跟着第一个把古典经济学平庸化的萨伊^⑤之后出现了西斯蒙第^⑥；在德国，在劳^⑦以及随后的杜能^⑧和洛贝尔图斯^⑨的学说中已经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萌芽；到了马克思，古典经济学完成了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也就是转化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分析。

只有战胜了出发点——古典经济学，才能否定结果——社会主义的批评。古典学说用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表述了它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探讨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加以否定或修改的。剩下可以做的只有反对这个研究本身即方法。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和基本规律，

-
- 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 ② 威廉·汤普逊(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结论。——译者注
- ③ 约翰·格雷(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 ④ 约翰·弗兰西斯·布雷(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译者注
- ⑤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译者注
- ⑥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译者注
- ⑦ 卡尔·亨利希·劳(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译者注
- ⑧ 约翰·亨利希·杜能(1783—185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译者注
- ⑨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那么历史学派正相反，它把使这一经济的内部联系神秘化当成自己的任务。旧历史学派过去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均等化”和“范畴化”性质的反感只不过是中世纪各种关系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提出的抗议，这种多样性和特殊性是适应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的。到了罗雪尔、克尼斯和希尔德布兰德，对古典主义的“绝对理论”的“历史的”批判却是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认识它自己内部规律表示抗议。掩盖这些规律就是新历史学派的目的、是它的“历史的”使命和存在的权利，因此它也把对社会经济的规律的否认提高成科学的教条、经济学的方法。

各得其所：古典学派宏伟的理论大厦的落成和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德国资产阶级的上升在思想上的表现却是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自我解体和没落。

许列尔博士正确地责备历史学派缺乏原则，但是他对这一点没有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历史学派的缺乏原则是可以从德国实际的历史情况、从资产阶级的历史、从日益表现得彰明昭著的阶级对立中找到足够原因的。同样，从同一些实际的情况出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尽管罗雪尔学派在科学上贫乏可怜，在实践中毫无建树，但它却仍然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影响，这比用“适应当代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各个有原则的流派才刚刚发展起来”这种状况来解释要清楚得多。

恰好相反！既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学说显然是适应当代社会问题的有原则的学派，那么历史学派的出现就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学说尚未产生，而是由于它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发展，也就是说，历史学派是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反动。

许列尔博士没有联系社会基础去分析这个问题，他因此犯了双重错误。首先他把本世纪头十年的旧历史学派和本质上与这个学派不同的罗雪尔学说当成同一个学派去观察，其次他认为罗雪

尔学说的产生是缺少一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结果，他不懂得恰好相反，罗雪尔学说是社会主义批判的反动。

许列尔博士的研究企求具有超出一部科学专著的意义。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那样，这一著作在结束时劝告当代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回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如果他们想用古典学者对待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的那种认识来处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话。

回到古典方法去！这一好心的呼吁显然是许列尔两篇经济学著作的主导思想，他想给今日德国国民经济学的沉闷空气吹进一缕清风，这个愿望毫无疑问是十分动人的。只是许列尔博士的建议再次表现出来，由于他在考察经济学派问题时没有联系这些问题当时的社会基础，因此他既没有理解他所赞赏的古典学派的本质，也没有理解经济学说的当代任务。

许列尔博士把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之处归结为这个学派的演绎的方法、归结为它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原则态度。但是抽象地说，演绎法是一个纯粹形式的学院概念，它还丝毫没有说清楚斯密学派所擅长的研究方法的本质。如果仅仅是指“在研究中引进普遍的预先确定的原则”，那么除了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是可以称道的。如果按照许列尔博士的说法，斯密和李嘉图的演绎的基本原则就是经营自由、迁徙自由和贸易自由，那么亚当·弥勒和哈勒也有领主裁判权、奴隶制和宗法制的国家等等演绎的原则。作为演绎推断，从方法学上讲，它们是等值的。当时的确没有人象浪漫派那样严厉地指斥过历史学派的缺乏原则，没有人象浪漫派那样热情地宣传过必须把“永恒规律”当作经济分析的出发点。

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使人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哈勒和弥勒的浪漫派演绎法只不过在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和梅特涅那里为这一方法的代表者取得了巨大的声望。因此

原因显然是在于，只有古典自由派的演绎法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它才适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

但是由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经济的一般基础当成他们研究的绝对“原则”，因此他们的研究又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在古典学派看来，现代商品经济是绝对的、标准人的商品经济。而这就是他们从之出发的实际原则，也就是他们那奇妙的演绎法的真正秘密。

正是这种对标准人的性质的，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然权利的无限的和毫无杂念的信仰，使国民经济学古典学者能够那样不带偏见地进行研究，那样坚决地得出结论，那样大胆地冲天飞翔，他们从这个信念出发，以天才的眼光把握住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

后来产生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一方面引起了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态度，它把目光从对普遍规律的探讨转向为个别现象辩护；另一方面是历史学派的退让态度，它事先就放弃了对经济的基础的任何研究，并宣称单纯描写过去的事物和现存的事物是科学的任务。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构成所有这些经济学派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绝对性和正常性的信念确实是古典学派的独特之处，正是这种信念使它成为古典的学派。

这种情况不仅说明了斯密学派的一般的科学成就，也说明了这个学派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特点。世界主义，对人的同等看待，个人主义，经济私利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基础的这种观点等等，所有一切被历史学派批评家算成是斯密学派罪过的东西，来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普遍人性标准，商品生产者就是标准人本身这同一概念。

但是给斯密学派的主观上无畏的、完全公正的研究预先设置下客观界限的也就是这同一个观念。只有在运动中，在历史条件

中去观察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才能说明它的最本质的东西、才能解开它内在的秘密。而这一点恰恰一开始就被把商品经济当成社会生产的标准的、绝对的形式这一观点给排除掉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古典经济学不顾一切社会后果认为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因素，并极为透彻地制定了这一理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李嘉图的表述。

那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不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承认这一区别，就连对马克思理论的通俗阐释也多半忽视了这一点。这一区别在于：由于李嘉图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具有普遍自然法观念，他也就认为创造价值是人类劳动、是单个人的个人的、具体劳动的自然属性。^①

相反，马克思却认为价值是一个抽象，是一种由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抽象。他由此区分出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个方面：具体的、私人的劳动和无差别的社会劳动，通过这一区分才解开了货币之谜，如同在灯光照耀下一样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为了用这一方法在资产阶级经济内部静态地区分劳动的二重性，区分劳动的人和创造价值的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必须在事先动态地按历史顺序把商品生产者和劳动的人本身分开，这就是说，仅仅把商品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态来认识。一句话，为了解开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秘之谜，马克思必须用一种同古典派经济学家相反的演绎法来进行研究，他必须依靠对资

① 这一概念在亚当·斯密那里表现得尤为显著，比如当他一开始徒劳地在动物（如狗）身上找寻“交换的倾向”之后，他把这一倾向直接解释为人类本性的特点。众所周知，这一点和另外一些话曾屡次引起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傲慢的嘲笑和轻蔑。斯密的逗乐的弟子们完全没有料到，被他们付之一笑的老大师的天真正是最经典地表达了他的“古典演绎法”，而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在失去这种天真时也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们的参孙之发——他们研究力量的本源。——卢森堡注

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非永恒性的洞察，而不是根据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符合人的正常性质的信念去进行研究，他必须把古典学者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法转变成它的反面、即辩证的演绎法。

国民经济学所取得的超越斯密和李嘉图的进步，它的继续发展恰恰是以克服这个学派的演绎法为条件的，而许列尔今天却宣传回到这个演绎法。这不仅是由于，象上面讲过的那样，这一方法给认识设置下固定的界限，而且也是由于古典派经济学家自己已经达到了这一界限。经济学的古典方法在李嘉图的学说中已经发挥了它所能起的最大限度的作用，它已经被抛进了废物堆，因为它不仅对于研究界本身是危险的工具，而且在科学上是一件不能再用的工具。回到古典学派的方法并不象许列尔博士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学的新的跃进，而是会导致巨大的倒退。正是在新的基础上直接继承古典派学说的马克思的著作证明这种倒退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

但这种倒退从社会上讲也是不可能的。在古典经济学之后，这门科学同时堕落为庸俗经济学和历史学派，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自从上述派别出现以来，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已经使那种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性质的古典的乐天信念丧失基础）仍旧继续向同一个方向发展。不仅是阶级对立暴露得无可比拟地尖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也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在普遍重新转向保护关税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不可能象以往那样把贸易自由当作出发点，同样，当生产愈来愈多地被卡特尔垄断时，也不可能采用自由竞争的教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各项原则”在今天无论在科学上还是社会上都已属于逝去的时代。

普遍号召“回去”看来是今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口号，许列尔关于回到古典经济学方法去的劝告并非首倡。有趣的却是，它是

这普遍的呼声的一个部分。哲学上回到康德去！经济学上回到亚当·斯密去！异常紧张地回头抓住已经被克服的观点这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社会上已经陷入绝境的明确无误的征兆。但是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都是不会发生倒退的。

只有在马克思开辟的辩证的方法的道路上还能前进。所有和许列尔博士一样足够正直和勇敢的年轻的国民经济学家都应当弄明白这一点。许列尔的正直使他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混乱、对它的缺乏体系、思想贫乏和头脑糊涂的状态不能满意，他的勇气使他能为科学的认识而牺牲阶级的偏见。即使在目前，资产阶级理论家被迫依靠马克思学说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提出的每一种勉强算得上明智的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马克思的学说借用来。①

正如资产阶级社会只能二者择一：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是崩溃，政治经济学也只能选择：是在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前进还是宣告自己作为科学的破产。

发表于《新时代》第18年卷
(1899—1900)第2册第180
—186页。译自《罗莎·卢
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
文版第1卷第2册第728—
737页。

(方 瑜译 殷叙彝校)

① 这一情况使下一事实显得特别地叫人啼笑皆非：在我们的队伍里新近有人非常起劲地试图反其道而行之，想借助年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恰恰是那些由于悄悄地享用马克思的宝藏才得以维持自己的教授生涯的经济学家去修正和“向前发展”这同一个马克思学说。这一事件使人生动地想起一个醉鬼拼命想向自己的影子要一撮鼻烟。——卢森堡注

烂 核 桃

〔德〕罗·卢森堡

白尔尼曾经说，每当他读他的半官方反对者的文章时，都觉得自己好象是在咬一个烂核桃。每一次他都一丝不苟地用力将这个半官方的核桃咬开，然而出乎意外，牙齿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狠狠地碰到一起，神经陡然一颤，口里留下来的只有令人作呕的味道——好象含着蛆。现在阅读那些不可胜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书籍、小册子和文章的人碰到了类似的情况，而最近几个月里，这类作品简直象强风中被吹掉的核桃一样接二连三地被抛了出来。

在《康拉德年鉴》的最新版里，一位初出茅庐的西姆克霍维奇博士打扮得怪里怪气，登上了舞台。他在他那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①的六十页的大作中，引述马克思主义从前的和新近的所有著作，提到近两个世纪来的大部分哲学家，让那些所有用活的和死的语言写作的有权威的证人都出来为他发誓作证，还用一些诗句插缀其间。所有这些哲学家、学者和诗人在他那里都以咄咄逼人之势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早已在所有各点上都被生活和科学通通抛到废物堆上去了。

① 约·康拉德编《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年鉴》第3辑第17卷第6册第721—781页。——编者注

这个最新战胜马克思的人从纽约射出他那致命的毒箭，但显然他是在德国的某个大学里被弄得愚昧无知的。这样一句话恐怕就足以说明他自己的“科学”水平了：“卡尔·马克思的……重大错误在于，他提出了一个不是确定社会应该怎样，而是解释社会现在怎样的体系。”^①这就是说，马克思没有制定出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社会方案，而是写出了对现存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说，他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是科学的研究家，他的“重大错误”就在这里。

在本世纪末的今天，如果在其他某个科学领域有一个西姆克霍维奇提出某种类似的论断，例如，认为达尔文的重大错误在于他解释了动物世界的实际发展情况，却没有指出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发展，那么一个科学杂志的编辑部就会把他的文章立刻退回去。唯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尤其是在涉及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此种中学生式的判断却可以在教授们办的一个杂志上心安理得地公诸于众，而这远非一种偶然现象，相反，对资产阶级杂志上和大学里的当今官方社会科学来讲，这倒是很典型的。

“受过科学训练的头脑相信形式上的正义原则的胜利，并对社会组织的技术安排漠不关心，但理解力没有受过培养的人在其信念中却拘泥于一个物质上确定的组织，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图景，而不相信抽象的各得其所的原则”。^②这是西姆克霍维奇的另一个判断。我们看到在他这个人身上有着取得文凭的蠢材们的一切受过科学教养的优点，因此他也不缺乏自负。只有那些未受过教育的群众才会死死抱住为了实现正义原则需要有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那种想法不放，用施塔姆勒^③式的智慧加以科学训练

① 《康德年鉴》第3辑第17卷第6册第736页。——卢森堡注

② 同上，第780页。——卢森堡注

③ 鲁道夫·施塔姆勒(1856—1938)——法哲学家，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译者注

的头脑却仅仅拘泥于“形式上的原则”，也就是说“拘泥于”这个原则在麻雀和德国教授们在其中运动的那一元素——虚幻的空气——之中的存在。此外，在西姆克霍维奇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致的悼词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原则——“革命”、贫困化理论、价值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就象秋天从树上掉下的落叶一样接二连三地败落了，于是福尔马尔、康普夫迈尔、康拉德·施密特和作为所有这些入泰斗的伯恩斯坦就仪表堂堂地列队出场了。对于这一些，读者自己一定会思考的。几个月来在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杂志和一大批厚厚薄薄的书籍中奏起的这个陈腐的曲调过分无聊和单调，不值得人们对它去做进一步的分析了。

然而不管怎样，在所有这些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危机和战胜马克思主义的乏味的老生常谈中，毕竟提出了一个问题。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战胜马克思就是德国教授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行当，也是在德国谋取大学特聘教师职位的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事情甚至还不止于此，倘若人们看一下近二十五年来德国社会科学总的发展情况，就会发现，这一发展除去要战胜马克思这唯一的一件事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个发展的最重要、最积极的原动力就是否定马克思的学说这一意图。

让我们以国民经济学为例。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马克思，从剖析资产阶级制度到揭示出这个制度的运动规律和它的灭亡，这是古典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资产阶级科学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说来，他们必然要否定马克思所得出的社会主义的结论，因此也顺理成章地要诋毁整个古典国民经济学。作为这个经济学的最了不起的工具——导致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基础的演绎法——的对立面。所谓的历史学派被创造出来了，这个学派的原则是，象蚂蚁那样将零碎的“事实”生拉硬扯地拖到一起以及把“历史的”草茎和历史的垃圾堆成整座山丘，在这些山丘的下面，资产

阶级社会的普遍运动规律成功地被掩盖和藏匿起来了。他们就这样用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思辨”来满足现代国民经济学的要求,也就是提供了历史的观点,同时又削去了真正的历史方法的任何革命锋芒。

古典经济学,包括它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马克思的另一个根本特点是对经济现象的客观的研究。柏姆-巴维克—杰文斯^①的“主观学派”是“战胜”这种危险的研究方法的一个产物,这个学派不想从人们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想用个人的灵魂深处的想法来解释社会现象,并通过这种办法来消除资产阶级关系的危险的后果。

尽管采取了这种种办法,然而面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却仍然有必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那些也是由马克思一度加以揭露的,现在还裂开着的伤口进行处理。布伦坦诺的讲坛社会主义,这个“由粪便和火形成的怪胎”,就是为这件事操心的。

哲学,尤其是它的社会学部分,也经历着与国民经济学同样的发展过程。如同古典经济学经过斯密和李嘉图而发展到马克思那样,古典哲学经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顺理成章地发展到马克思,从辩证法和唯物论发展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同“战胜”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完全相似,也必须战胜古典哲学的主要成果:辩证法和唯物论。由于从黑格尔那里开始的哲学的条条道路都不可避免

① 欧根·柏姆-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一种庸俗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杰文斯试图借助于主观的一心理学的因素和数学方法表述一个完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的基本特点。

——译者注

地通向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最危险的强盗巢穴，于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除去简单地通过一道诏令将黑格尔从哲学的发展中一笔勾销并且让科学“回到康德去”之外，就别无他法了。

然而最难办的还是“战胜”历史唯物主义。为了满足一切现代史观的要求，满足一元论，也就是满足统一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唯物主义学说的那些危险的结论，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折腾之后，终于在施塔姆勒的帮助下发明了一个新的、对整个古典哲学来说都是陌生的“一元论”，它将社会生活的所有现象都在教授们的大脑里磨成一片毫无差别的糊糊，可见这个一元论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而简直就是些胡言乱语。它作为衡量各种社会意图是否合理的标准所能办到的仅仅是提出一个“形式上的社会理想”，而这个理想的最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永远也不能实现。

这样，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德国的整个官方社会科学就已经大大地“战胜”了马克思，马克思成了它们的整个存在的秘密根源。不过，战胜者们所有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和哲学的“学派”本身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们的出现不是要去说服马克思的天然追随者，即各人民阶级，而仅仅是为了使马克思的天然敌人，即资产阶级能够自我安慰，或至少能够自我麻醉。不论是罗雪尔^①还是柏姆-巴维克，是施穆勒^②还是施塔姆勒，这些教授的所有夸大其词而又晦涩的废话都摆脱不了那样一个社会阶层的某种穷极无聊的情调，这个社会阶层只在自己人中间相互取悦，并从一开始就准备不加区别地相信凡是反对可憎的马克思的一切。这个

①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罗雪尔(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创始人。——编者注

② 古斯塔夫·施穆勒(1838—191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青年历史学派的首领。——译者注

讲坛上的小集团是以“科学性”自负的，他们自我满足和彼此欣赏，但是在这种种傲态的背后却透露出他们非常不舒服地意识到劳动场所的庞大的马克思追随者队伍的强烈的、无声的蔑视。在“历史学派”故弄玄虚的空话后面可以听到马克思在进行无情嘲讽时得意的笑声，而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步伐声则轻蔑地盖过了讲坛社会主义最卖力的鼓吹社会改良的长篇大论。

他们所鼓吹的简直就是一种“消化科学”，一种促进对于剩余价值的消化的科学，这种科学丝毫不企求或者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剩余价值生产者的尊重。

但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在广度上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许多结果之中，有一种就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机会主义潮流。机会主义处在与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对立的立场上，很自然，它必然要从头至尾经过在它之前几十年资产阶级科学已经采取过的所有一切相同的步骤，更确切说，是倒退的步骤。那些以在讲坛上从理论方面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为职业而领取俸禄的好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转移到社会民主党的营垒中去了，这是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奇的。在伯恩施坦及其门徒们的理论中，由于长期的和毫无效果的大发空论而早已死亡和腐烂，早已自然而然地被埋葬和被忘却了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突然复活了，“主观论者”复活了，施塔姆勒的那个变幻莫测的“社会理想”复活了。这个社会理想就象一只故意捉弄人的蝴蝶，让人永远也捕捉不住（“最终目的对我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捕捉]就是一切”）。不言而喻，资产阶级消化科学的根本性质不会因为有几个迷途的、头脑发昏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它盲目模仿而有丝毫改变。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座座城垣同样也不会因为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人充当志愿兵吹奏资产阶级的喇叭而倒塌。

不过只要党还没有正式地明确无误地将这些事实摆出来，资

产阶级战胜马克思的那整个一伙人就总会舒舒服服地躺在最甜蜜的幻境之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连做梦也未想过的，在社会民主党内似乎竟也有人追随他们了，不是吗，到头来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战胜马克思，对他们自己都开始相信起来了！

正是我们党内的这股机会主义的轻风使得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这种资产阶级的见解象烂核桃一样在最近几个月里如此密集地倾撒下来。调子还是老的，其中的新货色不过是信心和希望。此外还有爱。因为甚至新近出现的西姆克霍维奇也许诺我们说，如果我们发誓与业已被战胜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他就不会忘记我们，并且还打算“与饥饿者分享面包”。

如果说，教授和他们的虔诚的门徒们关于社会民主党内部事务的单调而无聊的“评论”也值得给予回答的话，那真是乏味到了顶点。但是将从前那样的敬畏态度和从前那种应有的自我蔑视再教给他们，而且要通过给予彻底的打击来做到这一点，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为纪念马克思所应做的事情。一个令人痛心的必要性是，在这方面也要涉及到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自己。

发表于《莱比锡人民报》1899年7月
22日第167期；译自《罗莎·卢森堡
全集》1970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
1册第487—492页。

（于智元译 殷叙彝校）

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任务

(1924 年 12 月 1 日在全俄工程师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苏〕阿·伊·李可夫

同志们，我来发言是为了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欢迎，也是为了着重说明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人员在十月革命后所起的作用。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任务是组织 社会主义社会

在人类和国家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象我国十月革命后这样向科学技术人员提出过如此重大的任务。苏维埃国家自成立之日起就认为自己最主要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变为人民的财富。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任务是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我们所组织的经济，所组织的社会以及取得的人类对自然力的胜利，应当能彻底消灭任何饥饿、贫困、不文明和落后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只有善于把科学技术的全部成就用于生活，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组织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整个经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本身才是可能的。

苏维埃国家为科学技术提出这么巨大而广泛的任务，这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建立在比组织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技术基础之上。因此，根据共产主义纲领，根据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纲领，必然出现大力发展科学知识并用之于生活的必要性。而只有照此办理，我们才能加速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锤 砧 之 间

不久前庆祝了十月革命七周年，在我国经济的各方面，在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方面，都进行了总结。我觉得，在科学技术人员占最显著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发展方面，现在也可以作出最主要的总结了。

在十月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曾经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锤和旧俄的铁砧之间。在那种状况下，知识分子当然饱经困苦并且摇摆不定。同沙皇制度和旧社会资产阶级上层关系最密切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流亡国外。这是历史地完全不可避免的。不必说作为资产阶级或沙皇俄国的思想家，因而成为十月革命的直接敌人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就连广大的知识分子都沾染了旧制度的思想意识，所以久久弄不清楚十月革命的意义，对苏维埃国家的长期存在感到不习惯。

只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才明白十月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对整个人类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最近两三年对知识分子所作的最主要的总结，可以说是他们接受了十月革命。大多数知识分子完全赞成十月革命，对巩固的苏维埃制度已经完全习惯。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科学技术人员。

苏维埃知识分子

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同工人们一起在工厂里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我觉得，一般说来，目前可以而且应该把知识分子看作苏维埃知识分子。这一点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明显，当时除了国营经济之外，还出现了私人经济和租让经济。我们在讨论新经济政策并谈到专家、科学技术人员对待新经济政策中私有原则的态度问题时，有些人担心专家会离开我们，担心专家们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会支持私营企业主和租让企业的承租者而反对国营经济和公有经济。实际上，这些人错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指望组织起国营的、公有的苏维埃经济，而指望其对立方面即私有者的只是一小撮。这一小撮人在专家中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我知道，有些工程师对这一小撮人非常蔑视，把他们为私人资本服务看作是背叛共同的事业。我觉得，在这方面已有极大的成绩，这种成绩说明，我们目前实际上正在实现为发展我国经济所必需的一切力量的团结。

你们知道，政府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具有极大的意义。这即使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时期，还建立了以卡尔波夫同志命名的化学研究所和热工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在财政许可的范围内，我们在今后还要帮助高等技术院校开展科研活动。

高等院校将培养出新的技术人员。但是谁也不会怀疑，一个人即使获得了最好的、最出色的高等院校的毕业证书，无论如何还不成其为专家。他应当在富有经验的专家指导下通过实际工作取得这个专家称号，他应当在同老一代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一起工作的同时，经过很好的实习期。你们应当把你们的知识和你们的经

验传授给新一代。

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来特别重视吸引科学技术人员自觉地参加苏维埃国家面临的经济工作。在十月革命后的条件下运用科学技术,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有更大的优越性。每一个电工技师,每一个矿业工程师,即使根据挖掘矿井、敷设电缆和组织电气事业的经验,也都能证实这一点。

在组织新的社会经济的时候,是无须考虑私有权和资产阶级法规的,然而在任何资产阶级社会中,要合理地发展经济,都必须克服由土地、矿藏、交通运输等等的私有产权产生的无穷困难。

在组织苏维埃经济方面,科学技术可以直接用来对付自然界的自然力而没有任何形式的障碍。这使苏维埃的公有经济比资产阶级经济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苏维埃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由计划经济制度产生的。现在,不仅能安排多年的长期经济任务,而且能够借助整个国家权力机构和国有化的公有经济的全部力量来完成这些任务。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这种计划经济。为了保证这种计划经济能运用科学技术的全部成就,我们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它在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切问题上都有极大的影响和极大的作用,并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基本核心是些很有学识的专家和工程师。我们通过这个机构检查我国的全部经济建设。苏维埃制度在实际运用人类智慧的全部成就上的这些优越性,必定会使广大阶层的科学家和专家自觉自愿地参加工作。在目前条件下,他们能在一个大国里以巨大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简易得多地运用科学技术来组织公共的国民经济。

知识分子和苏维埃社会

我认为,要使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的这种实际工作取得成功,就要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习惯于偶尔翻阅国外出版的白卫书籍。侨居国外的人作报告时,通常的一个题目是谈知识分子,说在沙皇时代人们关于知识分子谈得如此之多,知识分子如此受重视,但在发生真正空前变革的时候,知识分子却置身事外,在人民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也没有任何影响,正如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毫无影响一样,尽管他们颇为自负地度过了沙皇时代。这种见解十分正确。知识分子过着非常孤僻的生活,他们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没有扎根,在同我们敌对的阵营中也没有重大影响。当然,我说的不是以自己的心力和笔杆直接为沙皇制度或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些知识分子阶层。那些知识分子阶层过去和现在都是反革命阵营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这种孤僻的生活给旧知识分子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那么新知识分子在用技术来适当而又合理地组织经济的工作中,就应当抛弃这种孤僻的生活。因此,我想稍微谈谈知识分子对我们苏维埃工农社会的态度问题。迅速前进的障碍之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落后和不文明。但是,尽管落后,只要私有者的腐朽的思想影响一消除,那么,维护生产劳动者利益的阶级嗅觉和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使得组织国家和组织社会经济的问题大体上获得正确解决。苏维埃国家就是一种把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制度——劳动专政。工人社会是现在这种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恢复我国经济的道路是要通过这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人物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说,我们的社会经常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即采取不让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工作机会的做法。我并不否认有

这种情况，我甚至要说，这种社会形式，即广大群众参与管理国家、恢复经济的形式，还没有最终确定，这些形式在许多年间将有变化。但是不能认为，管理苏维埃国家就是参加人民委员会的选举，而人民委员会则照“专政”的方式发号施令。

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解决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一些落后分子，他们有时通过苏维埃社会传播自己的落后观点，也有一些工人，他们把本车间的利益看得高于人民的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切都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工人和农民可以在其中完全根据科学、技术和进步的利益来决定一切的这样一种社会组织起来，那我们就已经前进许许多多年了。

应当按人民的本来面目看待人民

毫无疑问，苏联各族人民还在学习，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们在决定问题和行动方面，在生产会议上，在工厂委员会里，在其它组织里，都会犯错误，但是，如果把澡盆里的孩子和水一起泼掉，那就冒失了。错误也需要借助这种社会来纠正。应当让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的恢复经济的工作。为了使知识分子不脱离人民，为了使科学技术的好处同人民密切相关，就应当按人民、工人和农民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他们，并且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满足他们改善经济和本身物质状况的意愿。在对专家的态度上大概是有些错误的，但专家那一方面也有错误。我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农村旅行的时候，曾见到一些在试验田、试验站工作的农艺师，他们认为同男女农民交往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你们看，他们在试验田里进行科学工作，却不愿同愚昧的农民谈话。当然，科学是了不起的，但是为什么竟不能把“试验”田的经验介绍给

农民呢？农民尽管愚昧，但对农业绝非外行。这是旧日的孤僻生活和资产阶级妄自尊大的结果。在苏维埃俄国，农民是应当而且能够懂得试验田的意义和农艺学的意义的。当然，农妇是没受过教育的、愚昧的，但在苏联的生活条件下，她们愿意成为有知识的人，愿意学习。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间，有时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但是，须知工人阶级比农民积极和有觉悟。错误是有的，但错误是两方面的——既是某些专家方面的，也是某些工人方面的。然而科学技术的利益和恢复经济的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社会竭尽全力去实现它们时，才能得到保障。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在一些工作部门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卫生部门。从各工厂和各地选派代表来贯彻保健措施和改善医疗和疗养机构的工作，这种制度正在产生很大成果，使工人代表并通过他们使工人群众自觉地参与国家的重要工作。

发展科学技术应当是全民的事业

教育事业也应当这样做，摆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面前的也是这条路。发展科学和技术知识并运用它们来发展经济，应当是全民的事业。当人民着手安排美好的前途，发展自己的经济的时候，必须让他们知道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能在这方面给他们以无可估量的巨大帮助。为此就需要有苏维埃社会。英国贵族老爷们是会反对苏维埃的工人和庄稼汉的社会的，但十月革命之后这个社会在我们这里恰恰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

在我国条件下，专家、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对于科学技术问题应当具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完全独立自主精神，在这些问题上，无论是迎合社会，即怕搞坏同工人的关系，还是迎合行政当局，都是不能容忍的。对于每一个真正愿意按照科学资料致力于改造经济的专

家来说，在这方面保持见解的完全独立性应当是必要的。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必须保持见解的诚实和独立性。苏维埃国家承担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经济的十分独特的任务。为了正确解决新的技术基础问题，要求专家们在他们所擅长的一切问题上发挥积极性并抱有完全诚实的态度，要求在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中间展开意见争论。如果某个工程师指出我的技术指示（我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作过这种指示）是有害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有权这么说。他是技术专家，而我在技术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可能比在其它任何问题上犯的错误多。因此，建立你们这样的组织，召开你们这样的代表大会，都是有益的，它们提供了在你们最擅长的领域、在技术知识及其应用方面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的机会。

专家的作用目前特别巨大

最后，我想着重谈谈你们的工作在目前的特殊作用。

七年过去了，我们该来解决某些问题了，而学识丰富的专家和工程师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作用是特别大的。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固定资本、经济合理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只有依靠科学技术知识才能合理地解决。我们必须掌握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成就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务。因此，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作用目前特别巨大。如果我们的状况稍微好一些，我们不怕豁出去犯错误。但是，我们只能靠苏联国内的积累来解决关于改造经济和工业、关于恢复固定资本等问题。

因为这些积累很有限，所以一切都须精打细算，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大家知道，即使从我们同英国新政府发生的纠葛来看，最近期间也未必能够指望得到西方的支持。我并不认为这些纠葛会导

致同英国政府的完全破裂，但贷款问题大概要搁置起来了。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能够提供借贷，因为其余的欧洲国家本身都还需要贷款。

由于我们和美国的谈判还没有开始，而同英国又发生了麻烦，所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经济和解决我所列举的任务，都应当靠我们善于在我们苏联国内取得资金。

我们今后还要争取西欧的援助，但有两个条件：维护我们国家的全部主权，在十月革命的根本的主要成果上不作任何让步。

照尤兹的声明看来，美国会同意承认我们，但条件是恢复私有制的“神圣”权利，即复辟资产阶级制度。无须赘言，我们当然不会答应这些条件，而且我认为苏维埃制度将比美国现时的制度存在得长久一些。因此，我们应当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目前面临的经济任务。

最后，我相信，苏维埃政权无论在自己的经济建设方面或者在对外政策方面，都将得到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的支持。

译自《真理报》1924年12月4日。

（彦 山译）

在全苏工程技术人员第三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7年4月6日)

〔苏〕阿·伊·李可夫

同志们，我谨代表政府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这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十月革命这一整个世界史上十分罕见的事件，快要满十周年了。十年来的经验和实践证明，十月革命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国家制度是非常巩固的。

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制度在确保国家进行整体建设方面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你们的大会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召开的：国家经历了一段从几乎全盘瓦解恢复到战前经济水平的漫长道路，并在着手实现一些十分重大的经济任务，这些任务标志着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场全面的革命。大家都知道，政府通过了一些诸如建设第聂伯水电站、谢米列奇耶铁路、大型冶金以及机器制造厂等等的决议。在农业上使用拖拉机，在中央黑土地带和干旱地区进行农业改造的工作已经进行好几年了。国家电气化是政府所实施的计划中的一个最主要部分。整个计划的任务是要改造国家的经济，使它走上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轨道。

这次大会是加入工会的技术人员的一次大会，它是苏维埃制度巩固的明证之一。工会组织完全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工具而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从未有过技术人员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参加体力劳动者的工会组织的事例。相反，在革命前的俄国，通常技术员、农艺师以及工程师是同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这种情况现在除了我国以外，世界各国还是照旧如此。十月革命提出的最重要、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是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中实现劳动和科学相结合，因为只有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工人阶级、共产党和我们的政府所提出的那些伟大的任务。工人阶级的工会现在也团结了技术知识分子，在这次大会上就有从事工业、运输业、农业和林业工作的技术人员的权威性代表，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十月革命的思想已如何深入我国社会生活。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关系最密切，它成了一种团结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组织形式。

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夸大在这种结合方面取得的成就。党和政府都意识到，还没有做到应该和能够做到的一切，以便使工人和技术人员成为一家人。许多复杂情况，比如所谓“敌视非党专家倾向”，直到目前还可以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中看到。经常有人问：这是谁的过失？我看，问题首先在于客观条件。造成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的落后和不文明。如果认为近几年内就能完全消除这种不文明状态，那将是最大的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能讳言，技术知识分子的个别代表人物还没有彻底改变革命前某些技术知识分子对体力劳动者所持的态度。但是，毫无疑问，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关系不正常的事例是越来越少了。这样的事例是个别的。必须共同努力使它们完全消失。我要着重指出，工会就是向这类现象进行斗争的组织，而且应该十分坚定地、有成效地进行这种斗争。

我已经说过，国家面临着异常重要的任务。只有十月革命后在我国建立起来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才能确保这些任务

的完成。

现在，经过将近十年为新社会而斗争的实践以后，未必还需要特意证明，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专政，就既不能保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又不能保证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有计划地执行国家工业化计划。哪怕只是短期地容许提出一项不是工人阶级的，而是任何一个阶级的纲领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人们就会看到，这样一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将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为制止社会阶级分化、为国家工业化进行斗争也将完全成为空想，而这项斗争却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促使我国的生产力迅速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能提高全体居民的物质福利水平。

劳动与科学相结合一旦真正实现，就能沿着上述道路迅速顺利前进。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为了努力发展我国经济，现在十分需要在最短时期内保证在一切经济部门，在工业、交通、农业方面采用一些费用最小、收效最大的经营方法，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在我们的建设中运用世界科学思想的一切成就。

科技人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是无可争议的，在实施政府通过的计划时，科技问题的作用在增长，科技人员的作用也将随之有更大增长。

实施这一计划时的最主要障碍是什么呢？最主要的障碍当然是我国技术和文化的落后。因此，应该特别注意提高国内的工程技术知识水平的任务。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低和技术知识不普及，政府不得不在许多场合下向西欧和美国的学者、技术人员寻求必要的帮助。例如，在第聂伯水电站建设方面，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国技术人员的第聂伯水电站工程设计工作曾经获得国外权威人士的高度好评。在许多工业部门订立技术顾问援助协定，直接吸收外国技术人员参加工作，这一切将来也要实行。但是，与此同时，应该更加努力，保证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苏联的技术员、工程

师、农艺师和学者的技术、技术知识和好的经验。

我们打算进行大量工作来改造我们这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经济。但是，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技术界对那些我们必须提出和解决(不管好坏吧)的技术、经济问题还不是很积极和主动的。我们在经济改造、基本建设、干旱地区的抗旱斗争、中央黑土地地区的重建等方面所做的一切，当然都要有技术人员参加。所有这些意义重大的问题不仅牵涉到千百万居民的利益，决定着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从科技观点看来这些问题也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技术员、工程师、农艺师并没有充分地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讨论如何使我国电气化以及改善我们的能源经济这样一个问题，就能使成千上万的青年技术人员受益。这类讨论不仅吸引青年技术人员参加整体建设，而且也能揭露我们建设工作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存在的许多缺点。

我们不向任何人隐瞒过去一个时期内，比如说，在基本建设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但糟糕的是，正是基本建设，比如造纸工业方面，没有得到技术员、工程师、专家、学者的广泛评论。如果专家、学者、工程师、农艺师能够就政府目前实行的经济改造中各项专门技术问题进行争论，那是一件有利无弊的事情。广开言路、吸引各行各业的专家参加讨论，这和必须吸引最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讨论这类问题一样，是完全必要的。

我听到过一些工程师表示不满，说是要他们在生产会议上向工人说明怎样、在什么地方改进工作，改进些什么，而农艺师则要下乡向农民解释应该怎样战胜干旱，改进土壤肥力等等。我认为，在苏维埃条件下，没有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和直接参与，就不能顺利解决经济问题，这种情况是十分明显的。革命前，建设某一个工厂，甚至一条铁路，可能被看成是个别人或一部分私有者的事情。在我们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广泛的社会任务。

技术员、农艺师和工程师不能使自己和工人群众对立起来。在当前情况下，工程师和技术员必须是和工人们平等的一员。某些人总爱将“同志关系”和“纪律”说成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概念。这是不对的。在我们党内，相互间的同志关系和铁的纪律两者最大限度地结合在一起，只要看到这样的范例，就能相信上述对立情况是站不住脚的。

许多同志向我指出，目前某些科技界人士似乎对两个方面有所不满。第一是物质状况，第二是技术人员权利的保证。我认为，这类埋怨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并不期望能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而只是着重指出以下情况：

首先是，从事生产工作的技术人员的物质状况近两三年来毕竟是大大改善了，无论如何要比从事文教卫生工作的科技人员的物质状况好得多。至于说到各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物质保证，那就应该考虑到，熟练劳动（特别是受过教育的、能在实践中运用最复杂的科技成就的那种高度熟练的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报酬差别在目前情况下是完全难免的。不这样做，在现代条件下就难以进行建设。但是，也必须看到，各部分居民中间的物质状况差别过大，不仅包含着某种政治性危险，而且还关系到国内工程技术人员本身的利益，因为对于我们一切人来说，技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在这时扩大这些居民阶层的物质福利差别，这种结合就很难实现。我绝不是以此来说明，目前我们这里已经不存在物质保障很差的知识分子、技术员和工程师。没有疑问，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

至于有人抱怨经济、生产部门技术人员的权利没有妥善解决，我应该承认这类抱怨是非常正当的。在我看来，只需对这些申诉意见略作修正。不能在谈权利时不谈义务和责任。必须把权利和

义务两者联系起来。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作了这种修正以后，我同意承认，就这一问题进行的指责大部分是完全正当的。党和各高级苏维埃机关早在 1925 年末就对这一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定，但是直到目前这些决定大部分没有实现。这方面的过失必须尽快弥补。

同志们，我在一次会上收到一张字条，说现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对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仿佛比过去差了。我说，这是不对的。（掌声）其所以不对，是因为政府和党在吸收技术人员参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作了许多（绝非无效的）努力。我们国家在各个经济部门都提出了重大的、从科学技术方面看来令人鼓舞的任务，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技科界人士不参加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者的行列（他们的参加是诚心诚意的），是难以想象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就着重指出了我国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差别，即十月革命消除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法律这一切障碍，它们阻挠在经济中有计划地运用科学，并且使私有者为了取得私利将科学变为他们手中的工具。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刻不同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表上述讲话的时期，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多的办法，能以在工厂、铁路和农业上运用科技成果。如果当每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应该燃起创造之火的时期，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中表现不出巨大的劳动能力和毅力，在解决国家面临的整个技术任务和困难问题时表现不出积极性，不向工人阶级苏维埃和党努力靠拢，那就成了一桩很难以置信的事情。（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7 年 4 月 9 日。

（彦 山译）

胜利的组织者

〔苏〕卡尔·拉狄克

编者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提到：托洛茨基派“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向党和党的领导发动了新的进攻”。在这次进攻中，拉狄克在1923年3月14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胜利的组织者》一文后来被认为是为托洛茨基派“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的重要证据之一。这里发表出来仅供研究国际共运史的同志们参考。

红军五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此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了成千上万篇纪念红军建立的文章。但是我以为，所有这些文章都把建立红军这件事过于狭窄地局限在我党发展的范围内。在建军节之际，可以而且应该来弥补这一缺点，谈一谈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这一伟大事业中的作用。

历史为党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尽管在我们的国家机器中还有许多缺点，尽管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党的以往的全部历史在心理上为它从事建立新经济和新国家机器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历史甚至为我们从事外交工作做好了准备。无须赘言，世界政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同孟什维克的无休止的会议上制定出我们的一套外交技术的，

而契切林同志在这场旧式的战争中学会了起草外交照会的工作。不过——啊，真奇怪！——，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学习管理。我们的国家机器还吱吱扭扭地在运转。我们这里情况比较好的是红军的工作。它的创始人，它的意志中心是以列·达·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德国军队的创始人老毛奇常常担心外交家的毛笔会损害士兵们的马刀。全世界的军事家，尽管其中有些是出类拔萃的著作家，往往把剑同笔对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可以把笔锻成剑。托洛茨基是世界社会主义优秀著作家之一，而他的著述才能并没有妨碍他成为第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第一个领袖，第一个组织者。革命把自己的优秀政论家的笔锻成了剑。

为要解决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危险而使党和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任務，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给托洛茨基提供的东西并不多。如果翻阅一下战前的全部社会主义文献，那么除了恩格斯的几篇并不出名的文章和梅林论莱辛这部卓越著作中谈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事的几章以外，在社会主义世界文库中只有四部军事题材的作品：奥古斯特·倍倍尔论民警的小册子、加斯顿·莫赫上尉论民警的书、舒尔采的两卷本战争史、饶勒斯关于在法国宣传民警思想的书。除了舒尔采和饶勒斯的书还具有巨大价值以外，在恩格斯逝世后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出现的一切军事题材的著述只不过是一些浮皮潦草的作品。甚至舒尔采和饶勒斯的著作也不可能回答俄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

舒尔采的书提供了战略形式和军事组织在几个世纪过程中发展的图式。它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战争，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饶勒斯的书颇具胆识，才华洋溢，谙熟军事组织问题，但它的主要缺点是：这位改良主义的杰出代表指望把资本主义的军队变成为民族保卫的工具，使其摆脱维护资产阶级利

益的工具的职能。因此，他不可能理解军国主义发展的倾向，而在战争问题上，在军队问题上将民主思想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我不了解托洛茨基同志在战前对军事理论问题作过多少研究。我想，促使他卓越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动因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在巴尔干战争时期作为记者观察这场世界大战演习时得到的。或许是在法国战争期间，当他为《基辅思想报》撰写杰出的战争述评时，深化了自己对战争机制、军队机制的理解。根据这项工作可以看出，他对军队的灵魂理解得何等出色。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托洛茨基看到的不仅是军队的外部装备——大炮、器械——，他看到的是掌握战争工具的活动，是战场上活动的队列。托洛茨基是广泛地分析了国际衰落的原因的第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在国际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刻，托洛茨基没有丧失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心，相反地，他深深相信，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胜利试图在穿着士兵大衣的无产者身上培育出一些品质——正是这些品质可以很快反过来去反对资产阶级，并且不仅成为革命的基础，而且成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克伦斯基发动七月进攻的时候，托洛茨基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就是他对军队的阶级结构、对军队的灵魂有着深切理解的最杰出的文献之一。托洛茨基在这次演说中预言进攻将会破产，他之所以作这样的预言不是根据关于前线军事装备状况的情报，而是根据对部队的政治状况的分析。他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要求政府重新审查作战的目的。你们这样说就等于对军队说，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要求付出闻所未闻的牺牲而所要达到的旧目的不符合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的利益。但你们没有做到重新审查目的这一点。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来取代沙皇和祖国，而你们却要求军队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去投入艰难的战斗，

流下自己的鲜血。没有目的是无法进行战斗的。而你们的冒险必将以失败告终。”托洛茨基作为红军组织者的全部伟大的奥秘就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上。

所有伟大的军事著作家都特别强调战争道义因素的巨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克劳塞维茨的不朽著作有一半是讲这个问题的。而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取得全部胜利的基础就在于，托洛茨基善于把战争道义因素的意义这门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当旧的沙皇军队已经灭亡时，克伦斯基政府的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曾建议释放所有年纪较大的士兵，精减后方机构，招募年轻新兵入伍。我们刚执掌政权时，战壕里空无一人，我们当中许多人也曾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是这些人太富于幻想了。溃散的沙皇军队是不可能招募新生力量的。这两股浪潮是互相割裂、互相冲击的。旧的军队应当死亡；新的军队只能在笼罩着苏维埃俄国的恐慌的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极欲争取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1918年4月，在波德沃依斯基的办公室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前沙皇军官，他们在我们取得胜利后没有离开部队，为的是跟我们的同志们和一些军事代表们一起共同制定建军的计划，当时托洛茨基（我记得，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一场面）好几天一直默默地倾听着他们的计划。这些人是不理解他们眼前发生的事变的。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按老方式来回答如何建立军队的问题。他们不理解军队所赖以建立的人力资源上发生的变化。托洛茨基听了所有意见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建立志愿军。军事家们都一言不发，他们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想法。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军事著作家之一的鲍利索夫老头子多次地向参加《军事问题》编辑部的我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证明：这种做法将是毫无结果的，军队只能建立在义务制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铁的纪律的基础上。他不理解，志愿部队乃是打进地下的桩子，在它的四周将垒起砖墙；而只有当人民群众正

视死亡的危险时，才有可能在军事的旗帜下召唤工农群众入伍。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志愿军一定能拯救俄国，并把它看作是建立新型军队所必要的机构。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显示了托洛茨基的组织天才和胆略，那么在他大胆地利用军事专家来建军的思想方面，他的组织天才和胆略就显得更加光辉了。每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懂得，要建立新的经济机关，我们毕竟需要旧的资本主义的组织者。1918年4月，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思想。在成熟的党的人士当中，这个思想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但是，依靠旧制度的军官来建立象军队这样的强制工具、保卫共和国的工具，这个思想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许多同志问道：怎么可以武装刚刚被解除武装的白卫军官呢？我记得在《共产主义者》这个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里发生了一场争论，在关于利用旧军官的问题上几乎发生了分裂。为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求得明确的解决，我不得不提出退出编辑部的问题。要知道，这个机关刊物的编辑部包括了许多最有学问的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诸如布哈林、奥新斯基、洛莫夫、沃·雅科夫列夫。而从在粉碎沙皇军队过程中，即在战争期间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军事组织中出身的广大军事实践家阶层当中，不信任的情绪就更加强烈了。只有托洛茨基对我们社会力量的那种强烈信心，即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从军事专家那里掌握科学并且不让他们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革命警惕性一定能够战胜旧军官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只有这种强烈的信心才能克服我们军事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并使他们学会利用军官力量。为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就必须使领导这支军队的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不仅能够取得党的充分信任，而且能够使被迫为我们事业服务的敌人服从他的钢铁般意志。托洛茨基同志凭借自己的毅力不仅善于使以往的军官服从自己，他还取得

更大的成就。他还博得了优秀专家们的信任，并使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为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早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我就目睹了托洛茨基的这种胜绩之一。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跟我们在一起的军事家们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拘谨的。他们被迫扮演专家的角色，以为他们参与的是一出为了掩饰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政府早就达成的交易的喜剧。由于托洛茨基同志为了俄国革命的原则展开了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由于在会议大厅中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位俄国无产阶级的光荣代表在道义上和思想上的胜利，由于这场伟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戏剧的发展进程，军事专家们对我们的不信任情绪日益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已故的上将、旧军队的第一流军官之一阿尔特法帖尔开始不是出于担心，而是出于良心来帮助苏维埃俄国，他走到我房间里来，简短地对我说：“我到这里来是出于不得已。我曾经对你们不信任。现在我要帮助你们并尽我自己的职责，以往我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深信我这是在为祖国服务。”

托洛茨基的最大的胜绩之一就在于，他善于使那些从敌人营垒中不得已而转到我们这里来的人相信苏维埃政府是为俄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显然，在国内战线上的这一伟大胜利，对敌人的这种道义上的胜利，不仅是托洛茨基的博得大家尊敬的钢铁般毅力的结果，不仅是这位受革命意志的安排而去领导军队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和政论家善于为自己赢得深刻的道义力量、伟大的精神声誉和军事权威的结果；为要取得这一胜利还需要我们军队的成千上万同志们的自我牺牲精神，需要我们队伍的铁的纪律，需要我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始终不渝精神；为此还需要群众创造的奇迹，他们昨天从战场上逃跑，今天则在更加艰苦得多的条件下重新回到战场上去保卫祖国。这种群众性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全党都在为创造这些因素而工作，但是它在受党委托领

导军事工作的托洛茨基身上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可以说是最彻底的表现。在这里，俄国革命是通过自己的这位伟大代表的大脑、神经系统、心脏而进行的。当我们开始经受第一次武装考验——同捷克斯洛伐克人作战——时，党及其领袖列·达·托洛茨基表明，拉萨尔早就教导的政治运动的原则完全可以运用到武装斗争，运用到以钢铁为论据的斗争中去。我们在战场上集中了自己的一切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全党都理解这种必要性。但是，这种必要性又在托洛茨基的钢铁般的机体上得到了最高表现。1920年3月，在我们打败邓尼金以后，托洛茨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为了打败白卫分子，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短短一句话说明，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意志空前地集中起来了。需要有一个成为召唤人们去斗争的精神化身的人，需要有一个完全使自己服从于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而成为召唤人们战斗的警钟，成为要求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伟大的流血的必要性的意志体现者。只有象托洛茨基对士兵们那样讲话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的旗手。最好地说明战略家、军事组织者同政治家的这种结合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托洛茨基在整个这项艰苦的工作中表现出足够的敏锐性来理解杰米扬·别德内依或者艺术家莫尔关于战争意义的话。我们的军队是农民的军队，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和工人阶级的代表对这支农民军队的领导是由以托洛茨基及其一起工作的同志们为代表的党来实现的，首先是以下列方式实现的：托洛茨基通过整个党的机构使得这支由于战争而疲惫的农民军队产生深刻的信念，相信它在为自己的利益而作战。

托洛茨基和全党一起为建立红军而工作。没有党，他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没有他，建立红军并取得胜利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如果说我们的党是以善于建立伟大军队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载入史册，那么俄国革命的这一光辉篇章将永远

同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劳动和事业将成为准备为争取全世界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后代所爱戴和学习的对象。

译自《真理报》1923年3月14日。

(谷 松译)

共产国际史文献资料概述(摘录)

[苏]K.C.特罗菲莫夫

历史学家们已经有了一些共产国际史方面的参考资料^①。在书目编纂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1939年在《书籍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1919—1938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史书目索引。1939年,出版了由B.C.伊廷编的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二十周年的文献目录索引;1960年在柏林出版了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图书馆编的《共产国际史文献目录》^②。

然而,研究共产国际史的真正深入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在1962年7月召开的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史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予以极大重视。在委员会通过的建议书上指出,必须全面地科学地研究共产国际史。

旨在启迪和组织亿万劳动群众的共产国际的活动在报刊上始终得到广泛的阐述。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参加执委会的共产党当时发表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执委会全会、主席团、书记处和其他机构的会议的正式文件都是科学地研究共产国际史的资料。共产国际创始人弗·伊·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的筹备、成立和制定基本活动原则方面的著作,作为文献资料给研究工作指出了方向。

要研究共产国际史还可以利用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1934年,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了《布尔什维克为

建立共产国际而斗争(文献资料)》，其中阐述了共产国际的成立筹备经过。不止一次地用俄文和其他文字出版过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的记录和其他文献^③。记录全面地反映了代表大会筹备经过。研究人员可以从中找到一切必要的材料，来了解促使弗·伊·列宁、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社会民主党先进代表们成立共产国际的原因。这些文件使我们有可能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共产国际的意义作出评价。

还出版了共产国际第二、三、五、六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这些速记记录使我们有可能明确每次代表大会不仅在共产国际史上，而且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如果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成立大会，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如弗·伊·列宁强调指出的，则制定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活动的纲领、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

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④反映了弗·伊·列宁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左派学理主义的斗争，它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共产国际本身以及许多国家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这些党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革命高潮中出现的。除速记记录外，还出版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章程、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各代表团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贺词以及其他文献资料^⑤。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大会在弗·伊·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在反对“左”的学理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尖锐斗争中，制定了共产党活动的策略原则，确定了恢复国际无产阶级行动统一的路线。从大会公报^⑥和已经出版的速记记录^⑦中可以探索到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还单独出版了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以及《关于共产党的结构和组织活动的提纲》^⑧。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弗·伊·列宁参加和发表演说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反映在大会的公报^⑩、大会的决议和其他材料的单行本^⑪上。

研究人员在研究共产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方面有完备的材料。1924年在莫斯科和柏林出版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有关材料^⑫，1925年出版了两卷本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⑬。此外，还以单行本出版了某些报告、提纲、决议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的宣言。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是很意思的，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极重要问题，通过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和新的章程，纲领曾以世界各国三十多种文字出版。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还出版了关于共产国际在从五大到六大期间活动的材料^⑭。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是迄今出版的速记记录中最完备的^⑮。第一分册是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分册是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第三分册是关于共产国际的纲领，第四分册是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第五分册是关于联共（布）和苏联的状况以及代表大会的闭幕式。在第六分册中收集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决议、决定和呼吁书。

可以作为速记记录的补充的还有其他某些出版物。例如，1928年出版了关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斗争的文献资料^⑯。1929年出版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文集，其中收集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⑰。奥·威·库西宁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著作曾以单行本出版^⑱，其中发表了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35年7—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和整个世界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全

体进步人类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工人阶级和一切反帝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的斗争中的转折点。

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在苏联和国外的报刊文献上有广泛的阐述。虽然大会的速记记录没有出版，但是所发表的材料足以对大会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深刻的研究。在代表大会前夕出版了关于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附属机构工作的文献资料^⑩。该书收集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从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六年中在各个领域内的大量实际活动的材料。这本文集的材料包括1934年以前的事件。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代表的报告和重要发言以及代表大会的决议，曾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编辑出版部汇集成单行本在莫斯科用德文出版^⑪和在伦敦用英文出版^⑫。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曾于1935年以单行本出版^⑬。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资料曾用俄文出版^⑭。

格·米·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曾在许多国家用多种文字出版。因此它是代表大会所有材料中最普及的。这里只想指出这样一个版本。1935年在希特勒法西斯恐怖条件下，德国共产党人非法地出版了格·米·季米特洛夫的报告。而且在书的头三页和最后两页上收集了报告的秘密部分^⑮。代表大会代表们关于青年反法西斯斗争和反战争讲话的材料也曾汇成文集单独出版^⑯。

除了历次代表大会正式文献以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正式文献和材料作为研究共产国际史的资料具有重大的意义。从1922年共产国际召开两次扩大全会以来，总共十三次全会的材料都已发表。

根据弗·伊·列宁倡议于1922年2—3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讨论了革命运动的极重要问题——关于工人

阶级行动统一以及反对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这次扩大全会的工作在关于统一战线的提纲、克·蔡特金的报告和其他材料中反映了出来^⑤。

紧接着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以后，根据弗·伊·列宁的意见并在关于统一战线的提纲的基础上，打算建立三个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第二半维也纳国际）的统一行动。关于在柏林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会议曾出版了速记记录^⑥。同年，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公布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的报告^⑦。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完备的报告之一。1923年6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扩大全会讨论了两个极重要的问题：关于法西斯的威胁和世界工会运动的统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用单行本发表了全会的记录、克·蔡特金和阿·洛佐夫斯基的报告^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四次全会的材料发表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见注^⑨）。

如果说共产国际前四次全会只发表了单独一些材料和决议，那么后九次全会的文献材料就发表得比较完备，其中有第五、七、十、十二、十三次全会的速记记录^⑩。1933年以前召开的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全会的主要文件发表在由贝拉·库恩编的、由党的出版社于1933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上。

这样，共产国际为反对工人阶级队伍中形形色色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倾向，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争取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即争取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掌握苏联共产党的丰富革命经验所进行的斗争，在已经发表的材料中有了足够充分的反映。这些材料提供了关于共产国际在世界解放运动中的极重要纲领、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观点发展的完整概念。

共产国际及其主要支部和其他机构的出版物也是珍贵的资料。在共产国际活动的整个时期内，一直出版它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1919—1943年）。它开始时是用俄文、法文、英文和德文出版的，在以后的年代里又用西文和中文出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用德文、英文、法文、西文和捷文出版过《国际新闻通讯》周刊^⑩。它不仅刊登文章和报道，而且还刊登共产国际的文献，其中一部分是其他出版物上没有发表过的。例如在巴塞尔用德文出版的《展望》公报等出版物就是这样一些没有发表过的资料^⑪。其中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罕见的文件。执委会、执行局和书记处还用各种文字出版过《公报》，这是研究共产国际活动的极重要资料^⑫。

共产国际主要支部的中央机关报，如《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联共（布）中央出版）、《人道报》（法共出版）、《红旗报》（德共出版）等，也发表过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这些报刊在研究共产国际史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关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回忆录，文学家、代表大会代表和全会代表的回忆录^⑬可以作为共产国际正式出版物的补充资料。这些作品阐述了正式文件和其他资料中所没有充分阐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

长期以来，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束缚了研究人员在科学地研究共产国际史方面的工作。由于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没有一部阐述整个共产国际史和它的个别活动时期，特别是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共产国际解散最后这段时期的比较扎实的多卷本研究著作。撰写共产国际史研究著作是苏联历史学家的极重要任务之一。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撰写作为共产国际支部或同情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历史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将有助于这项任务的完成。

在共产国际的思想领袖和创始人弗·伊·列宁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和演说中,确定了这一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历史作用,也阐明了同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创立和活动原则的制定有关的具体事件。列宁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他在1920年3月6日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在弗·伊·列宁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共产国际领导对共产国际史的阐述一向十分重视。在重大的周年纪念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都发表阐述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组织的历史道路的材料。例如,1924年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B·科拉罗夫《共产国际五周年》和克·蔡特金的《共产国际从言论到行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总结了共产国际五年来的活动。1929年在该杂志的第9—10期上发表了《共产国际的道路》和《共产国际的十年》的文章。这些文章既阐述了共产国际十年来的活动,也阐述了共产国际出版机构十年来的活动。当时也出版了一部资料汇编《共产国际的十年。决议和数字》^④,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作了历史的评述。在共产国际成立十五周年时,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的《共产国际十五年》的提纲以及《新型无产阶级的世界性政党(纪念共产国际十五周年)》的文章^⑤。提纲曾以单行本出版。同时,《真理报》1934年3月1日发表了《共产国际十五年》的文章,而在二十周年时,《真理报》发表了奥·威·库西宁的文章《共产国际二十年》,这篇文章还被译成英文。

在共产国际重大的周年纪念时,各种报刊上还发表其他许多材料,这些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历史道路。在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⑥中也特别着重指出了共产国际活动的历史意义。这个得到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赞同的决定表达了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作用的看法。当然,这个决定没有详尽阐述共产国际活动的各个方面。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详尽地研究这一问题。

在不同的时期,一些作者曾经试图系统地来阐述这个问题。出版了共产国际史方面的一些通俗性学术著作^⑧。其中最完备的是《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这部丛书共分六册,每一册阐述了一次代表大会的历史:И·Г·明古林《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М·雅勃龙斯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Ф.格拉乌巴乌弗《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А·季维尔《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Б.威廉斯《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Г·龚捷尔《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整个说来,这部丛书系统地阐述了包括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内的共产国际前六次代表大会的历史。遗憾的是,通俗性学术丛书使作者们不可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全面地分析与历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进程有关的事件和事实上。

发表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的绥·伊·霍普纳尔和鲍·尼·波诺马廖夫的文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国际的历史性活动。这些文章对每次代表大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近年来,共产国际的历史在一些集体编写的著作如《苏联共产党历史》中有所反映^⑨。

除了阐述十月革命后时期的事件以外,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在阐述十月革命后时期的事件的同时,也简要地叙述了共产国际的历史^⑩。1962年,该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史》估计到历史科学的最新结论,叙述了共产国际的历史^⑪。例如,关于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作了新的阐述;分析了导致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在这些问题上制定错误策略的原因。

当前历史科学的水平使我们有可能在研究共产国际史方面克服关于它的活动的某些陈旧观念。不能不指出,在苏共二十大以

后问世的著作中对共产国际工作中的斗争、成就和缺点作了比较正确的评价。例如，两本通俗性小册子的作者З. А. 扎梅斯洛娃在克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和阐述共产国际当时不完全正确地作出决定的一系列问题上（如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比法西斯更危险的敌人，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一定阶段上的进步作用等）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1959年，在共产国际四十周年时，发表了有关共产国际史的一系列文章^④。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陶里亚蒂的文章。作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提出任务，要正确地阐述共产国际的历史，科学地分析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决议，历史地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和得出正确的科学结论，这些结论将有助于当代革命工人运动去解决生活向它提出的那些问题。在И. Г. 卡宾的文章中对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作了相当全面的评价。作者不仅仅限于阐述共产国际的历史，而且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现时条件下如何利用共产国际的经验并从它的历史中为自己得出一定的结论。

整个共产国际史方面的文献简单说来就是这样。如果注意一下共产国际史个别时期的文献，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分布的不平衡。在历史文献中，关于列宁参加创建和领导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问题阐述得比较详尽充分。首先应当提到1962年再版的列宁的学术性传记^⑤，其中鲜明、通俗和真实地阐述了列宁在创建和巩固共产国际方面的活动，揭示了列宁的理论著作对全世界亿万共产主义者天军进行革命教育的巨大意义。此外，在不同的时期，还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和文章，揭示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的斗争中的作用。

关于创立共产国际的问题或许在历史文献中阐述得最广泛^⑥。这个题目在现代史的所有主要的综合性著作中都提到了。例

如，在《世界通史》第七、八卷中阐述了共产国际史的几个主要阶段，分析了它的主要问题，确定了它同世界史的有机联系，揭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在《世界通史》第八卷问世前几年出版的《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1917—1923年）》一书也可以这样说。

在专题学术著作中，应当指出1940年出版的П.С. 尤什福维奇的《共产国际的创立》一书。这或许是一本比其他许多阐述共产国际的创立这个题目的著作都更加详尽的书。但是这本书也存在着个人迷信时期的文献所共有的缺点。

研究得最少的是共产国际1924—1943年的活动。然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和多事的时期。在这些年代里，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为反对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为数众多的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

在不同的时期，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阐述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文章，也出版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小册子和个别著作。虽然这些文章和小册子具有宣传性质，甚至指令性质，但是决不能低估它们，因为其中提供了当代人对事件的说明，这对正确理解共产国际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在纪念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二十五周年时，苏联和国外都发表了一些阐述这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和意义的文章^④。这些文章试图根据现时的观点对代表大会作出评价，试图从历史经验中为劳动者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出结论。正是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确定了新的方向，标志着在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反帝和反战力量，进行更加卓有成效的争取和平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的转折点。在代表大会上制定的结成反法西斯、反帝和反战统一战线的路线至今仍然是正确的。

当时在文章和一些著作中还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如：共产国

际的纲领,争取工人和人民统一战线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土地问题,农民运动和共产党人,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组织上巩固各国共产党。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对于当前的解放运动来说仍然具有意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关系问题。虽然有些作者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⑥,但是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阐述。苏共历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和党的文件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极重要资料。

在研究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应当指出,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文献和文献材料中,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明显地增强了。这不仅表现在对斯大林个人的颂扬上,而且也反映在共产国际本身的活动上,共产国际有时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通过了一些错误决定,例如,1929—1934年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等等。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消除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例如,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和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就有助于这一点,该声明指出193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的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⑦。声明摒弃了对波兰共产党及其组成部分——西乌克兰共产党和西白俄罗斯共产党的没有根据的和错误的谴责,完全恢复了这些政党以及在个人迷信时期被镇压的这些党的活动家的名誉^⑧。

反共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带倾向性地来阐述共产国际的历史。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作者这样或那样地都谈到了共产国际的历史。这些作者的共同点是在科学的客观态度的幌子下歪曲地阐述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在

激烈反对共产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1957—1959年）里也进行了这类歪曲共产国际史的尝试。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彻底揭露反共主义者及其修正主义走卒在歪曲共产国际史方面的不体面手法，充分表明共产国际的伟大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谷 松译）

注释：

- ① 《共产国际大军》，1921年彼得格勒俄文版，共112页；《共产国际年鉴（1923年）》，1923年彼得格勒—莫斯科俄文版；《世界各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手册），1926年莫斯科俄文版；《全世界的共产党》，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年鉴（1928年）》，1928年莫斯科俄文版；《共产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工人运动》，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产国际的党》，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年鉴（1930年）》，1930年莫斯科俄文版；《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发展情况》，《真理报》1930年10月25日。
- ② 《共产国际史文献目录（1919—1943年）》，1960年柏林德文版，共200页。
- ③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莫斯科俄文版，共275页。
- 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共754页。
- ⑤ 《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1934年莫斯科俄文增订二版，共68页；《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1920年彼得格勒俄文版，共56页；《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集》，1921年彼得格勒俄文版，共310页；《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词》，1920年莫斯科俄文版，共107页。
- 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公报。第2号（1921年6月27日）——第24号（1921年7月21日）》，1921年莫斯科俄文版（共23本）。
- ⑦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莫斯科俄文版，共500页。
- ⑧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和决议）》，1921年莫斯科俄文版，共95页，同上，1921年汉堡德文版，共191页，奥·库西宁和凯宁《关于共产党的结构和组织活动的提纲》，1921年莫斯科俄文版。
- ⑨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32号》，1922年莫斯科俄文版（共两卷）。
- ⑩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3日）〈报告演说决议选〉》，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俄文版，共427页；《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选）》，1922年英文版，共296页；《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23年彼得格勒俄文版，共188页。

- ⑪ 《两年的斗争和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支部从四大到五大期间的活动概述》，1924年莫斯科俄文版，共135页；《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献）》，1924年柏林德文版，共69页。
- ⑫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Ⅰ、Ⅱ册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Ⅰ册共312页，第Ⅱ册共1007页。
- ⑬ 《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支部从五大到六大期间的活动概述》，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442页。
- ⑭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六个分册），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
- ⑮ 《关于共产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斗争的文献资料》，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108页。
- ⑯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纲和决议》第三分册，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112页。
- ⑰ 奥·威·库西宁《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188页。
- ⑱ 《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共产国际》，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606页；《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共产国际》，1935年莫斯科德文版，共718页。
- ⑲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莫斯科德文版，共600页。
- ⑳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9年伦敦英文版，共604页。
- ㉑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58页。
- ㉒ 威·皮克《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的报告（1935年7月26日）》，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93页；格·米·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5年8月2日）》，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80页；艾尔柯里（陶里亚蒂）《关于共产国际因帝国主义者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而面临的任务（报告和结束语）》，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71页；德·扎·曼努伊尔斯基《恩格斯为争取革命马克思主义而斗争》，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44页；德·扎·曼努伊尔斯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64页；王明《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的策略（在1935年8月7日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56页；叶·萨·瓦尔加《生产力对资本主义的反抗》，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32页；《奥地利共产党在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奥地利共产党代表科普勒尼希、维登、多普列尔、赫尔曼同志的讲话》，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64页；《西班牙共产党在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多洛雷斯、加西亚、胡安·文图尔、马丁内斯、艾瓦里斯托同志的讲话》，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87页；《波兰共产党在为争取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而斗争。波兰共产党代表连斯基、勃隆科夫斯基、勒瓦尔、贝列夫斯基、亨利科夫斯基的讲话》，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94页；《波罗的海沿岸共产党在为争取反法西斯和反战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波罗的海沿岸共产党代表

- 托米宁、梅伊宁、列赫托萨利同志的讲话》，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79页；克·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为争取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24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为争取反战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哥特瓦尔德、什维尔姆、凯列尔、萨波托斯基、柯别茨基、西罗夫、西罗基同志的讲话》，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94页；阿·洛佐夫斯基《争取世界工会运动的统一》，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53页；奥·威·库西宁《青年运动与反法西斯和反战争危险的斗争（在1935年8月17日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31页；B·T·切莫丹诺夫《青年反法西斯和反战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8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14页；格·米·季米特洛夫《资本主义国家现时的统治者是暂时的人物，世界的真正主人是无产阶级（在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结束语）》，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20页。
- ②⑤ 格·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5年8月2日）》，1935年慕尼黑德文版，共125页。
- ②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论青年》，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共131页。
- ②⑦ 《苏共决议汇编》，1954年莫斯科俄文第7版第1册，第574—588页；克·蔡特金《各国共产党反对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报告）（1922年3月2日）》，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共58页；《共产国际反对资本进攻的策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报告）》，1922年汉堡德文版，共17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代表们给弗·伊·列宁的信（1922年3月6日）》，《共产党人》杂志1960年第3期。
- ②⑧ 《社会党国际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柏林）》，1922年莫斯科俄文版，共67页。
- ②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执委会主席团的活动》，1922年彼得格勒俄文版，共464页。
- ②⑩ 《扩大全会会议记录（1923年6月）》，德文版，共336页；克·蔡特金《法西斯的进攻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共48页；阿·洛佐夫斯基《世界工会运动问题（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20日）结束语。全会的决议）》，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共54页。
- ②⑪ 《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1925年3月21日—4月6日）（速记记录）》，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60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5年4月—1926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编，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39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1926年2—3月）（提纲和决议）》，1926年汉堡德文版，共203页；《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速记记录）》，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两卷；《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

日)《提纲和决议》,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84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7年莫斯科俄文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文件》,1927年莫斯科俄文版;《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30日)《提纲、决议和呼吁书》》,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108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1928年2月9—25日)》,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79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速记记录》》,1929年莫斯科俄文版,共3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提纲和决议》》,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80页;《共产国际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1930年2月18—28日)》,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72页;阿·洛佐夫斯基《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党的任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1930年2月24日)上的报告)》,1930年莫斯科俄文版,共32页;德·扎·曼努伊尔斯基《经济危机和革命高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1930年2月18—20日)上的报告和结束语)》,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61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扩大全会《提纲和决议》》,193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32页;马·加香《战争危险的加剧和共产党人的任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1931年4月8日)上的报告)》,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47页;皮亚特尼茨基《当前的迫切问题。失业者运动。工厂组织。成员的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1931年莫斯科英文版,共39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1933年莫斯科俄文版,共3卷;《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决议》,1932年莫斯科俄文版,共31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决议(1932年9月)》,193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40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共599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提纲和决议》》,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共32页;《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1933年12月)》,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282页。

③⑨ 《Internationale Preses—Korrespondenz》柏林德文版;《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伦敦英文版;《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巴黎法文版;《La Correspondencia internacional》,巴黎西文版;《Svetorozhled》,布拉格捷克文版。

④① 《政治经济工人运动展望》,巴塞尔德文版;《国际文献》俄文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俄文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德文版;《工人文献》德文版;《欧洲之声》德文版。

④② 《共产国际公报。供俄国报刊、俄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部用》,1920—1921年莫斯科俄文版;《共产国际执委会公报》,1921—1922年彼得格勒俄文版;《[共产国际]远东局公报》,1921年伊尔库茨克俄文版;《共产国际公报》(1920年)英文版;《俄国通讯》,1920年柏林德文版;《通讯》,1928年维也纳德文版;《共产国际南美局公报》,1929—193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西文版;《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加勒比局机关报),1931—1933年西

- 文版;《布尔什维克》(中美局机关报),1933年西文版;《现代》,193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西文版;《巴尔干通讯》,1936年德文版。
- ② 《列宁和国际工人运动》(回忆列宁),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回忆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共734页;《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回忆列宁》,《历史档案》杂志1957年第2期及其他各期。
 - ③ 《共产国际的十年(决议和数字)》,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416页。见《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的书评,1930年第2—3(97—98)期第205—220页。
 - ④ 《共产国际》杂志1934年第7—8期。
 - 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1943年第5—6期。
 - ⑥ A.Ю.季维尔《共产国际简史》,1928年哈尔科夫俄文版;X·卡巴克契也夫《共产国际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239页;《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史》,阿·洛佐夫斯基编,1929—1930年哈尔科夫俄文版,共六册;绥·伊·霍普纳尔《共产国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33卷;鲍·尼·波诺马廖夫《共产国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2卷;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年纽约国际出版社英文版;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对该书的评介见《苏共历史问题》1960年第6期);З·А·扎梅斯洛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З·А·扎梅斯洛娃《共产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
 - ⑦ 《苏联共产党历史》,波诺马廖夫主编,1962年莫斯科俄文增订二版,共787页。
 - ⑧ 《近代史》(教材)第1卷(1917—1939),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共567页。
 - ⑨ 《国际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史》(教材),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共637页。
 - ⑩ И.Г.卡宾《共产国际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作用(纪念共产国际成立四十周年)》,《苏共历史问题》1959年第2期;W·克劳兹《共产国际成立四十周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选》,1959年第2期(柏林);B·彼西《共产国际的国际意义》,《党的生活》1959年第4期;帕·陶里亚蒂《共产国际史中的若干问题》,《再生》杂志1959年第7—8期(罗马);让·杜克洛《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纪念共产国际四十周年)》,《国际生活》杂志1959年第3期,等等。
 - ⑪ 《列宁传》,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
 - ⑫ 《世界通史》第7卷,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共820页;《战后时期国际舞台上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2—3(85—86)期;А·别列兹金《在共产国际的发源地》,《共产党人》杂志1959年第2期;绥·霍普纳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国际舞台上的布尔什维克》,《青年布尔什维克》1939年第12期;H·萨莫鲁科夫《世界大战前国际舞台上的布尔什维克》,《历

- 史杂志》1939年第1期;《世界通史》第8卷,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共643页;《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1917—1923)》,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共695页;晏·霍普纳尔《共产国际的创立》,《历史杂志》1939年第2期;X·卡巴克契也夫《通向共产国际的道路》,《共产国际》杂志1929年第9—10期;П.雷曼《共产国际成立简史》,《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9年第2期;Л.И.托尔斯托娃《第三共产国际成立简史》,《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59年第259号第31册;Я.И.齐托维奇《共产国际的创立》,《近代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2期;И.С.尤什福维奇《共产国际的创立》194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共276页。
- ④ 《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历史里程碑(纪念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二十五周年)》,柏林《统一》杂志1960年第8期;Е·卡尔塔《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争取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斗争的意义》,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知识》杂志(历史语言版)1959—1960年第9卷第5期;А.П.科尔松斯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论工人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苏共历史问题》1960年第1期;Д·米捷夫《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索非亚《新时代》杂志1960年第9期;Н·Т·涅杰夫《反法西斯和反战争的历史经验(纪念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二十五周年)》,索非亚《消息报》(保共中央季米特洛夫高级党校)(历史版)1960年第7期;М·多列士《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0年第7期;V·弗拉塔斯《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国际工人运动》杂志1960年第16(100)期。
- ⑤ А.А.阿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为创立第三国际而进行的斗争》,《莫斯科国立历史档案研究所文集》1959年第13卷;И.Ф.阿诺什金《布尔什维克为团结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左派和建立共产国际的斗争(1914—1917年)》,《学术札记》(国立巴拉绍夫师范学院)1958年第6卷;《联共——纪念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参考资料)》,1929年列宁格勒俄文版;《共产国际论联共(布)》(共产党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宣言),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31页;《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论中国革命》,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共88页;贝拉·库恩《联共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杂志1929年第9—10期;德·扎·曼努伊尔斯基《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俄文版;德·扎·曼努伊尔斯基《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А·马尔丁诺夫《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杂志第24期;苏哈巴克《共产国际的战斗道路》,1959年布拉格捷文版。
- ⑥ 《真理报》1956年2月21日。
- ⑦ 《正确阐述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人》杂志1963年第10期第37—47页。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9期。

共产国际文献札记(摘录)

〔日〕村田阳一

……在共产国际基本资料的复印版和缩微胶卷已陆续发表的今天，够得上珍贵文献的东西早已不存在了。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有关共产国际文献所必需的知识在研究人员中间已很普及。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代表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这个国际组织的文献资料是非常庞杂的。每个研究人员涉猎这些文献、积累概念性的知识，至少也是很费时间的，作为指导性的有分析的索引也几乎没有。而且，假若没有关于文献的全部情况，以及每种文献相对的资料价值的一定的基础知识，研究人员进行徒劳的摸索，就一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漏洞。

因此，我想把自己积累的关于共产国际文献方面的杂乱知识整理出来，也许会有某些意义。

预先声明：这里所讲的共产国际文献是狭义的，就是说，我想说的原则上不包括共产国际支部——各国共产党的刊物，不包括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以及其他外围群众团体的文献，而仅限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负责发表的基本文献。

二 文 献 目 录

文献目录部分值得重视的东西不多。资本主义各国出版的最

早的文献目录可以举出以下三个。

- (1) 朱里安诺·普罗卡西：《共产国际一大至七大文献目录》，意大利文版，载于《年刊》第一辑，1958年，米兰，283—313页。

这在后来是作为独立的小册子出版的。在米兰弗尔特利尼里研究所收藏的共产国际大会、执行委员会全会及其他重要会议的资料，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等目录，包括 204 件。弗尔特利尼里研究所的藏书是 1968 年弗尔特利尼里书店刊行的庞大的共产国际复印资料的基础。在 1958 年时，它的规模还没有那样大，可是，在这一目录里也包含着相当多的没有复印的文献，因此这是值得查考的资料。

- (2) 维托尔德·斯沃拉科夫斯基：《共产国际及其外围组织》，英文版，斯坦福，1965 年。

美国的四十四图书馆和欧洲的四个图书馆所藏的关于共产国际和其他外围团体的资料分类目录，包括 2278 件书目。虽然作为广泛的资料目录是便利的，但是，必须注意，这个资料的解说和选择都反映了胡佛研究所的反共立场。

这本书的第一节有文献目录的项目，列举了 20 件书目，主要是涉及短时期的资料或出版社的出版目录，除前面的普罗卡西著作外，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

- (3) 恩利卡·科罗蒂·皮舍尔和西阿拉·罗伯塔奇：《共产国际和殖民地问题》(1919—1935)，法文版，巴黎和海牙，1968 年。

从共产国际大会和扩大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记录、大会公报、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远东各民族大会(1920)和第一次远东工人大会的资料中选出的关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论文，共列举 3691 件，并有简单的说明。共产国际的刊

物、特别是定期刊物的分析性综合目录(考虑到各种语言版本)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书虽然可以看作这一方面的入门书,但有两个缺点,即俄语的资料没有收入和编者查阅的期刊不是完整的一套。

在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俄语的专门性文献似乎还没有出版。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文献目录作用的东西有以下几种:

(4) A·季维尔和M·西摩:《共产国际十年。决议和数字》,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

(5) C·И·霍普纳尔:《共产国际》,文末的文献目录,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3卷,俄文版,莫斯科,1938年,第819—824页。

前者仅举出了329件(其中164件是列宁的著作),后者仅举出369件(其中236件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但以俄语文献为主,因此是有利用价值的。

此外还有包含文献目录知识的以下论文:

(6) K·C·特罗菲莫夫:《共产国际史文献资料概述》,见《苏联历史问题》,1963年,第9期,第90—99页。

这篇论文提供了苏联的共产国际研究的概况,在脚注中指出了117件主要是俄文的原始资料、62件研究论文、回忆录等。

其他的社会主义各国刊行的文献目录,虽然只知道下面两种,但是还未得到披阅机会。

(7) 君特·赫尔亨:《共产国际文献目录》(1919—1934),德文版,柏林,1960年。

(8) L·加拉多法、J·杰泽克:《共产党和进步报刊论文篇目》(1933—1938年),四卷本,布拉格,1969年。

前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的,据说有200页之多。后者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

期刊的总目录以及总索引，连仅就单独一种语言版本编辑的都还没有出现。上面提到的斯沃拉科夫斯基 1965 年曾说胡佛研究所正在准备编辑《共产国际》英文版索引，不久就要发行，但到了 1968 年，他声称因这个计划得不到财政上的支持，另外还因为没有整套的杂志，所以这一工作没有进展。

三 定期刊物

前面已提到共产国际的主要机关报有《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各种版本一起出，但其发行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各种版本具有独自的历史。了解其变迁，特别是弄清楚每个版本在某个时期有哪些空白，对利用这些刊物来说是必要的。

首先从《共产国际》看吧，它是俄文、德文、法文、英文四个文种的主要版本。

I. 《共产国际》各版

《共产国际》俄文版，（以下简称《КИ》）彼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1919.5—1943.6。

《共产国际》德文版，（以下简称《KI》）彼得格勒—汉堡/柏林—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巴黎—斯德哥尔摩，1919.5—1941.5。

《共产国际》法文版，（简称《IC》）彼得格勒—巴黎，1919.5—1939.8。

《共产国际》英文版，（简称《CI》）彼得格勒—伦敦—纽约/伦敦，1919.5—1940.12。

《共产国际》各版是在共产国际创立后不久，于 1919 年 5 月在彼得格勒同时创刊的，终刊的时间各不同，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杂关系。一直出版到最后的俄文版，是同共产国际本身的解

散和命运联系在一起。

除了这四个版本以外，西文版和中文版于1932年11月左右也出版了。1938年间又出版了拉丁美洲版。中国版好象是在1939年10月停刊的，这样很快地停刊，大概反映了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微妙关系吧。西文版与德文版大约是同时停刊的，斯沃拉科夫斯基说也有意大利文版，但其他文献中没有谈到过这个版本，普罗卡西的文献目录也没有登载，因此他的说法值得怀疑。总之，关于这些暂时性的版本是缺乏资料的。

《共产国际》是作为月刊开始发行的，负有共产国际的实际战斗性理论机关报与共产国际文件的发表机关的双重使命。而且，除开始的指导性的许多篇论文以外，还登载着共产国际大会的资料，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其决定和呼吁书，各支部的文件。1919年度的八期是作为月刊出的，间隔的时间逐渐越来越大。在1920年、1921年两年间总共出版了十一期。相反地，由于增收全部资料，各期的页数逐渐多起来，例如俄文版的第16期，改成532页的大本子（就德文版来说是763页）。为了减轻这个过重的负担，确保杂志的定期发行，1921年9月《国际新闻通讯》杂志创刊了，共产国际和它的各支部的记录文件与运动情报多半被移到这上边，《共产国际》就可以成为集中的理论、策略、组织各种重要问题的理论刊物。尽管如此，其后也没能确保定期发行。拿成绩最好的俄文版来说吧，在1922—1924年的三年间也仅仅出版了十八期（由于有合刊号，如果从册数看是十四册）。据《共产国际》编辑部本身认为，这一情况意味着这个理论刊物由于《国际新闻通讯》的出版而暂时退居次要地位了。

俄文版以外的各版，发行很不规则。德文版从1919年的第7—8期（11—12月）起在汉堡发行；法文版是从1922年的第21期（7月）起在巴黎发行；英文版是从1922年的第1期起在伦敦发

行。大约到1922年前半年的各期，除英文版以外，各版是用大体相同的内容编辑的，可是，西欧各版同相应的俄文版比较大部分发行较迟。所以封面上印的发行日期和实际的日子是不一致的，例如法文版1924年第4/5期（5、6、7月合刊号）实际上是1925年2月发行的。一般说来，西欧语文各版表示的发行日期很多是中央编辑部编辑完的日期，和实际的发行年月是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必须注意。

就英文版来说，初期是否每期确实已经发行，是有可疑之点的。这就是说，1919—1920年的第7—10期，1920年的第14—15期，1922年的第20期，不仅在美国近年出的重印版中没有，根据我个人的调查，就连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柏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博物馆，也都没有收藏。1922年，英文版不象其他版本那样出第21、22、23期，而是将这三期的主要内容摘录发行了大会特刊（第四次大会特刊号）。1923年以后，英文和法文是用比其他各版精简了的内容发表的。

由于1924年是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开始明显化的一年，还由于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开始表面化。在各国党内，宗派主义集团的形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潮流的形成，共产国际各党的思想、组织建设成了当务之急，在各党为布尔什维克化而进行的斗争中，理论杂志《共产国际》必然要担负重大的任务。

为了加强《共产国际》，从1925年1月起对各种文字的版本都采取了措施，确保其作为月刊发行（法文版从7月开始）。德文版取消了未发刊的1924年后半年的各期，法文版取消了1924年8月到1925年6月的各期，为向月刊过渡准备条件。

在这样地向定期刊物过渡的同时，加强了各版编辑部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在中央编辑部指定各种文版必须登载一定的论文的

同时,其他部分论文,各种文版可以根据各版当地的情况省略掉部分论文,这样各版的内容就开始产生相当的不一致。在1925年,俄文版发行一万份,德文版发行两万份,法文版发行一千份,英文版发行两千份。

1926年9月下旬后,俄文版和德文版进一步成为周刊,法文版和英文版变成了半月刊。但是,从1930年开始,俄文版改为每月三期,德文版从1931年10月10日开始改为每月两期了。作为一个国际性杂志,它的投稿者大多数分散在各国,积极参加自己国家的阶级斗争,因此,如果过分频繁刊行的话,发行就不可避免要成为不规则的了,法文版看起来就与这不同,从1930年改为每月三期,同年9月又恢复了每月两期。

1932年7月,由于普鲁士的巴本政变,德文版从7月下旬开始被迫连续停刊三个月。1933年1月末,由于希特勒掌握了政权,德文版出版了地下版一期(4月,第3期)之后,就转移到了巴塞尔。

在这种激化了的形势下,各种文版共同在其后数年中坚持每月两期,可是,1935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强各国共产党的独创性和机动性,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的政治和策略的方针方面。这一情况也不能不在《共产国际》编辑方针中反映出来。从1936年起,俄文版是20日刊,其他各版都变成了月刊,1937年,各版同时成为月刊。如果从内容看,处理各党内部问题的论文减少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情报,时事性的论文占了很大篇幅,可是,这不意味着理论问题被轻视。为了和平的斗争,对待关于反法西斯主义、反战的工人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发展的策略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指导性论文,与关于在西班牙和中国的革命战争问题的论文,在每期中都占很大的比重。在西班牙革命中产生的新型的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也在这个杂志中开始提到了。

1939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时,法文版和英文版停刊。美国版到1939年底还继续发行,而且,在1940年一年间,美国版在当时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编辑下,继续发行。就德文版来说,在中立国瑞士也没有这个杂志的安身之地,1935年9月转到了斯特拉斯堡,1938年7月转到了巴黎。随着战争开始后又转移到了斯德哥尔摩,继续发行到1941年5月,在德苏开战的同时停刊了。

关于德文版,还必须作一点说明,那就是从1919年的创刊号起出版了三个平行的版本,有彼得格勒版、维也纳版(到第6期)、柏林版(到第4/5期)。象这样平行版的产生,是由于在帝国主义的严厉封锁下的苏俄同十一月革命失败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发生困难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彼得格勒版同俄文版完全对应,维也纳版和柏林版的内容有删节。到第5期为止,从登载的论文、资料数目看,彼得格勒版是188篇,维也纳版是55篇,柏林版是74篇,这样可以大致看出三者之间的关系。柏林版是由西欧书记处发行的,在这个版中应当注意的是,在它的第4/5期中,登载着《共产国际》的其他各版没有登载过的若干独特资料。这就是荷兰党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三个提纲草案,还有由西欧书记处为大会制定的策略提纲草案等等。这些文件反映了在列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批判的极左立场。

从上可知,从所谓发行期的长度、连续性、发行次数、收录论文、资料的数量等方面来看,《共产国际》各版中最完整的是俄文版,这个版本在二十五年间出版了542期,总数共达37000页。仅次于它的是比较充实的德文版,在包括此版本在内的西欧诸版中,都多少有些空白期。作为判断各版相对性资料价值材料之一,下面列了一个它们收录的论文、资料数量的比较表。由于书评等在

目录中是用各种形式表现的，因此，这个比较无非是个大概的数字。直到 1921 年为止（仅就实际发行的各期而言）内容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从 1922 年开始比较。顺便说一下，1919—1921 年期间俄文版收录的论文资料数是 806 篇，1934 年以后，英文版的数字同美国版的相同。

	俄文版	德文版	法文版	英文版
1922—1924年	277	237	175	142
1925—1926年 9 月上旬	258	227	123	115
1926年 9 月下旬—1931年	1685	1572	872	613
1932—1934年	870	374	427	384
1935—1939年	1294	1039	893	762
1940—1943年	485	127	—	83
计	4869	3576	2490	2099

关于出版期非常短的《共产国际》日文版略说几句。这个版本是用《共产国际日本版》的名称，1931 年 7 月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为非法杂志创刊的。第 1 期和第 2 期（9 月号）是油印的，从第 3 期（11 月号）开始改为铅印，第 5 / 6 合刊号（1932 年 1、2 月号）后不得已停刊了。

最后，说到关于近年来刊行的复印版和缩微版。俄文版是由纽约公共图书馆以缩微胶卷出售的。胶片状况良好，共计缺少 1931 年的第 27 期、1941 年的第 10/11 期、1942 年的第 6、12 期这四期。德文版和法文版，是 1968 年由意大利的弗尔特利尼里出版社复印出版的。法文版除了一部分印刷错误外，大致上没有别的问题。德文版最初的五期是用柏林版复印的，这是缺点，但另外又复印了维也纳版，因此使用是很方便的。除此之外，1933 年 4 月的地下版的缺少即使是不得已的，但 1940 年的第 6 期、第 9 期的缺少就不知是什么原因了。目前，西德的波列特拉登出版社开始

出版新的德文复印版,最初的五期也是根据柏林版。

英文版是在上面提到的斯沃拉科夫斯基指导下,由美国的格林伍德复印有限公司复印的,但是,这个复印版非常不完整。前面讲过的7—10,14—15,20期的缺少是不得已的,但1919年的第4期落掉一半,1920年的第18、19期,1922年的大会特刊,1939年的特刊(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大会特刊号),1938年度的索引都缺少,此事如说他们不认真,那他们也是无话可说的。关于《共产国际》美国版和英国版的关系问题,也没做任何说明,这样做是不太负责任的。出版者辩解说曾和包括苏联的列宁国立图书馆在内的美国、欧洲的数十个图书馆取得联系进行搜集,但缺期未能补上。可是,只要和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博物馆取得联系,一半缺期都可以补上了。

下面,我们谈一谈《国际新闻通讯》及其后继刊物。(德文版是《国际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评论》和《世界》,英文版是《世界新闻和评论》)主要有德文、法文、英文三个主要的版本。

I. 《国际新闻通讯》各版

《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柏林—维也纳—柏林,1921.9.24—1933.3.3。

《国际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评论》(简称《评论》),巴塞尔,1932.7.1—1939.10.18。

《世界》,斯德哥尔摩,1939.9.1—[1943.5.28]。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柏林—维也纳—巴黎,1921.10.13—1939.8.26。

《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柏林—维也纳—伦敦,1921.10.17—1938.6.25。

《世界新闻和评论》(前名《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伦敦,1938.7.2—1953.12.19。

和《共产国际》相并列，或者说比它更重要的刊物是《国际新闻通讯》，这个刊物的创刊是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局的会议上决定的。当这个国际通讯报创刊时，分配给它的任务是“登载关于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各种问题以及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通讯，同社会民主主义者与阿姆斯特丹派进行斗争，在（第三次）大会方针的范围内讨论策略问题。另外，还对其他问题进行讨论”。各党负有为这个通讯报任命通讯员的义务。这个通讯报的德文版是每周发行两三期，法文和英文版是每周发行两期。各版同时于1921年9月和10月在柏林创刊。到1923年11月为止都在这个地方发行。

这个通讯报，除了刊登系统性的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工人运动的情报外，还大量刊载共产国际、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等大会和重要会议的报告、讨论、决议等资料，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决定和呼吁书，各国共产党的正式资料，还有各党领导者的投稿。共产国际的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记录和决议并不是经常作为四个主要文种的独立出版物出版的，因此《国际新闻通讯》成为主要依据的时候也不少。譬如拿德文版来说，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各项决议，第八次全会的记录和决议，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纲领问题的讨论，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全会的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的大部分，《国际新闻通讯》都是唯一的依据。有名的瓦尔加的四季行情报告也在《国际新闻通讯》连载了。《国际新闻通讯》在动员世界劳动人民对萨柯和万泽提及其他白色恐怖牺牲者的拯救活动上，反对侵略中国、埃塞俄比亚的问题上，对中国革命和西班牙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国际支持、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都起过重大的作用。

《国际新闻通讯》在起初刊行非常频繁，例如在1922年，德文版出了245期，法文版出了138期，英文版出了118期。1923年，

在通常版之外，周刊版也平行地出版了。周刊版的法文版和英文版在当年就停刊（因为那个普通版本本身成了周刊），德文版继续出到1926年3月。从1925年起德文版和法文版每周出两期，英文版成为周刊。除普通号之外，对于重要问题出了许多期特刊号。

1923年10—11月德国革命失败的时候，《国际新闻通讯》于11月23日被禁止，编辑部保存的过期杂志被没收。停刊了三周之后，《国际新闻通讯》在维也纳重新出版。德文版和法文版1926年4月分别转移到柏林和巴黎出版，英文版直到1929年底都在维也纳发行，随后迁到柏林，到1933年3月初一直在这个地方出版，后来在伦敦继续发行。

由于纳粹党掌握了政权，《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于1933年3月3日再次停刊，从1932年7月在巴塞尔与作为月刊发行的《评论》合并。《评论》是以“忠实地反映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事件，特别注意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殖民地和民族的解放斗争”，把“为政治家、新闻记者，尤其是进步的工人服务”作为宗旨而发行的情报刊物。被认为是准备在万一的情况下充当《国际新闻通讯》的后继者的。从1933年3月11日起，《评论》作为周刊出版了，1936年以后，法文版也成为周刊。

1935年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的公开文件几乎都不在《国际新闻通讯》上登载了。这时这个刊物加强了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的情报报纸的性质，主要成了动员各国人民在广泛的和平战线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强有力的手段。《国际新闻通讯》的英文版，从1938年7月2日的一期起改称为《世界新闻和评论》，这同该报的职能的变化是相联系的。在改称时，该报编辑部讲了下面的话：“本报在十七年前是为新闻记者、政治家、工人运动负责人等提供关于外交、经济、工人运动的资料而发行的情报机关报。……近年，外交问题和外国的各种事件

由于它们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由于它们彼此的密切关系,对于所有的人来,已成了重大的值得关心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本报为了更符合这个机关报今天的性质和任务,决定更改报名。”

1929年1月,作为英文版《世界新闻和评论》月刊附录的《世界青年评论》开始发行了。这个附录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刊的。

世界大战的开始,给《国际新闻通讯》各种文版带来不同的命运。英文版《世界新闻和评论》取消了原《国际新闻通讯》的副标题而继续刊行,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也存在,直到战后。这个时期,该报变成了由自己负责的自主性的情报报纸。法文版在1939年8月26日停刊了。德文版《评论》1938年10月18日的第52号成为终刊号,该报编辑部在终刊辞中讲到:中立国瑞士事实上是不存在新闻自由的。就连英国工党的地区小组表示支持苏联和苏联政府给予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居民的物质救济这些事实的报道,瑞士当局都是禁止的。编辑部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发表检查当局许可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在出版自由还未恢复到以前那样的范围时,本刊将停止发行。

在《评论》停刊之前,从1939年9月1日开始,德文周刊《世界》在斯德哥尔摩创刊了,这个刊物的性质,象是与《世界新闻和评论》相对应的。到共产国际解散的时候的确还在继续发行,其后的经过就不清楚了。

至于《国际新闻通讯》三个版本的相对的资料价值,由于各版都是用了相同的16开本印刷的,因此,拿页数的多少来比较是恰当的。德文版到1939年10月18日《国际新闻通讯》的停刊为止,总计印刷了51900页。法文版到1939年8月26日停刊时,是27000页。英文版到《世界新闻和评论》的8月26日号为止,印刷了24900页。从这个数字可以推测出,登在德文版上的,在其他两

个版本中没有出现过的重要资料也不少。譬如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日本共产党的32年纲领在法文版上都没有登载过。

除了以上三个版以外,意大利文版于1925年9月以后在维也纳短期发行过,西班牙文版、捷克文版好象也在那个时期发行过,详细情况不清楚。

现在谈谈关于《国际新闻通讯》的复印版和缩微版的出版状况。意大利弗尔特利尼里出版社发行了数量很大的德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包含《评论》在内)和法文版,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可是,德文的复印版有些技术上的错误达几十处,几乎有将近二百页印错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所谓印错是指类似这样的情况:譬如应该印1921年第2期第17页的地方却印上了1932年第57期的第1799页,在同期第18页上,印上了1927年第9期的第1953页。这些大概是由于工作人员的过错和马虎所致,从书页栏外的号数和页数用不高明的手法涂改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我通过经售处要求赔偿,于是给我寄来了大多数错误之处修改印刷后的书页,但是,没有改正的地方还是有的。

英文版《国际通讯》出现了两种缩微版,一种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版,另一种是“世界缩微公司”版。前者是包括到1940年底的《世界新闻和评论》,后者就到1938年底结束。两者都是缺期非常多的(前者在全套共缺97期和五份索引,后者共缺84期和九份索引),缩微胶卷的不良状态也不少。此外,仅就《世界新闻和评论》来说,它的1938年度到1943年度的已由东京的意大利书店复印,世界缩微公司已经发行了从1938年度到1953年度的全套缩微胶卷。

Ⅱ. 其他的定期刊物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各个机构在各个时期都出版各种各

样的期刊，我在这里加以列举。另外，在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期间发行的公报，则放到另一项目去谈。

(a)《共产国际为俄国刊物、俄共组织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治部的公报》，莫斯科，俄文版，1920—1921年。

正如其名称本身所表示的，它是共产国际为俄国的报纸杂志，俄国共产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部各组织发行的公报。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报》，俄文版，1921.9.8—1922.6.7。

这是把前项公报改为对一切党的领导工作者都适合的刊物，所以，除俄文版外，还发行了法文、德文，英文版。原定为周刊，实际上发行的间隔相当长，除共产国际的呼吁书和各种决定外，也登载了若干篇关于共产国际活动概况的论文，只出版到5期就停刊了。这个公报的英文版1968年由弗尔特利尼里出版社复印。

(c)《新闻通讯》，俄文版，莫斯科，1925.11—？

用四种文字发行的情报部公报，是由1925年3/4月的第五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召开的情报部会议决定在同年11月创刊的。其内容是刊载关于执行委员会和其各机关的活动情报报告；各党生活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关于各种带有原则性的重要问题的说明等，这一刊物是寄发给各党中央委员会的。本来打算出月刊，可是实际出的不多，截至1928年5月为止只出了五期。

(d)《妇女共产国际》，斯图加特，1924.4—1925。

受执行委员会和国际妇女书记处的委托，由克拉拉·蔡特金编辑，用德文出版的月刊。

(e)《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临时局公报》，英文版，1920.1—3，阿姆斯特丹。

在1919年底，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设置的阿姆斯特

丹局的机关报,是用德文、法文、英文出版的。在第1号上刊登了荷兰党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三个提纲草案;在第2号上刊登了由该局召集的国际会议的会议记录。正象这些资料表示的那样,阿姆斯特丹局对若干重要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原则立场是不一致的,为此,执行委员会在4月末的会议上取消了对该局的委托,公报到第2期就停刊了。这个公报的英文版在1968年已由弗尔特利尼里出版社复印。

(f)《[共产国际]远东局公报》,俄文版,伊尔库茨克,1921。

(g)《共产国际南美局公报》,西班牙文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1931。

(h)《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加勒比局机关刊物,1931—1933。

关于从远东局、南美局、加勒比地区局出版的这些公报,详细情况是不明确的。此外还有:

(i)《共产主义》,共产国际为东南欧各国发行的杂志,维也纳,1920.2—1921.9。

这一周刊虽然声称是“共产国际为东南欧各国发行的杂志”,但是很难被认为是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委托下出版的机关杂志,因此,要对它区别对待。这个杂志显出极强的“左派”倾向,当时受到列宁的批判。

(j)《巴尔干联盟》,维也纳,1924—1930。

由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希腊的共产党结成的地区性组织)用多种文字发行的半月刊杂志。保加利亚的科拉洛夫和季米特洛夫等人给该刊写了不少论文。这个杂志虽然不是共产国际执行机关的刊物,但它不仅是一党的机关杂志,而且是由共产国际正式承认的联合组织出版的,因此在这里提一下。随着联盟的解散,这个杂志也就停刊了。

四 创立准备时期的史料

象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和十月革命以前其他运动，其他的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各国左派创立新共产国际的活动是排除在这里的研究范围之外的。我想把研究限于十月革命以后这段时间。在共产国际创立前，作为准备措施有以下的各次会议和各种文件。

(1) 1918年1月24日的国际协商会议。

在彼得格勒召开的这个协商会上，除了布尔什维克（代表是斯大林）以外，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瑞典、英国、美国、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团体的代表都出席了。协商会议决定提出为立即结束战争而进行革命斗争和承认十月革命及苏维埃政权这两点作为条件，召开各国革命左派的国际会议。会议的记录是不存在的。会议参加者之一，当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际部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И. 彼得罗夫做过一个简单报告，这个东西是有的，但我没能看到。关于会议的经过和其决议请参照下面的资料。

(a) Н. И. 康塔兰采夫：《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第三国际的建立》，见《列宁为争取革命的国际而斗争》，莫斯科，1970年，第399—400页。

(b) Р. В. И. 斯托廖洛娃：《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建立》，《共产国际史论文集》，莫斯科，1970年，第6—10页。

(2) 1918年3月14日在俄的外国人国际主义者会议。

战俘中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根据会议的决定，建立了十一个外国共产主义组织和其联合组织。联合组织是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的。这些组织和联合，在宣传第三国际的思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有下面一些资料。

(c) 《真理报》，1918年3月17(4)日。

(d) 《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9卷，第148—149页。

(e) Б·Б·梅得维杰夫、П·М·扎克：《俄共(布)所属外国人组织联盟》，莫斯科，1967年版，第176—228页。

(3) 1918年11月4—12日，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第一次大会。

这次会议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演说，阐述了“东方各民族的教育”是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大会设立了俄国共产党回教徒组织中央局。中央局设立了由十二个部门组成的东方各民族国际宣传部(阿拉伯、伊朗、土耳其、阿塞拜疆、布哈拉、吉尔吉斯、山岳部族、喀尔姆卡、中国、朝鲜、日本、印度)。中央局不久被改组成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这个组织在东方各民族中间宣传第三国际的思想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把这次大会混同于1920年在巴库的第一次东方各民族大会。关于大会和中央局的活动，请参照下面的资料。

(f) 罗伯特·洛斯·西尼亚·尤丁：《苏俄与东方》(1920—1927)，斯坦福，1957年，第77—78、162—164页。

(g) 勃兰科·拉蔡其、米劳提德·托拉切可维奇：《列宁和共产国际》，第一卷，斯坦福，1972年，第372—377页。

(h) 《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莫斯科，1933年，第241—242、244—246页。

(4)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18年12月24日的呼吁书。

为了加速统一到第三国际旗帜之下的过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各国的革命左派发出呼吁，在12月25日用无线电向各国广播。这个呼吁书的全文在《真理报》1918年12月25日登载，下面的文献中也收录了。

(i) 同上，第252—253页。

关于列宁对这个呼吁书的草案进行的修改，请参照下面的文献。

(j)《列宁为建立共产国际而斗争的历史》，《苏共历史问题》，1969年第2期，第58—60页。

(5)1919年1月中旬的国际协商会议。

这次大会是根据列宁的提议，为了准备成立新的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只做出了决定，尽可能在最近时期内召集第三国际的成立大会。通过了号召三十九个兄弟党和小组参加成立大会的呼吁书。呼吁书是在1919年1月24日的《真理报》上登载的。呼吁书的草案是根据列宁1918年12月27、28日指示在12月底拟定，经过列宁校订的。虽然协商会议的记录不存在了，但是，它的经过在会议的参加者之一、英国的范因贝尔格的以下回忆录中流传出来了。

(k) J·范因贝尔格：《回忆共产国际的建立》，《共产国际》，1929年第9/10/11期，第685—687页。

列宁的指示在下列文献(l)，列宁对草案的订正和注释在(m)，最终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本在(n)中分别收录。

(l)《列宁全集》日文版第42卷，第132—135页。

(m)《列宁为建立共产国际而斗争的历史》，《苏共历史问题》，1969年第2期，第60—63页。

(n)《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253—256页。

呼吁书送到三十九个兄弟组织，它的第三十八个是写给“(片山潜同志为代表的)东京横滨社会主义者小组”的。把片山当作代表，除了因为片山的名字在国际上是人所熟知的以外，还反映了这一情况：在美国有和片山密切合作关系的荷兰左派社会主义者鲁特格尔斯。在1918年5月去苏俄的途中，拿着片山的介绍信来到日本，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会见。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委托他把1918

年7月19日东京、横滨社会主义者团体实行委员会署名的给俄国同志的信以及1917年五一节时日本社会主义者团体临时实行委员会署名的支持俄国革命的决议带到俄国，他于同年9月底到达莫斯科，参加创立共产国际的活动。上述书信和决议，除了在1918年8月14日的《中央西伯利亚报》、1918年9月17日《真理报》等报登载外，也在前面讲过的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者组织大会上，而且也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鲁特格尔斯宣读过。

列宁给协商会呼吁书的草案作的注释涉及到日本的“党”，由于许多人都不太了解，在这里介绍一下。

在呼吁书草案中列举着收件组织名称的地方，列宁做了这样的注释：“日本的党？问鲁特格尔斯。”此外，在呼吁书上写了发起人的八个党名的地方，列宁注道：“雷恩施坦和鲁特格尔斯，……虽然没有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和日本党的委托书，可是他们对这些党是很了解的。确信能得到这些党的支持，是否应当加上他们的署名呢？”可是，在呼吁书的最后文本上雷恩施坦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签了名，而鲁特格尔斯却没有签名。

(6)1919年3月1日的预备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前一天召开的，协商了大会的议事日程。这次预备会议的简单记录在下面的文献中记载着。

(o)《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256页。

译自日本《历史学研究》1973年11月

第402期，1974年1月第404期。

(王秀美、郑颖达译，王保祥、殷叙彝校)

《李可夫文选》及其关于 知识分子的论述

周 邦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的《李可夫文选》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李可夫自担任苏联国家领导人以来，即1924年至1929年期间在党和政府以及各种专业性会议上所做的一些重要报告和讲话。全书约三十五万字。《文选》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有些报告论述了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农业建设；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对待富农、中农、贫农以及小手工业者的政策；商品流转的发展；市场关系；价格政策；法制问题；对外政策；对外资的利用。有的报告论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职权问题。有的讲话专门谈到当时苏联共产党内的斗争，批判了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分裂活动。1926年10月李可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所做《我国的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实际上拟定了苏联党和政府在工业化中的政策，并被通过为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李可夫在所有这些报告和讲话中都分析了苏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引用了一些具体数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从当时苏联工农业生产落后，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现实出发，充分强调要注意经济工作，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他指出，只有当科学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每一个

毛孔时，才能组织起新农村，战胜愚昧和落后。李可夫引证了列宁于1920年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的如下一段话：“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大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①李可夫指出，这段话比列宁讲它的时候显得更加正确，因为当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地从经济建设方面去解决国家的政治问题。

李可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之一，1881年2月生于萨拉托夫城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他在中学里即抛弃一切宗教信仰，喜爱数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他的青年时代正值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年轻的李可夫受到革命运动的鼓舞，在中学里就参加了秘密小组，开始涉猎俄国革命史，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关于西欧工人问题和工会问题的书籍，还参加了萨拉托夫出版的秘密杂志的工作。

在萨拉托夫革命小组中的活动，决定了李可夫以后的命运。他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后，即担任社会民主党地方委员会委员，并领导工人小组和大学生委员会的工作。1901年3月，喀山工人和大学生组织遭到沙皇破坏，李可夫被遣送回乡，从此就放弃了学生生活，专心致志地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工人运动和萨拉托夫、喀山、雅罗斯拉夫里以及莫斯科党组织的工作。从1901年直到十月革命前的十几年间，李可夫曾多次被捕和流放，一再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97页。

李可夫自1905年3月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起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对取消派、召回派以及托洛茨基派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91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曾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1917年11月支持建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因遭列宁反对，遂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一起签署了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声明。

十月革命后，李可夫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苏联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他受党委托领导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开始实行工业国有化，建立了商品分配的国家垄断制。1919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年夏列宁患病期间被任命为列宁的副手。列宁曾赞扬李可夫有管理才能，并认为他擅长做经济工作。

列宁逝世后，李可夫当选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年底又领导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1928年与布哈林以及托姆斯基等人一起被认定为右倾集团。1930年被开除出政治局，年底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调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最后在1938年3月的审讯中被处决。

李可夫长期担任苏联党、地方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什么专门的理论著述，但他在许多报告和讲话中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和见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刊选载了《李可夫文选》中有关知识分子的两个报告，一个是1924年12月1日所做题为《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另一个是1927年4月6日《在全苏工程技术人员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李可夫在这两个专门论述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及其它有关的报告中，比较全面而具体地谈到知识分子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924—1925年经济年度，苏联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已

接近战前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大工业的产值在1925年已占战前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这一年度苏维埃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为三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国家电气化计划在顺利地执行。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命脉巩固了，反对私人工商业资本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在试探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性，并确信苏维埃政权已不可动摇之后，相继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1924年就有英、法、日、意四国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当时除了美国之外，差不多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都承认了苏联。很清楚，苏联已经赢得整整一个和平喘息时期。

国民经济的恢复接近结束。但是，对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单单恢复经济，达到战前水平是不够的，因为战前水平是个很落后的国家的水平。必须继续改造国家的经济，使它走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轨道，赶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建设水平，这就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迫切任务。

李可夫在报告中论述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科技知识分子当时所肩负的重任。要恢复固定资本、实行经营合理化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掌握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成就来解决国家面临的任务，这就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因此科技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知识分子的才干和专长也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充分发挥。

李可夫在1924年的报告中分析了十月革命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处于无产阶级的大锤和旧俄的铁砧之间，知识分子饱经忧患苦难，使他们摇摆不定。一部分与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上层关系最密切的知识分子死心塌地跟着主子逃亡国外，其余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沾染了旧社会的意识，久久弄不清十月革命的意义。到十月革命七周年时，广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一起经

历了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经受了艰难岁月的考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有人担心专家们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会去支持私营企业主和租让企业的承租者而反对国营经济和公有经济。但事实上，大部分知识分子坚定地跟党和苏维埃站在一起，都指望组织起国营的、公有的苏维埃经济。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李可夫在报告中郑重提出，应当对知识分子做出结论：他们已成为苏维埃知识分子。

李可夫在1929年2月1日在全俄农艺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曾经强调科学家、农艺师、工程师和技术员在实现最伟大的技术经济革命中起着特殊重大的作用，把科学引进生产的人首先是工程师和农艺师。在农村里，要用新的方法改造农业，没有农艺师是不行的，可是过去农民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能积极支持农艺师的工作，而现在农村里开始出现了欢迎农艺师的积极分子，他们充分认识到改造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因此自觉自愿地支持农艺师的工作。

在1924年的报告中李可夫关切地谈到，对那些物质保障还很差的分子，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来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在另一个报告中他也谈到提高教师的薪金问题。他认为教师不应该只有足够的面包和住房，教师是文化工作者，有时甚至是农村唯一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的薪金自然还应当精确地考虑到他们的文化需要。在此同时，李可夫强调指出劳动和科学，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问题，分析了当时存在的“敌视非党专家”倾向，其根源一方面是国家落后和不文明所造成；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个别代表人物还没有彻底改变革命前那种轻视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态度也有关系。他勉励知识分子应当改变昔日的孤僻生活，克服资产阶级妄自尊大的习气，密切与工农相结合，以主人翁态度参加各项专门技术问题的讨论，更自觉自愿地参加苏

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李可夫的这些有关知识分子的报告和讲话，体现了当时苏联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方面曾起了有益的作用。

有关共产国际的书目

编者按：为了推动共运史学界对共产国际问题的研究，现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藏的中、俄、英、德、法、西、日等文版有关共产国际的论著编译成书目，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

书目中收集了七种文字的图书共三百三十三册。除中文本外，其他文种都在括号内注明。书目包括共产国际纲领、章程、共产国际史、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决议、资料 and 文献等内容。

共产国际

当代最有影响的力量 C·П·诺沃斯克洛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62年 78页)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列宁著

(德文版 柏林 1959年 82页)

第三共产主义国际——共产国际 科洛涅尔·雷扎诺夫著

(法文版 巴黎 1922年 127页)

第三国际动向——第三国际决议案

(东方出版社 1939年 60页)

第三国际

(北京 1972 年 106 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

(1924 至 1928)

(英文版 伦敦 1928 年 508 页)

革命党人——当代文集 E·J·霍布斯鲍姆著

(英文版 纽约 1973 年 278 页)

共产国际——历史的重要阶段 (论文、回忆、文献集) 密洛拉德·

M·德拉赫柯维奇和勃朗科·拉吉希著

(英文版 纽约 1966 年 430 页)

共产主义中心说——共产国际

(英文版 伦敦 1933 年 23 页)

共产国际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1934—1939 年文献集

(法文版 莫斯科 1980 年 511 页)

共产国际与劳动妇女

(德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5 年 78 页)

共产国际 波诺马廖夫著 祝瑛 凌治彬译

(北京 1954 年 31 页)

共产国际和战争——共产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斗争的文件和资料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 108 页)

(日文版 东京 1929 年 163 页)

共产国际和阶级学说 丹尼尔·林登堡著

(法文版 巴黎 1972 年 398 页)

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

(德文版 汉堡 1925 年 163 页)

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活动

(法文版 巴黎 223 页)

共产国际——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Γ·季诺维也夫著

(俄文版 彼得格勒 38 页)

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如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 Γ·卡拉-穆尔扎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34 年 39 页)

共产国际及其革命传统——纪念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五十周年(学术会议资料)

(俄文版 莫斯科 1969 年 302 页)

(德文版 柏林 1970 年 280 页)

共产国际——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探源 Ю·Л·莫尔恰诺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69 年 340 页)

共产国际(1919—1934)——共产国际为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要点 霍斯特·舒马赫著

(德文版 柏林 1979 年 224 页)

共产国际与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B·B·普里瓦洛夫和E·A·编里尼科夫著

(俄文版 列宁格勒 1978 年 174 页)

共产国际的革命遗产——纪念共产国际成立六十周年(学术会议资料)

(俄文版 莫斯科 1980 年 127 页)

共产国际 弗朗茨·博克瑙著

(英文版 伦敦 1938 年 442 页)

共产国际在西班牙——我的生活回忆 何塞·布勒何斯著

(西班牙文版 墨西哥 1972 年 211 页)

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 O·皮亚特尼茨基著

(英文版 伦敦 32 页)

共产国际与法西斯主义 格尔特·舍费尔著

(德文版 164 页)

共产国际的殖民地问题 鲁道夫·施勒辛格尔著

(德文版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1970 年 127 页)

共产主义运动——一个人的调查研究 A·沙德维尔著

(英文版 伦敦 1925 年 51 页)

共产国际的过去和现在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汉堡 24 页)

共产国际与东方 P·A·乌里扬诺夫斯基主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69 年 513 页)

共产国际与东方——批判的批判 P·A·乌里扬诺夫斯基主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78 年 372 页)

(英文版 莫斯科 1981 年 471 页)

共产党的策略——共产国际给墨西哥共产党的信

(英文版 芝加哥 1923 年 16 页)

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目前最高准则 G·季米特洛夫著

(德文版 苏黎世 1937 年 12 页)

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 H·约尔迪著

(德文版 苏黎世 1932 年 134 页)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H·И·布哈林著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 175 页)

国际史 J·布劳恩塔克著

(德文版 汉诺威 第1卷 1961 年 404 页,第2卷 1963

年 617 页,第3卷 1971 年 723 页)

红色网——共产国际在活动

(英文版 伦敦 1939年 91页)

今日之国际——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与反法西斯运动的报告 曼努意斯基著

(1939年 62页)

列宁和共产国际 B·拉吉希和密洛拉德·M·德拉赫柯维奇著

(英文版 斯坦福 1972年 第1卷 683页)

列宁和共产国际 B·亚历山德罗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72年 528页)

列宁和共产国际

(俄文版 莫斯科 1970年 562页)

列宁主义的世界党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汉堡 1924年 244页)

列宁与意大利社会主义(1915—1921)——共产国际创建史论文
H·柯尼希著

(德文版 蒂宾根 1967年 240页)

论共产国际 列宁著

(德文版 柏林 1969年 783页)

论共产国际的团结运动 列宁著

(西班牙文版 莫斯科 1978年 387页)

论共产国际的右倾危险 N·伦茨奈尔著

(德文版 汉堡—柏林 1929年 55页)

两个国际 R·P·杜德著

(英文版 格拉斯哥 92页)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北京 1950年 109页)

前进中的共产国际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汉堡 1923 年 207 页)

人民听到了信号——世界共产主义初期(1919—1924)

(德文版 慕尼黑 1981 年 415 页)

三个国际简史

(法文版 巴黎 1955 年 94 页)

世界革命和第三共产国际——在 1920 年 10 月 14 日哈雷举行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1920 年 68 页)

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党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策略 K·拉

狄克著

(德文版 1919 年 66 页)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崛起——1929 年至 1934 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

德国的政策 T·魏因加特纳尔著

(德文版 柏林 1970 年 302 页)

一个世界党的组织 O·皮亚特尼茨基著

(英文版 伦敦 1928 年 94 页)

世界共产党员的行动 A·皮亚特尼茨基著

(英文版 伦敦 64 页)

世界各国劳动者的事业 Л·С·奥泽罗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78 年 214 页)

因结就是胜利！季米特洛夫呼吁国际统一行动和对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的回答 G·季米特洛夫著

(德文版 斯特拉斯堡 34 页)

对魏玛共和国阶级斗争的估计——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社会

民主党和托洛茨基主义 A·V·柏拉图著

(德文版 柏林 1974 年 403 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展望

(日文版 东京 1930 年 287 页)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F·施奈德著

(德文版 1919 年 48 页)

西欧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斗争(1920 年至 1923 年)

A·A·加尔金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77 年 343 页)

现在谁领导共产国际? L·托洛茨基著

(德文版 柏林 1930 年 59 页)

世界共产主义的演变 O·K·弗勒希特海姆著

(德文版 柏林 1977 年 276 页)

组织问题 O·皮亚特尼茨基著

(德文版 汉堡 1925 年 64 页)

去莫斯科的道路 C·蔡特金著

(德文版 1920 年 31 页)

目前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日文版 东京 1948 年 144 页)

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活动形势

(日文版 东京 1929 年 45 页)

中国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1927 年 5 月)

(德文版 汉堡—柏林 1928 年 160 页)

共产国际纲领

第三国际纲领

(1940 年 87 页)

革命纲领——德国和俄国革命工党及共产国际纲领

(德文版 曼海姆 1975 年 226 页)

共产国际纲领

(1939 年 85 页)

(俄文版 1928 年 122 页)

(英文版 莫斯科 1932 年 111 页)

(日文版 100 页)

共产国际纲领及章程

(日文版 1941 年 131 页)

共产国际党纲草案

(46 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纲领——1922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3 日于莫斯科

(英文版 伦敦 120 页)

共产国际纲领问题资料

(德文版 汉堡 1924 年 328 页)

(日文版 东京 1929 年 232 页)

论共产国际纲领问题——1924 年 6 月 27 日和 28 日的两篇报告 N·布哈林和 A·塔尔海默著

(德文版 莫斯科 1924 年 44 页)

世界纲领解说

(日文版 东京 1930 年 113 页)

共产国际第一、二、三、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宣言和决议 (1919—1923)

(法文版 巴黎 1971 年 216 页)

1921 年 7 月 12 日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通过的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反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的提 纲

(德文版 汉堡 1921 年 19 页)

共产国际章程

共产国际的宗旨和章程——1920年7月17日至8月7日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德文版 汉堡 1920年 79页)

无产阶级政策的现实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和

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制定的章程 J·伦茨著

(德文版 柏林 1927年 88页)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 И·米古林著

(俄文版 1929年 63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

(俄文版 莫斯科 1933年 275页)

第三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决议和宣言 A·阿德勒编

(英文版 伦敦 1980年 481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
的讨论记录

(德文版 汉堡 1921年 202页)

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 Г·З·索尔金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61年 78页)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方针和决议

(德文版 汉堡 1920年 379页)

(日本版 东京 1929年 121页)

第二、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盟——1922年4月2日及随后在柏林

- 国会大厦举行的执委会会议的工作报告
(英文版 伦敦 1922年 94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北京 54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M·И·维诺格拉多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75年 80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至8月) M·雅布兰斯基著
(俄文版 1929年 59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至8月)
(俄文版 莫斯科 1934年 754页)
- 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俄文版 彼得格勒 56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汇编
(英文版 伦敦 1977年 第1卷 331页,第2卷 331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告法国无产阶级书
(德文版 1920年 18页)
- 列宁的二十一条——莫斯科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列宁、拉狄克、勒维、塞拉蒂的讲话和决议
(德文版 柏林 1920年 39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制定的共产党的思想、策略和组织原则
(俄文版 莫斯科 1972年 528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德文版 汉堡 1921年 452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记录——1920年7月19日于彼得

- 格勒和 7 月 23 日至 8 月 7 日于莫斯科
(德文版 汉堡 1921 年 798 页)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 年 8 月 20 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汉堡 1920 年 21 页)
-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1920 年 9 月于巴库
(英文版 1977 年 204 页)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 年 6 月至 7 月) Ф·格拉乌巴乌弗著
(俄文版 1929 年 57 页)
-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俄文版 彼得格勒 1922 年 500 页)
-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和决议(1921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12 日于莫斯科)
(英文版 纽约 1921 年 199 页)
(德文版 汉堡 1921 年 191 页)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路线 Ф·И·菲尔索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75 年 632 页)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12 日于莫斯科)
(德文版 汉堡 1921 年 1086 页)
- 共产国际的道路——1921 年 7 月在莫斯科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报告 K·拉狄克著
(德文版 汉堡 1921 年 86 页)
- 远东共产主义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 年 1 月于莫斯科)

(德文版 汉堡 1922 年 140 页)

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德文版 汉堡 1920 年 32 页)

凡尔赛条约的结束——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

K·拉狄克著

(德文版 汉堡 1922 年 49 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5 日) A·季
维尔著

(俄文版 1929 年 70 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制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新
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K·K·希里尼亚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80 年 518 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3 日彼
得堡和莫斯科会议报告摘录

(英文版 296 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公报

(德文版 米兰 1967 年 1 册)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5
日于彼得堡和莫斯科)

(德文版 汉堡 1923 年 第 1 卷 329 页, 第 2 卷 330—
813 页, 第 3 卷 814—1088 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8 日的速记
记录) B·维利亚姆斯著

(俄文版 1929 年 67 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8 日速
记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 年 第 1 卷 1007 页,

第2卷 312页)

(德文版 1971年 第1卷 584页,第2卷 585—1083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

(日文版 东京 第1卷 1931年 270页,第2卷 1931年 280页,第3卷 1932年 293页)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于莫斯科)

(德文版 汉堡 1924年 189页)

英国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英国委员会的报告

(英文版 伦敦 1928年 195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6月至9月) Γ·亨特著

(俄文版 1929年 71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9年 第1册 624页,第2册 203页,第3册 192页,第4册 538页,第5册 159页,第6册 199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于莫斯科)

(德文版 柏林 1928年 第1卷 813页)

革命的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D·曼努伊尔斯基著

(德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4年 30页)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斗争(文献集)

K·K·希里尼亚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75年 527页)

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为争取人民阵线而反战、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W·皮克等著

- (德文版 柏林 1957年 295页)
-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
- (英文版 莱比锡 56页)
-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报告
- (英文版 伦敦 1936年 1册)
-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于莫斯科)
- (德文版 埃尔兰根 1974年 第1卷 481页, 第2卷 482—1010页)
-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报告、讨论摘要、闭幕词、决议
- (德文版 法兰克福 1971年 293页)
- 在反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E·勒温和H·舒马赫尔著
- (德文版 柏林 1975年 140页)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
- (德文版 柏林 1975年 343页)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 (日文版 散页)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曼努意斯基著
- (佳木斯 1949年 85页)
-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总结——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5年8月17日) 曼努意斯基著
- (延安 1938年 85页)
- (德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5年 68页)
- 准备夺取政权——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国际地位和任务——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报告 O·库西宁著
- (英文版 伦敦 160页)

反战和反法西斯主义 季米特洛夫著

(1938年 217页)

(英文版 纽约 1938年 287页)

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 G·季米特洛夫著

(英文版 伦敦 1935年 127页)

(德文版 雷根斯堡 1975年 141页)

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Г·季米特洛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58年 223页)

(西班牙文版 马德里 1977年 137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四次到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英文版 伦敦 1924年 122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G·季米特洛夫著

(德文版 1920年 40页)

共产国际的斗争——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21年6月于莫斯科)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汉堡 1921年 104页)

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汉堡 1922年 64页)

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斗争——1922年2月24日至3月4日在共产国际扩大执委会上的报告 A·洛佐夫斯基和H·布兰德勒著

(德文版 柏林 1922年 36页)

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会议速记记录

(1922年4月2日至5日于柏林)

(德文版 维也纳 1922年 52页)

共产党反对战争危险和战争的斗争——1922年3月在莫斯科共

产国际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C·蔡特金著

(德文版 汉堡 1922年 54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至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德文版 汉堡 1924年 111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1923年6月12日至23日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 1923年 320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1925年3月21日至4月6日速记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年 606页)

(德文版 汉堡 1925年 375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1925年4月至1926年1月)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6年 396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速记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7年 707页)

无产阶级先锋和工会 洛佐夫斯基著

(日文版 东京 1927年 150页)

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速记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7年 第1卷 571页,第2卷 467页)

苏维埃诞生的时间和条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告(1919年9月1日) 季诺维也夫著

(英文版 格拉斯哥 8 页)

在十字路口——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决议 P·布劳恩著

(英文版 伦敦 1928 年 130 页)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库西宁著

(日文版 东京 1930 年 159 页)

目前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战略战术——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中心问题

(日文版 东京 1929 年 311 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1929 年 7 月)

(俄文版 莫斯科 1929 年 第 1 卷 462 页, 第 3 卷 207 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速记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 1932 年 第 1 卷 638 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 1933 年 第 1 卷 204 页, 第 2 卷 261 页, 第 3 卷 178 页)

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下一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的演说和报告

(英文版 伦敦 88 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

(1933 年 121 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速记记录)

(俄文版 莫斯科 1934 年 597 页)

共产国际文献——1919 年至 1932 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提纲和宣言汇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33 年 1007 页)

共产国际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的论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

委员会文件和决议汇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32 年 163 页)

一年的工作与斗争——1925 年至 1926 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德文版 柏林 1926 年 368 页)

共产国际史

巴黎的“莫斯科观点”(1922—1924) 茹尔·洪别尔-德罗著

(法文版 1964 年 265 页)

从齐美尔瓦尔德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产生 茹尔·洪别尔-德罗著

(法文版 纳沙泰尔 1968 年 250 页)

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49 年 42 页)

从列宁到赫鲁晓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 休·塞顿-沃森著

(北京 1964 年 494 页)

第三国际史 郑学稼著

(台北 1977 年 3 册[1644页])

反布尔什维克手册

(法文版 194 页)

共产主义——共产党史话 盖伊·A·奥尔德雷德著

(英文版 格拉斯哥 1943 年 124 页)

共产国际史丛

(俄文版 莫斯科 1970 年 291 页)

共产国际简史 A·И·索波列夫主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69 年 599 页)

- (英文版 莫斯科 1971年 563页)
- (德文版 柏林 1970年 718页)
- 共产国际历史概况 若尔日·考格尼奥著
- (法文版 巴黎 1969年 156页)
- 共产国际史(1919年—1943年) 比埃尔·弗兰克著
- (法文版 1979年 第1卷 462页,第2卷 462—949页)
- 共产国际史 B·拉吉希和M·德拉赫柯维奇著 冈本充弘等译
- (日文版 东京 1977年 433页)
- 共产国际史 山边健太郎著
- (日文版 东京 1949年 366页)
- 共产国际的形成和发展 克里斯托·卡巴克契耶夫著
- (德文版 汉堡和柏林 1929年 174页)
- (日文版 东京 1930年 232页)
- 共产国际的形成 詹姆斯·W·赫尔斯著
- (英文版 斯坦福 1964年 275页)
- 共产国际的历史贡献 雅克·弗雷芒著
- (法文版 日内瓦 1965年 267页)
- 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 克劳丁·弗尔南多著
- (英文版 纽约和伦敦 1975年 第1卷 304页,第2卷 307—644页)
- (德文版 柏林 第1卷 1977年 356页,第2卷 1978年 384页)
- (法文版 巴黎 1972年 第1卷 364页,第2卷 362—766页)
- 共产国际十年 I·克默尔著
- (英文版 伦敦 1929年 46页)

- (德文版 汉堡和柏林 1929年 31页)
- 国际小史 洪盛译
(上海 1931年 76页)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初稿)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
(北京 1958年 第1卷 637页, 第2卷 639—1496页)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纲要(第一、二编初稿)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编
(北京 1962年 98页)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习材料(一) 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
(北京 1963年 141页)
- 国际发展史 浅野研真著
(日文版 东京 1925年 214页)
- 国际工运和共产主义运动史 B·П·邦达连科主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75年 560页)
-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著 吴继淦 李路译
(北京 1965年 310页)
- (英文版 纽约 1957年 400页)
- (法文版 巴黎 1930年 438页)
- 列宁领导下的莫斯科 阿尔弗勒德·罗斯麦著
(英文版 纽约和伦敦 1972年 253页)
- 茹尔·洪别尔-德罗回忆录——我从托尔斯泰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1891—1921) 茹尔·洪别尔-德罗著
(法文版 纳沙泰尔 1969年 439页)
- 茹尔·洪别尔-德罗回忆录——从列宁到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任职十年(1921—1931) 茹尔·洪别尔-德罗著
(法文版 纳沙泰尔 1971年 507页)

茹尔·洪别尔-德罗回忆录——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十年(1931—1941) 茹尔·洪别尔-德罗著

(法文版 纳沙泰尔 1972年 429页)

茹尔·洪别尔-德罗回忆录——战斗生涯的结局(1941—1971) 茹尔·洪别尔-德罗著

(法文版 纳沙泰尔 1973年 452页)

世界革命 查尔斯·拉波波尔著

(法文版 巴黎 1921年 222页)

世界革命——共产国际史(1919—1943) 马格勒特·布伯-诺伊曼著

(法文版 1971年 412页)

世界革命的空想与神话——1920—1940年的共产国际 T·皮克尔编

(德文版 慕尼黑 1964年 303页)

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斯大林全盛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 赫尔穆特·格鲁伯著

(英文版 纽约 1974年 544页)

1917至1936年的世界革命——共产国际的兴衰 C·L·R·詹姆斯著

(英文版 伦敦 1937年 429页)

共产国际史料

爱沙尼亚革命工人运动的国际关系 A·利布曼著

(俄文版 塔林 1977年 84页)

被告在控诉 A·B·托尔马切夫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62年 631页)

被告在控诉 马赛尔·威拉德著

(法文版 巴黎 1951年 315页)

俄罗斯解放运动

(英文版 巴黎 1929年 51页)

大家急须认识的法西斯蒂 季米特洛夫著

(1937年 174页)

第三国际解散事件 青白出版社编印

(1943年 36页)

第三国际与苏联外交 周子亚著

(1943年 30页)

第三国际和欧洲革命 中村丈夫编

(日文版 东京 1975年 585页)

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 季米特洛夫著 坂井信义 村田阳一译

(日文版 东京 1973年 286页)

反第三国际的国际协约——创立五周年的情况公报(1929)

(法文版 日内瓦 37页)

革命小品 贝拉·库恩著

(英文版 伦敦 [1918] 46页)

革命与暴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颠覆的论著

E·J·霍布斯鲍姆著

(德文版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1977年 381页)

工人阶级的演说家——演说集 A·B·托尔马切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62年 639页)

共产国际文件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

(北京 1963年 第1卷 611页)

(英文版 伦敦 第1卷 1956年 463页, 第2卷 1960

年 584页, 第3卷 1971年 494页)

- (日文版 东京 1961 年 第 1 卷 438 页)
-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 贝拉·库恩编 中国人民大学
编译室译
(北京 1965 年 第 1 册 540 页, 第 2 册 508 页, 第 3 册
322 页)
- 共产国际——文献 赫尔曼·维贝尔著
(德文版 汉诺威 1966 年 411 页)
- 共产国际资料集 村田阳一编译
(日文版 东京 第 1 卷 1978 年 628 页, 第 2 卷 1979 年
630 页, 第 3 卷 1980 年 643 页)
- 共产国际创立四十周年——1919 年 3 月 2 至 6 日莫斯科第一次
代表大会文献集
(法文版 47 页)
- 共产主义运动站在争取和平、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前列——共
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四十周年 II·A·罗季兹诺夫等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76 年 366 页)
-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翻译室编译
(北京 第 1 辑(1919—1928) 1981 年 610 页, 第 2 辑
(1929—1936) 1982 年 481 页)
-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决定
(俄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7 年 87 页)
- 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工作的回顾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汉堡 1921 年 77 页)
- 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文献和列宁的讲话
(德文版 柏林 1959 年 328 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1928年至1934年的
经济和政治 Γ·瓦尔加著

(俄文版 1935年 190页)

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资料)

(俄文版 莫斯科 1935年 605页)

(德文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5年 718页)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在中欧及东南欧各国为建立人民战线
而斗争 A·X·克列万斯基等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77年 375页)

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危险性及青年共产国际的任务 希达洛夫著
藤川稔译

(日文版 东京 1931年 135页)

共产国际、印度和殖民地问题(1920—37) 索布汉拉尔·达塔·
吉普塔著

(英文版 加尔各答 1980年 264页)

共产国际和殖民地问题(1919—1935) 昂·科洛蒂·皮舍和希·
罗贝尔塔齐著

(法文版 巴黎和海牙 1968年 584页)

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民族政策的基本资料

(日文版 大连 1938年 100页)

共产国际历史研究——合订本 吉泽拉·耶恩等著

(德文版 柏林 1974年 470页)

共产国际和东欧农民(1919—1930) 乔治·D·杰克逊著

(英文版 纽约和伦敦 1966年 339页)

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1928—1943) 克米特·E·麦肯齐著

(英文版 伦敦和纽约 1966年 368页)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动向 松井英一著

- (日文版 东京 1940 年 32 页)
- 共产国际的转变和 1930 年德国的形势 列·托洛茨基著
(英文版胶卷 科伦坡 1958 年 23 页)
- 共产国际的头五年 列·托洛茨基著
(俄文版 莫斯科 612 页)
- (英文版 纽约 1972 年 第 1 卷 374 页, 第 2 卷 384 页)
- 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 季维尔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24 年 123 页)
- “共产国际”关系调查记录
(日文版 1935 年 127 页)
- 共产国际十年和社会主义建设 田英 木田缎房译
(日文版 东京 1929 年 93 页)
- 共产国际和人民战线 山极洁著
(日文版 东京 1981 年 215 页)
- 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季米特洛夫著
(重庆 1939 年 32 页)
- 国际共产党干部会、形势观察以及新指示
(日文版 1931 年 散页)
- 关于国会纵火案和季米特洛夫 Д·叶拉扎夫主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81 年 第 1 卷 637 页)
- 纪念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三十周年的国际会晤
(俄文版 布拉格 1966 年 398 页)
- 莱比锡审判——演说、书信和文献集 Г·季米特洛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61 年 531 页)
- 列宁——第三国际的奠基人和领袖 М·И·托尼亚耶夫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59 年 46 页)
- 列宁为建立共产国际而斗争 А·М·费多林纳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59 年 48 页)

列宁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文献史) 赫尔穆特·格鲁伯著

(英文版 纽约 1972 年 426 页)

论法西斯主义 季米特洛夫著

(217 页)

莫斯科魔术般的审判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著

(英文版 伦敦 1936 年 36 页)

世界之动向

(1938 年 81 页)

撕掉假面具——对克里斯平、迪特曼和希法亭的答复 卡尔·拉狄克著

(德文版 1920 年 36 页)

为民主团结而斗争的共产党人——1975 年 4 月 8 至 10 日为纪念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四十周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

(德文版 柏林 1976 年 445 页)

伟大十月革命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A·И·索波列夫和Г·Н·尚希耶夫主编

(俄文版 莫斯科 1977 年 575 页)

无产阶级反对战争危险和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1923 年 8 月 17 至 21 日于法兰克福(美因河畔)讨论记录

(德文版 柏林 1923 年 45 页)

新的世界战争“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反第三国际的国际协议的国际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法文版 日内瓦 1929 年 66 页)

1921 年共产国际出版年鉴

(德文版 汉堡 1921 年 331 页)

左翼反对党的历史和原理——前十年(1923—1933) 马克斯·沙舒特曼著

(英文版 伦敦 1974 年 60 页)

十年——左翼反对党的历史和原理 马克斯·沙舒特曼著

(英文版 纽约 1933 年 78 页)

右翼反对派——洛夫斯顿和三十年代的共产国际反对派 罗伯特·J·亚历山大著

(英文版 康涅狄格州西港和伦敦 1981 年 342 页)

殖民地的布尔什维主义和红色帝国主义 古斯塔夫·高德罗著

(法文版 巴黎 1930 年 446 页)

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列宁著

(西班牙文版 莫斯科 167 页)

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

Б·М·列依布宗和К·К·希里尼亚著

(俄文版 莫斯科 1975 年 417 页)

在德国的十二天 G·季诺维也夫著

(德文版 汉堡 1921 年 91 页)

战略战术决议案 大黑田研究所译

(日文版 东京 1931 年 282 页)

中外舆论对第三国际解散之回响 姜季辛编著

(重庆 1943 年 104 页)

恢复列宁的本来面目的尝试——半个亚洲和西欧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卢卡奇和第三国际 R·杜特施克著

(德文版 柏林 1974 年 349 页)

(徐汶、田良英、李耀群编译)